

政协高唐县第四届文史委员会

主任：刘嘉举

副主任：吴宪明、童祥云、王祥瑞

委员：程辛木、李玉祥、赵瑞生、董海潮

本辑编辑人员：吴宪明、尹培岭、王琴

目 录

- 义和拳在高唐.....邵金铭 (1)
- 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胜利
- 殷传业率部起义的经过.....邵金铭 (20)
- 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朱九武 (30)
- 还乡报复 血案如山.....邵金铭 **王连元** 杨旺谱 (54)
- 刘宝善的罪恶一生.....张立亭 (73)
- 赤诚的爱国者杜友棻.....张金洪 (78)
- 缅怀伯父杨清晓.....杨胥先 (89)
- 针灸医生崔三邪扶事.....朱学温 (98)
- 李苦禅联语.....盛星辉 (101)
- 高唐部分画家作品选.....文史科 (104)
- 高唐机械厂的由来.....李开峰 (105)
- 高唐国营林场的建立与发展.....孙金祥 (112)
- 小城春秋
- 忆母校联立清师.....许冠生 (120)
- 龙卷风袭击纸房头.....丁来庭 (125)
- 从铺屯之多说开去.....郑宽亭 侯立中 韩子敬 (133)
-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 高唐县古迹简介 (续).....贺 进 (140)

义和拳在高唐

邵金铭

〔编者按〕此资料详细记录了高唐一带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情况，填补了高唐历史记载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又强修胶济铁路，我国北方特别是山东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最为严重。而满清政府为交出大量赔款，又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盘剥，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不堪；洋货进口日益增加，严重影响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农民更是直接受害者；加之外国的传教士在各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使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列强结下了深仇大恨。因此，义和拳运动在山东的发生和兴起，是山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高唐、茌平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农民纷纷加入义和拳，打出了“反清灭洋”的旗帜，喊出了“杀洋人，灭洋教”的口号。因此，高唐成为义和拳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农民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茌平县的地形很奇特，有一块在高唐和禹城县之间，向北伸出的一条东西宽十二华里，南北长四十多华里的狭长地

区。这个地区一九五六年划归高唐县，就是现在的琉璃寺、张大屯两个乡和杨官屯乡的河东部分。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和高唐东南的人民来往极为密切。

就在这片土地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97年—1900年）间兴起和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王立言、徐福、董延邦、于清水等著名领袖人物。

（一）

从神拳到义和拳

神拳，原是鲁西地区农民自发的练武组织，用以健身和自卫。拳场的拳师在教农民练武时，则供“神仙”附体后进行传授，因此称“神拳”。原高唐、茌平一带的拳场内多供奉“关夫子”和“二郎神”杨戩，拳场在拳民中则称之为“坛”。拳民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因为全都是“神仙”的弟子，所以没有师徒之分。“坛”内能有“神仙”附体的称谓“师兄”，而权威最大的就是“大师兄”。

神拳的组织，在清光绪二十三年以前，高唐、茌平一带的许多村庄就已经有了，不过神拳拳场的大发展则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事。这一年王莫庄的王立言到长清县“访友”，回乡以后，就在王莫庄原有拳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总坛”，自称“大师兄”，在周围村庄到处设场“安坛”，大力发展神拳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在原茌平北部和高唐的东南部建立起拳场三十多处，其中较有名的有：郝庄村，大师兄为于清水；高唐王屯村，大师兄为王汝言。其他如琉璃寺、徐

庙、后杨庄、小林庄等村，规模也较大，人数也较多。

王立言带人到处“安坛”，建立拳场发展拳友（坛与坛之间的拳民互称拳友），每到一村“安坛”完毕后，全体拳民就齐呼“先学梅花拳，后练金钟罩；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因此，这个口号在当地喊得很响，说明这是最初拳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经过这年的活动，王立言已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至于什么时候改称义和拳，据我们多次调查认为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以后的事了。

义和拳的摇篮——琉璃寺

琉璃寺是高唐县城东南方向四十华里处的一个村庄，原属茌平县，即今高唐县琉璃寺乡所在地。这个村庄的村东有座大寺，全部建筑都是一色的绿琉璃瓦，远近群众都称其为“琉璃寺”，久而久之连村名也成为琉璃寺了。这座寺建于何年，已无可考证，不过根据《高唐县地名志》的记载，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该村就已经叫琉璃寺了。

说到琉璃寺和义和拳的关系，首先应从徐福开始。徐福原是三里堂寺中的和尚，他的身世，我们多次调查没有获得可靠的材料，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从小在三里堂寺中出家，法号诚乙，他的师傅叫光鉴法师。徐福还有一个师弟，是琉璃寺乡焦庄人，名叫严文×，后来改名徐文；以后徐福又收过一名姓范的徒弟，是琉璃寺乡小范庄人，当地人不知道他的俗名，都叫他本诚和尚。

光鉴和尚是个早年受戒的高僧，为人忠厚慈善。徐福少

年出家，粗通文字，武功较好，他的年龄和王立言相差不多。光绪二十三年神拳大发展以前，他和其师弟严文×就与王立言相交颇深。后来因他“不守本份”屡犯佛规，被光鉴从三里堂寺中逐出，乃移居琉璃寺。不久，他的师弟也逃到琉璃寺并改名徐文。从此以后他们和王立言经常在一起，王立言在附近村庄发展拳民，徐福从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附近村庄有不少青年，到寺中学武，成了徐福的俗家弟子（即光学武，不当和尚）。从此，王莫庄和琉璃寺成为茌平、高唐一带拳民活动的中心。

清光绪二十三年，离琉璃寺村仅有一里路的前张庄村（现在俗称洋楼张庄），从禹城的御桥韩庄来了一个意大利籍的神甫，在这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一带共有七个村有天主教徒，即前张庄、小屯、琉璃寺、王莫庄、许楼、毛庄、王屯，教徒共三百人，而前张庄一个村就占230人。虽然当时前张庄还没有成为铎区，也没有专职神甫（进行教务活动时，神甫从御桥韩庄临时来），而实际上前张庄已成为这一带教民的活动中心。平时天主教徒中的有些人依靠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这不仅引起了民愤，特别是在拳民们的眼里且被视之为“邪教”。同时，由于拳民们整天高喊“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的口号，于是双方结下了不解之仇，并不断发生小的冲突。这一意大利神甫来后，在上述各村庄发展教徒，例如在王莫庄发展教徒二十人，在琉璃寺发展教徒五人（以上资料详见高唐县宗教委员会编写的《高唐县天主教志》），特别是他在神拳“总坛”的所在村大量发展教徒，更激起了王立言和徐福的极大愤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三日琉璃寺赶大会。

在王立言和徐福的策划下，琉璃寺和王莫庄的拳民们在琉璃寺大寺前的广场上，摆下“以拳会友”的拳场，将附近拳场的拳民集合了三百多人。当时到场的有王立言、徐福、于清水、王汝言等拳民首领。拳场上搭有彩门，门口横幅写着“以拳会友”，对联的上联写“少林拳拳讲义和逐邪恶”；下联写“大觉寺寺内传法渡众生”①。在这次“以拳会友”的大会上，有不少拳民进行了拳术和器械的表演。这次大联合行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方面提出了“拳讲义和”，要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把斗争目标统一到“杀洋人，灭洋教”方面。我们认为这就是由神拳到义和拳的开始。

义和拳的创始人之一——大师兄王立言

王立言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王莫庄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祖父王江，父亲王友亭都是贫苦的农民，到他父亲王友亭中年以后，家境逐渐走向小康。王立言青少年时代读过一些书，从他祖父王江到他的父辈们都会武功，所以王立言少年时代既读书也习武。他还有个弟弟叫王立平，他叔家有个弟弟王立台，后来都和他一起闹神拳。王立言成年之后娶徐庙徐氏为妻，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王金奎，次子王金岭。后来又与本村李氏之女相爱而同居（按旧社会的风俗论，系非正式婚姻）生两个女儿，后来长女配于祝庄张吉川，次女配于前关庄刘殿举，其妻徐氏和李氏同在一起生活。以上是王立言的身世情况（详见附图《王莫庄王氏族系图》）。

王立言能文能武，性格内向，足智多谋，待人和气，平易近可亲。成年自立以后，由于家庭人口较多，除务农之外，

也卖过洋布等碎货（即小百货），家庭生活还比较富裕。青少年时代学过武功，但武技并不高。在他十七岁那年，曾到长清县投一位名拳师“学艺”两年，练成一身好拳脚，并善使一对双拐，成为周围神拳场中的有名拳师。后来在光绪二十二年时，他又一次去长清县“访友”，结识了很多朋友。第二年回乡以后，才在王莫庄设“总坛”，发展神坛组织，这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琉璃寺大联合以后，义和拳仍然是“既学拳，也学法”。他们一方面宣传“拳讲义和”即主张拳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杀洋人，灭洋教”；另一方面又宣传“学法”，讲“法凭正气”。“法”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仅知道闹神拳时借“神仙”附体传授武功，而打仗前拳民都“喝符”（即把符画在黄裱纸上，烧成灰合水而喝），说可以“神法护体”，枪刀不入。这“法凭正气”是光绪二十四年后提出的，后来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暴动以后，据当时的拳民说就已经不喝符了。我们认为“法凭正气”即是提倡中国人民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正气”，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拳讲义和”和“法凭正气”的提出，都是王立言的贡献。

义和拳的重要首领董延邦

董延邦是高唐县姜店乡大董庄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本姓孙，乳名孙二，在大董庄独门独户。父亲早亡，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全部家产只有二亩半地和三间土房。他在家庭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十五岁时给邻村范庄周家抗小活（即周化南先生

家)，当时周家是书香门第，比较开明，对待雇工也较宽厚。他到周家以后，才起了名字叫孙延邦。

孙延邦十六岁那年已经是个彪壮的小伙子了。他的性格倔强，不爱说话，遇事沉思不语。但是手巧，什么杂活都会干。扛小活的主要活路是挑水喂猪之类的杂活，这年的初秋，周家的老掌柜走到猪栏去看孙延邦喂猪，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猪八月十五能吃上肉吧？”孙延邦心眼挺多，一听就知道说他没有把猪喂好。此后，便到马棚里偷来煮熟的黑豆给猪吃。喂马是大伙计的责任，大伙计发觉孙二偷马料，便打了他一顿，从此孙延邦便离开周家。

第二年，孙延邦跟着本村一个姓崔的铁匠师傅学打铁，因为孙延邦心灵手巧，加上力气又大，很快成了崔铁匠的得力助手。经过五年的学习和锻炼，走乡串村，孙延邦不仅学就了精湛的手艺，而且社会知识也丰富起来了。孙延邦二十二岁那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的师傅崔铁匠去世，此时他的手艺已非常精湛，但因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此只好在家里制作些小农具，到集市上去卖，不再走乡串村了，家庭生活也逐渐好转。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五（1897年12月28日），是邻村辛店大集，孙延邦去赶集卖些菜刀之类的小家什。辛店村有个恶棍外号叫唐大头，是天主教徒。在旧社会，进了腊月，集市上要收“地皮税”的，唐大头平素横行乡里，这一天他要拿孙延邦两把菜刀顶“地皮税”。开始孙延邦好言相求，说“家有老母，过年手头紧，你要用刀可拿一把去使”。但唐大头非要两把不可，后来由争吵而动手打架，孙延邦将唐大头痛打一顿并把他的头打破，孙延邦乃舍了摊

逃走。从此以后孙延邦就逃到徒骇河东高唐与茌平交界处，以打铁为生，并从此改名董延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董延邦去琉璃寺赶集，刚摆好摊子，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到摊子前看刀，这个汉子细高身材，长得很精神，看了一阵笑着说：“你的刀钢口挺好，会打长刀吗？”董延邦说：“只要有样子，什么样的刀都一样打。”“那么下了集再谈，到时我来找你”。村镇的集市一般午后即散，午后这个人果然来了，把董延邦领到寺里，这个中午汉子就是王立言。此后董延邦就在琉璃寺里安炉打刀，给义和拳打制兵器。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从此董延邦就把琉璃寺当成了他的家。

董延邦自辛店受辱逃亡以后，恨透了“洋教”，因此，不久就和王立言、徐福等人成为知己，并加入了义和拳，跟王立言学武，暴动以后，拳民们都称他二师兄。

义和拳的另一首领于清水

于清水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郝庄人。对他的身世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只在郝庄村于氏谱碑上看到，他的父亲名叫于岭，他的叔父名叫于鬼，他叔家有一弟弟名叫于清涟（此碑“文革”中被砸成两块，垫在村南的桥底下）。于清水是郝庄拳场的大师兄，于清涟是当时的拳民，他兄弟二人都绝后了。但他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流传着有他的很多歌谣，如“于清水真英雄，黄马褂子绿斗蓬；红缨枪拧三拧，一心要把张庄平”。他领导的拳民大约三百多人，火烧前张庄教堂他是参加者，当地群众中流传有“骑白马，挂响铃，打张庄，当先锋”的歌谣，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

他们任何活动。后来他在高唐南镇集上被捕而遇害，时间和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群众中流传着“说能行也不行，南镇集上上绑绳”的歌谣。

制造兵器武装自己

义和拳制造兵器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当然在这以前，各村的拳民也已经不断打制兵器，但大量打制兵器却是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的。因为董延邦是铁匠出身，他参加义和拳之后，不但自己打制，而且领导了这项工作，且作出很大贡献。高唐大董庄崔师傅死后，他的儿子继续以打铁为业，手艺也很精湛（现在崔家尚有后代，解放前夕仍以打铁为业）。董延邦在琉璃寺为义和拳制造兵器，各村的拳民随之也制造兵器成风，董延邦则帮助他们请工匠筹材料。如王屯村拳场的首领王汝言从在平冯官屯请来名铁匠谭东岭，打制兵器三个多月，董延邦则请来他的师兄崔××前来帮助。这一年以琉璃寺和王莫庄为中心，制造了大量兵器，这些兵器以大刀和长矛为主。与此同时，各地的铁匠也有不少自己打制刀枪到琉璃寺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的。据当时的拳民王立台回忆说：“闹神拳时徐庙、琉璃寺集上，卖刀枪的成了市”。这无疑为义和拳的暴动作了物资上的准备。

（二）

以上说的是在高唐境内义和拳暴动以前的情况。暴动以后，王立言仍为大师兄，董延邦为二师兄，徐福为“军师”。他们的拳民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立言、董延邦、徐福等领导的王莫庄、琉璃寺、大董庄附近的三百

多名拳民骨干组成，这些骨干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另一部分是打仗时临时集合起来的周围村拳民，组织纪律性很差。暴动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大的行动有：火烧前张庄教堂；会师城北五里铺；大战董古桥；围困高唐城；迈官屯散金济贫，最后是攻打禹城御桥韩庄。

王立言领导的这支义和拳，开始就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高喊“杀洋人，灭洋教”。从暴动以后的战斗情况看，三次直接对准“洋人洋教”，两次则是直接对清朝官府的。但是，正式暴动以后，他们的活动时间不到一年，在高唐境内即告失败了。

火烧前张庄教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十月初，琉璃寺的大寺门口悬起了一面红色的三角旗，中间一个黑色的“拳”字，此外没有其他标志，从此，周围的拳民就不断在这里集会。也就在这时，在平县衙派了二十名骑兵来守卫前张庄教堂。当时的张庄并没有洋楼，也不叫“洋楼张庄”，而叫前张庄，教堂只有五间拐子形平房，洋楼是“庚子”赔款以后修的，据修教堂后的碑文记载为：一九〇三年始建，一九〇五年竣工”（此碑“文革”中被毁）。所以，我们认为有关“烧洋楼张庄”的记述都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烧洋楼”的说法，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洋楼可烧。

烧前张庄教堂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这以前的几天，一名意大利籍的神甫住在前张庄，十二日晚上，王立言、董廷邦等商议第二天凌晨围攻前张庄，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当夜神甫逃走了。十三日

早晨，拳民在王立言、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人率领下，包围了前张庄（徐福留在琉璃寺没去），当时参加的拳民有四百人。在村西和官兵的马队及教民发生激战，不久官兵和教民被打跑，义和拳攻进村，放火烧了教堂。在这次战斗中，前张庄只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徒，当时前张庄天主教会会长张兆平之妻，被拳民杀死；另一名是高唐李官屯前小孙庄的老年妇女，是前张庄张金旺的外祖母，住亲戚的。她本不是天主教徒，当时捉住她后问她：“你在教吧？”但她却说：“干么！在教还该死吗！”于是被拳民杀了。

教堂被烧以后，拳民们用教堂房子的砖在前张庄村东西两侧修了两座“关帝庙”，义和拳失败之后，两座小庙又被教民拆除了。一九〇五年教堂重建后修起洋楼，之后把张兆平之妻的尸体移入教堂院内，并立了碑，碑上刻的是“张兆平之妻玛大勒纳”（此碑“文革”中被毁），玛大勒纳是张兆平之妻的“圣名”，“圣名”是教徒入教受洗礼时，神甫给起的名字。

这次行动的目的本来是去杀那个外国神甫，可惜他事先逃跑了，会长张兆平战败随官兵逃走，所以才捉住他的妻子杀了。其他教民都未遭杀害，拳民也未焚烧民房，可见当时义和拳的纪律是很好的，并不任意烧杀。据调查在这次行动中义和拳获得钱物不少，但说法不一，有的说“用小车推”，有的说“用火车拉”，这些钱物是教堂的，还是教民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这次行动在高唐、茌平一带的影响极大。

会师城北五里铺

高唐城北五里铺，也是天主教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光绪

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拳暴动时，该村有教民六十人，也有教堂。王立言等火烧前张庄教堂之后，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同董延邦一起率领四百多名拳民向高唐城北五里铺进发，与高唐城北的义和拳首领李泽会合。据当时目睹者说，这次行动的声势很大，义和拳有二十多匹马，王立言骑白马，穿月白色软靠，披大红斗篷，董延邦骑红马，也披大红斗篷。队伍穿村过镇浩浩荡荡从高唐东关经过，吓得官兵关了城门。在高唐城北五里铺和李泽会合后，义和拳的拳民达到六百多人。李泽是今梁村镇李化梓庄人，他的身世我们不清楚，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会武功，在高唐城北很有号召力。十月二十四日放火烧了教堂，当时这里的教堂也只有三间平房，洋楼也是后来修的。教民闻讯两股义和拳会师，早已跑光，所以没有打仗，也没有死人。北五里铺会师以后，王立言等人即按原定计划向平原县进发。

这次行动对高唐的震动很大，义和拳的队伍由南向北穿过大半个县，沿途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村的青年自愿投入拳民的行列。

大战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所领导的义和拳在离高唐州城仅五里的地方与李泽会师，并放火烧了教堂，使知州李恩祥既惊慌又恼怒。当时高唐有个姓陈的把总，据说会点武功，他向李恩祥自报奋勇，要领兵向北追赶义和拳，其实这时义和拳的队伍已经过去两天了。他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下乡去发财。陈把总带领四十多名官兵（有十多匹马），出城就抢，动不动就指人为“拳匪”，讹诈财物。他有意避开大道（由高唐通平

原的大官道)，从西路向北一直抢掠到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率众去平原，不知为什么，到恩县的腰站以后，又原路返回。十月二十八日（11月30日）返回梁村，拳勇们正在梁村休息，闻知有官兵在董古桥抢掠，王立言非常生气，于是他们就率众驰往，在董古桥以东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义和拳人多势盛，官兵大败而逃，当场死伤十多人。陈把总被王立言用双拐打断右臂而遭活捉，当场被拳民砍下脑袋，其余的人义和拳也没有追赶，放他们逃回州城。

董古桥大败官兵，义和拳声威大振。由两人用竹筐抬着陈把总的人头，一路向南直奔高唐城。

围困高唐城

董古桥官兵大败，陈把总被杀，高唐知州李恩祥吓破了胆。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义和拳到达高唐城时，早已三门紧闭（高唐城只有东、西、南三门），因此只好将城围住，这一天适逢高唐大集，赶集的人进不了城，在各门观看热闹的人很多。当时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住在南关，第二天上午由王立言出面喊话：“请你们知州到城上答话！”知州李恩祥果然来到南城楼。他问王立言：“众好汉意欲何为？”王立言说：“我们要反清灭洋，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吓得李恩祥连声说：“下官不敢与闻！不敢与闻！我是说要本人做些什么？”当时王立言提出要他答复四个条件，可以不攻城，一是要三百斤猪肉，一千斤馒头犒赏拳友；二是交出全部库银；三是要他三拜九叩拜“拳”字大旗；四是交出官印。李恩祥吓得浑身发抖，他说：“前两

条好办，后两条实在不敢从命，这无疑于要下官的人头！”这时城下的拳勇们高举刀枪大喊大叫着要攻城，处于无奈的李恩祥答应了前三条，只是官印无论如何也不能交。义和拳最后默许了。于是先交库银，据目睹者说有银子，也有铜钱，都是用抬筐从城上坠下来的，共有十五、六筐，这当然不会是库银的全部。午时，李恩祥在南城楼设香案拜旗，拜完之后李恩祥说：“请众好汉给下官个方便，把陈把总的人头赏给，好对他的家人有个交待。”王立言说：“把它奉送与你吧！”于是把人头扔进筐里提上了城。午后城上又坠下了猪肉和馒头。以上事实是家住南门里的姚伯芳先生^②亲眼所见。

这次围困高唐城，是义和拳在高唐境内活动的最高峰。之后义和拳却散去了大部分，李泽领着城北的拳民仍回城北，义和拳的主要骨干力量仍跟王立言、董延邦回到琉璃寺一带活动。由此可见当时各地的义和拳并没真正联合起来，也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王立言、董延邦在返回琉璃寺的途中，由王立言陪同董延邦回大董庄“祭母”，到他母亲的坟上痛哭了一场，随后就去了范庄周家。据周化南先生^③说，王、董二人带着四十多名拳民住在范庄，王立言骑白马，董延邦骑大红马，其他的人都是步行，王立言、董延邦在周家住了一夜。周化南先生说：“王立言长得很俊秀，也很健谈，董延邦仍然沉默寡言”。谈到围高唐城，王立言很兴奋地说：“没有打进城去，可也叫这些赃官们知道了我们的厉害！”周家很好地招待了他们，并赠给他们二百吊铜钱，作为对义和拳的“捐助”。此日上午辛店唐家地主大院派人用两匹骡子送去银子五百

两，大概是怕义和拳到他家抢东西。王立言等连钱带骡子全留下了。但义和拳失败以后，唐家却到高唐州衙告义和拳抢去他家很多财物，并诬告范庄周家“通匪”。他哪里知道李恩祥最忌讳说高唐大闹“拳匪”，因此勃然大怒说：“本州境内一向无拳匪，你简直胡说八道！”唐家地主当堂被重打一顿，哄了出去。

迈官屯散金济贫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一月初，由王立言和董延邦率领义和拳一百多人进驻了高唐城东的迈官屯，还有三十匹马，十多匹驮东西的骡子。老百姓对义和拳不躲避，村里的很多人都到街上观看。他们在这个村住了两天，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散金济贫，向老百姓散了很多钱。一天早晨，义和拳的人在大街上喊：“义和拳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穷兄弟们都到街上来！”不过，这散钱的方式很奇特，就是把铜钱装在布袋里，用马驮到村东的大道上，马随跑随把铜钱撒在地上，任老百姓随便抢拾，一时间邻村的老百姓也有不少人赶来拾钱，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究竟散了多少钱，现在也无法知道。第二件是招募人马，但方法也很简单，散完钱以后，由董延邦向众人说：“义和拳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愿意跟我们去的请报名。”据说在这一带招了一百多人，多数是青年，随后王立言等就率众向禹城方向去了。

攻打御桥韩庄教堂

禹城县的御桥韩庄教堂，是当时天主教的“总铎”所在

地，有洋楼和高大坚固的围墙。原在平县前张庄（即今高唐县的洋楼张庄）的天主教会直接属这里管辖。火烧前张庄教堂时，神甫就先跑到这里，所以王立言等义和拳的首领，对御桥韩庄教堂的仇恨极深。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一月中旬，王立言、徐福、董延邦、王汝言等人率领拳民四百多人，攻打御桥韩庄教堂。包围教堂以后，义和拳的士气很高，但在接近围墙时，被教堂内的“洋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义和拳就溃退下来。第二天王立言、徐福等人在附近村庄弄来十多个条编的大圈，圈里装土垒了起来，徐福登上圈去观察情况，并声称上去“施法术”，不料刚上去，就被墙上的“洋枪”击中，摔下来当场身亡。于是义和拳的队伍大乱，乱糟糟地退了下来。黄昏以前东面枪声大作，义和拳哪里知道这是省城派来的骑兵“洋枪队”，义和拳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被击溃而四散逃跑。后来“洋枪队”一直追到前张庄（俗称洋楼张庄）以东的窑地里，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激战，义和拳又死伤二十多人，从此这支义和拳队伍彻底瓦解，而宣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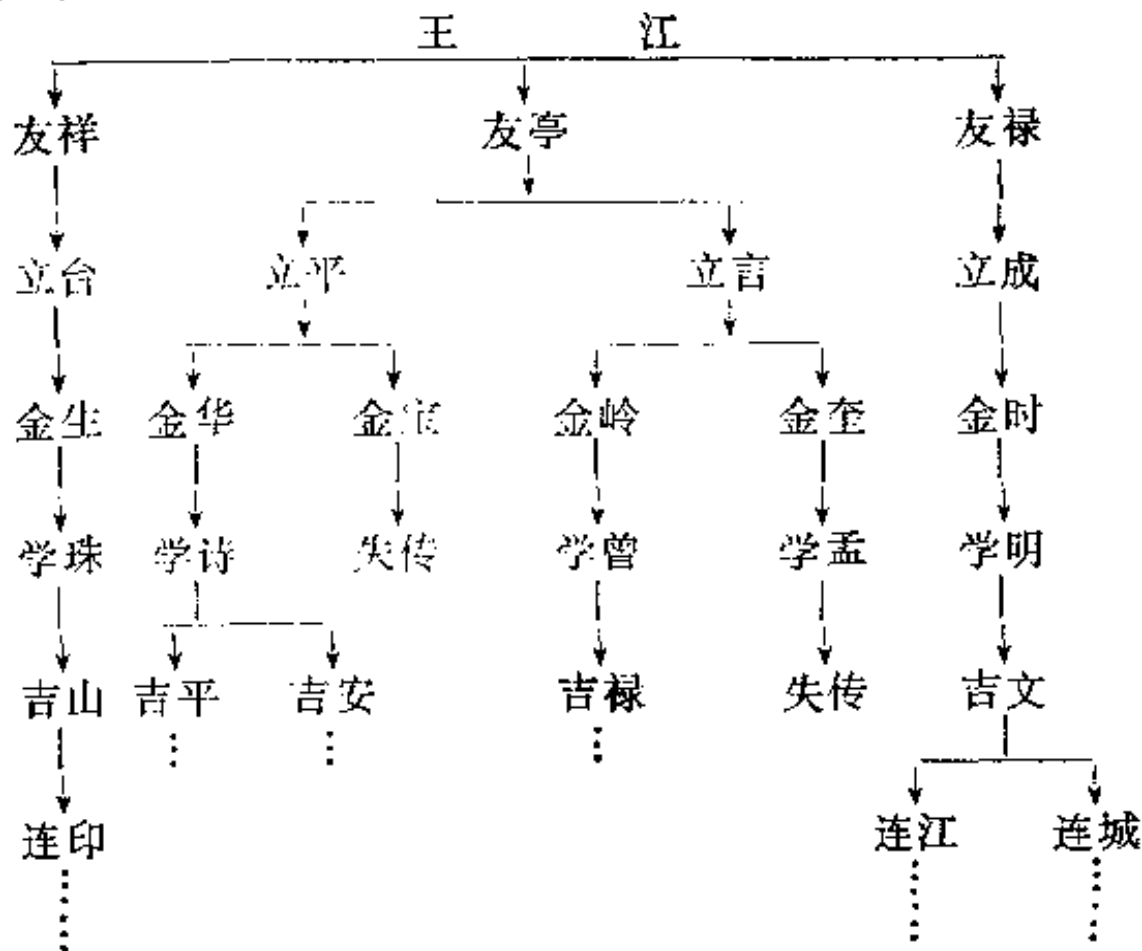
（三）

义和拳暴动失败之后，主要首领们都纷纷逃亡或被捕。王立言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被官兵追逼，最后没办法逃回本村王莫庄，藏在王金元家的夹壁墙里，后来被王立言的干儿（不知姓名）告密，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1900年2月4日）被捕，解往济南斩首。王立言的族人们凑钱（四十亩地钱）只买回了他的人头，葬于村西王氏祖茔之次。他的妻子徐氏在王立言被捕时投井自杀未遂，两个儿子王金奎

和王金岭藏匿乡间幸免于难；他弟弟王立平领着两个儿王金宝、王金华逃往山西，十多年后才返回家乡。现在就只有王立言的曾孙王吉禄和王立平的孙子王学诗在世了。

董延邦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也逃回家乡，隐藏在大董庄村他的挚友董恩荣家中。当他闻知王立言被捕以后，痛苦万分，当夜围着他的宅院转了三遭，表现出他难舍“故土”和怀念挚友的痛苦心情。他的挚友董恩荣在天津有一亲戚，于是次日一早就由董恩荣带领逃往天津。他的旧宅由董恩荣返回乡后，替他卖给本村的洪家，在五十年前洪家也绝后了。董延邦到天津后隐姓埋名，后来不知所终。

附图： 王莫庄王氏族系图



注：王莫庄王氏分三支：王江、王海、王波。以上族氏图系王立言的直系王江一支。

王屯的王汝言在失败之后，逃往武城、威县一带，以木工手艺谋生，后来娶武城县邴庄邴梧林之女为妻，生二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生活所迫，将次女寄托给威县丁家庄丁宝玺为养女，携妻子和长女返乡（长女配于琉璃寺蒋学舜）后来又逃往安徽谋生，至老年方才返回故乡，仍以从事木工为业，卒于一九四八年。因无子乃以其长兄之子炳怀为继嗣，其孙王守仁尚健在。

【后记】一九六〇年“庚子”六十年之际，因为高唐是义和拳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我县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当时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这次调查工作。我们邀请了李育轩^④、周化南、姚伯芳、赵绍堂、王会敏等教育界的老前辈们进行了多次座谈，这些人当时多已年在八旬上下。同时我们还组织人到部分重点村进行了调查，访问了许多当时拳民和义和拳主要领导人的后人，其中有王立言的堂弟王立台，王汝言的继子王炳怀等，这些材料都是他们亲见或直闻。本文是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而写成的。

根据当时调查，我们发现高唐境内的义和拳，从暴动到失败，没有用过“义和团”的名称。故题目乃用“义和拳在高唐”，同时也因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的活动。遗憾的是在那次大规模的调查中，始终没有发现朱红灯在高唐的活动，很多当时的拳民也没有任何人见过朱红灯。因此只好有待今后新发现。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历史知识实在太贫乏，希望史学界的同志们加以指正。

〔注解〕

①这幅对联是周化南先生提供的，他说“大觉寺”是琉璃寺的本名。此对联是口头传下来的，因年代已久，周先生说上联的“逐”字，抑或为“诛”。

②姚伯芳（1888——1981年）高唐县南街人。一九一一年毕业于聊城五年制中学，后被清朝定为贡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任南关小学校长，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县教科视学。解放后历任高唐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驻会常委、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③周化南（1881——1974年）高唐县姜店乡范庄人。一九一〇年创办高唐蚕业学校，任校长至一九二七年。该校停办后任高唐第四完小（辛店）校长。日寇入侵后，年事已高的周化南，先后流亡于开封、郑州、上海等地，一九四九年返乡。解放后历任高唐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④李育轩（1882——1971年）高唐县李奇庄人。一八九九年考中秀才，废科举后于一九〇五年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修史地专业，一九〇九年毕业后被奖授举人。之后先后任教于临清中学、东昌二中、高唐县中，抗日战争时期停教在家。解放后任高唐短师、女师、一中教师，一九五六年退休。曾任高唐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

（一九九〇年六月稿）

〔作者简介〕邵金铭，高唐县姜店乡刘郭庄人，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国立二十二中学，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文教科科员、县委宣传部干事、县政府办公室政策研究员、区农技站长，一九八一年离休。

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胜利

——殷传业率部起义的经过

邵金銘

一九四五年的金秋季节，在高唐县南部的天宫庙王庄，发生了一件震动鲁西北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伪高唐县第三区二团团长殷传业率众起义。一面红旗在高南飘起，一支新的革命队伍——“高南支队”从此而诞生了。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夏秋之交，高唐县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势力进一步向伪顽营垒伸展，将徒骇河以东的伪杂部队全部收编，就连血债累累的日伪四区团长庞长申，也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被封为山东省保安第八旅旅长。在这风云变幻的局势下，唯有日伪高唐县第三区二团团长殷传业，毅然率众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但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

殷传业是高唐县南镇乡殷楼村人，生于1908年，他兄弟三人：大哥殷传海、三弟殷传水，还有姊妹四人。在旧社会全家九口人，只有十六亩土地，家境十分贫寒。他父亲

殷炳正当“牲口经纪”（交易员），在旧社会被称为“捅牛屁股”的营生，养活一个九口之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殷传业青年时代给地主扛过小活，长大之后就跟小范庄的范中振学打铁，所以当地的人都叫他“二铁匠”。靠着种地和打铁的辛勤劳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一九三八年，殷炳正为生活所迫，乃将他最小的女儿带往济南，由河西王庄的李文元卖了。事后才知道他的女儿竟卖给了大土匪李采题，从而和日伪县长成了亲戚。

日寇入侵以后，高唐县三区由于地处高、茌、禹三县的三角地区，形势最为复杂，不少人打着“抗日”的旗号，在三区占地盘拉队伍。一九三九年春，原高唐县三区小董庄的王宪德，也打起抗日的幌子，组织所谓“抗日游击队”。王宪德是原国民党高唐县三区仁五乡的乡长，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他是殷传业的表姨父，当时殷传业就参加了他的队伍。这支游击队曾一度在河北南宫受过八路军的委令，当地群众都称之为“八游”。但时间不长，王宪德的游击队失败，他本人也逃往济南。

一九四〇年秋，王宪德在济南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和日伪县长李采题挂上了勾，于是又回到三区，当上日伪高唐县三区的团长，组织了三个中队。团部驻张庄，由李玉贵带一个中队驻守；一个中队由王金岭带领驻天宫庙王庄；一个中队由郭金祥带领驻苦水郭庄。这一段时间殷传业住在殷楼。

王宪德当了日伪团长以后，因苦于没有懂“军务”的人，梁庄村的周庆祥过去曾在旧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于是就派人请来了周庆祥帮助他训练部队。原来王宪德开始组建

伪团时，周庆祥的三个弟弟（周庆恩、周庆瑞、周五寅）就跟他当卫兵。经过一段时间，由于周庆祥直接训练部队掌握军务，则成了实力人物。一九四一年秋，经过长期密谋之后，由卫兵徐央文开枪将王宪德打死，周庆祥自己当了团长。这时，日伪县长李采题命令周庆祥，将天宫庙王庄王金岭部的武装交给殷传业，并正式委任殷传业为高唐县三区二团团长，周庆祥部改称一团。

殷传业正式任日伪高唐县第三区二团团长以后，其发展是较快的。至一九四三年底，已经有五个中队，兵员二百三十人，团部设在天宫庙王庄，并在殷楼、长郭庄设有两个据点，由殷玉田带八十余人驻殷楼；由曹振兴带五十人驻长郭庄。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杨敬斋曾一度攻打日伪据点蛮子营，当时攻进大围子，但小寨未被攻破，因此与日伪三区区长王祝林结下深仇。是年秋，杨敬斋率部去琉璃寺，王祝林调动伪军攻打杨敬斋，行至于屯村时，周庆祥将王祝林打死，并把王祝林的人头送给杨敬斋。日伪县长李采题为此而大怒，乃调集八个区的伪军攻打周庆祥，周庆祥率团部和郭光林的一个中队投靠了吴春阳，日伪一团团长由蔡长申接替。此后，殷传业的部队进一步扩大。至一九四四年底，已发展到三百二十人，有机枪二十四挺，短枪三十支，并在是年之初，建起有三十人的“造枪局”，成为高唐县三区最拥有实力的集团。

（二）

抗日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一年，我党在高唐、茌平、禹城之间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属冀鲁豫一分区领导。这块根据

地东起潘店，西至红庙，东西长三十里，南北宽不足十里，群众说是“一枪打透”的根据地。西有罗兆荣，南有李岐山，北有殷传业、庞长申，形势严峻而又复杂。我党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必须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还必须对日伪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殷传业的势力范围处于高唐县的东南角，和我根据地的接触最多，为此，我党通过社会关系首先对殷传业进行争取工作。

在平县周老庄的周怀温是殷传业的姐夫，他和徐家河口徐宝珊家是老表亲。周怀温的儿子周子愚（即周影）在冀南军区新八旅工作，后来与徐宝珊的女儿结婚。周怀温思想进步而又机智，因此党组织乃授命博平县长李建民（外号李大炮）和当时任博平大队长的徐宝璧通过周怀温做殷传业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刚刚开始进行工作时，殷传业的态度很冷漠，但周怀温是他的姐夫，他又不便于翻脸，因此，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二年秋，我党已派刘玉岐同志打入殷传业部，在军队当了警卫员，加强了党的情报工作，对及时了解殷传业的动向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一九四三年秋后，我党经过地下工作者刘玉岐、许丙炎等同志的联系，决定由冀鲁豫一分区主力一团、二团夜袭庞长申的据点徐官屯，许丙炎作为内应。但是，当晚我军有新的紧急任务执行，一团调走，只留下二团。因此，临时改变计划，由老二团对殷传业部采取“敲山震虎”的措施，实行突然袭击而围攻了天宫庙王庄据点，并一度攻入村内，战斗相当激烈，黎明前二团撤出战斗。经过这次战斗以后，殷传业感到形势危机。因为他曾亲自经历过日伪军内部互相火并的事实，虽然有李采题的支持，但西有庞长申，东有吴春阳，如果南、西再遭八路军

袭击，形势十分不利。正当殷传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周怀温再次找到他，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殷传业答应和共产党建立联系，并主动提出三条保证：一是不管任何情况下不打八路军；二是不骚扰根据地的群众；三是可以给八路军修理武器（因他有军械所）。就这样和我党建立了联系。

一九四四年秋季，经过一段工作，殷传业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表示相信共产党，答应周怀温要送给博平大队机枪一挺。但是，机枪造好以后试射性能很好，殷传业这时又有点舍不得，推说：“再造了以后给。”周怀温很气愤，于是带着妻子（殷传业的姐姐）到了天宫庙王庄，对殷传业说：“共产党八路军讲信用，我们也要讲信用。”说服了殷传业。一天夜里，周怀温将机枪装在布袋里，由殷传业的亲信卫兵郭金石（殷的表弟）护送交给了徐宝璧。从这时起，我党和殷传业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为日后起义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

由于我党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一年多的细致工作，争取殷传业的工作进展较快。殷传业在行动中执行了他的三条保证。一九四四年秋季，博平伪军罗兆荣协同治安军对在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地扫荡，我博平县大队奉命东撤，根据地内的大批群众向北逃至高唐县境内，有七、八百名老百姓逃至天宫庙王庄南的大洼里，这时，殷传业下令：“任何人不准出寨，不准开枪截击”，他亲自在寨墙上观察情况，发现罗兆荣的部队没有进入高唐县境内追击，才回到团部。这时，天已近黄昏，敌人仓促收兵。在这次行

劫中，保护了根据地的群众，体现了他与共产党合作的真心实意。一九四四年冬季，罗兆荣又一次扫荡根据地，许多群众逃到燕李庄村外，殷传业的士兵发现一个穿长袍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殷传业立即说：“把他带回团部”，当时即命令将此人安置在王庄王雨轩的家中，次日晚上，叫周怀温领走，这人在南镇住了十多天，后来知道此人是我们当时博平县的建设科长（现在贵州工作）。殷传业担很大风险保护了我党的干部。

不仅如此，自从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之后，该部的纪律也比较好，特别是不骚扰解放区。一九四五年春季，殷传业部一个叫金正一的士兵，在在平北部劫道，被根据地的民兵追到王庄据点的村外。当时殷传业正在寨门上站着，问清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亲自将这个士兵处决。

（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我党争取殷传业部起义的过程也是如此。在整个过程中，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对伪顽势力的收买，到处封官许愿。殷传业部有个叫张保忠的人，是国民党员，在殷传业团任军事教练。一九四五年初，他就和国民党专员王金祥勾结在一起。因当时王金祥经常住在张大屯吴春阳处，因此他就劝说殷传业和吴春阳联系，妄图拉殷传业投靠王金祥。还有博平大刘庄的刘子义，在殷团任军需处长，秦兰斋在殷团任文书，这两个人都很反动，经常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靠不住”，“八路军嘴甜心苦”等等。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党必须加强对殷传业的争取

工作。一九四五年初，周怀温曾多次提出要殷传业和李建民、徐宝璧直接见面联系，殷传业则提出：“这些人我信不过，我外甥也是八路军，俗话说‘鸡不叨豆，外甥不打舅’，如果叫我外甥来，我是信得过的。”他的外甥就是周怀温之子周子愚，化名周影，当时在冀南军区张维翰的新八旅工作。于是冀鲁豫一分区政治部乃向晋冀鲁豫大军区写了报告，辗转半年的时间，才将周影调到冀鲁豫一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把党的关系介绍到博平县委。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周影奉命首先进入殷楼，以看望其外祖母为名住在殷楼。当时殷传业正在高唐开会。三天以后，周影只身进城，在城内果木市街二团办事处找到他舅父殷传业。殷传业见到周影大惊失色，当时说：“你怎么跑到城里来了？叫你姨夫（李九）知道了那还了得！你赶紧出城。”于是派亲信郭金石护送周影连夜赶回天宫庙王庄。郭金石系苦水郭庄人，是周影的两姨舅，他知道周影当了八路军，回到王庄后精心保护他。周影也立即着手工作，观察地形，了解士兵的思想动态，同时秘密建议殷传业和李建民、徐宝璧直接接触。殷传业提出观察一段时间，待机行事。就在这时，张保忠发现事态有变，拉拢殷传业投靠国民党的计划难以实现，借口和吴春阳联系，以“稳住东面，全力防范庞长申”为由，带领郭金石前往张大屯，结果被吴春阳连枪支和马匹全都扣下，郭金石只身逃回，张保忠投靠了吴春阳。这次事件的发生，使殷传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东有吴春阳，西有庞长申，都在虎视眈眈寻找机会。因此，何去何从必须迅速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殷传业同意和共产党商谈。一九四五年农历六月间的一个夜间，殷传业只带郭金石一个警卫员，在天宫庙王庄南第一次

会见了徐宝璧，商谈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四天以后，殷传业又派周影带警卫员郑丕会夜间在于屯会见了徐宝璧。战友见面格外兴奋，周影见面就问：“苏联红军打到哪里了？在据点里什么也不知道，真闷死人了！”徐宝璧向周影传达了冀鲁豫一分区政治部的指示：“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把军械所（造枪局）撤到根据地；第二步正式宣布起义时，分区派部队接应。”这时，打入二团内部的刘玉岐同志，也加强了对士兵的宣传和个别串联工作。为了防止起义时有变，特别注意掌握殷传业的手枪队。有一次，刘玉岐同志对卫兵郑丕会说：“日本鬼子已经不行了，听说铁军（即新八旅）开过来了。如果有什么变化，千万小心！”通过党的秘密工作，对稳定军心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按照既定的计划，农历七月十九日夜，由博平县大队和冀鲁豫一分区二团的一个营接应殷部，殷传业把“造枪局”由王庄撤出，交给一分区司令员刘志远，同时对粮食等军用物资进行了疏散。就在起义准备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庞长申突然对殷楼进行围攻，当时殷传业部驻殷楼的士兵只有三十多人。周影闻讯后，立即和殷传业商妥将情况报告一分区司令部。次日凌晨，冀鲁豫一分区二团的一个营赶到王庄，这时殷楼的据点已被攻破，日伪军正在烧杀掠抢，周影同志亲自带队出击，庞长申的部队闻枪声立即逃跑。二十四日傍晚，二团在团长傅春藻同志率领下和徐宝璧共同进驻燕李庄，对殷传业部进行了迅速接应。当天晚上由徐宝璧讲话，号召全体官兵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殷传业宣布了起义。由于我党长期有效的工作，除反动分子刘子义、秦兰斋乘机逃跑以外，全体官兵积极响应

起义。从此，一支新的革命队伍——“高南支队”诞生了。

(五)

殷传业起义以后，被改编为冀鲁豫一分区“高南支队”，殷传业任支队长，李长江任副支队长，李国钧任政委。这支新的革命队伍从诞生之日起，立即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战斗中去。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冀鲁豫一分区二团奉命围歼梁桥伪军薛希祥部，高南支队负责打援，阻击东进增援的罗兆荣部。拂晓发起攻击，午间，罗兆荣的部队三百多人从正西压过来，我高南支队在张儿马庄展开阻击战。李国钧、殷传业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战斗，击退罗兆荣部，并毙敌五十余人，保证了二团主力全歼梁桥守敌的胜利。时隔不久，庞长申派兵对根据地进行骚扰，在红庙、寨庙、刘庄大肆烧杀抢掠，我高南支队闻讯立即组织反击，在红庙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击毙敌人十余人，将敌人打跑，保证了群众的安全。在此以后，为保卫根据地，高南支队先后在庄庄、夏庄对吴春阳部进行了致命打击。一九四六年一月，“高南支队”和博平县大队合并为“高博支队”，仍由殷传业任支队长。六月改编为“冀鲁豫一分区六团”，殷传业任副团长，并参加了攻打聊城战斗。

殷传业起义以后，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殷传业奉命进入西郭庄劝说日伪五区团长郭达诚投降。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危险的工作。当时，西郭庄已被围困两个多月。同时，高唐县日伪三区区长殷之冕、清平的刘序荣等很多日伪头目都躲在这里，反动势力很大。一旦敌人翻脸，就有生命危险。当时正在往北作

战的殷传业，接到命令后星夜带警卫员刘玉岐、郭金石等赶到高唐五区焦庄，会见了冀南一分区白司令员。白司令员指示：先派刘玉岐同志进入据点，进行联系性谈判。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刘玉岐同志首先只身进入据点，经过一上午的商谈，郭进诚表示同意和殷传业直接谈判。是日下午，殷传业带刘玉岐、郭金石深入虎穴西郭庄。经过谈判之后，郭进诚当面答应谈判条件。殷传业回部队汇报情况，不料次日凌晨，敌人弃寨逃跑。我军闻讯追击，大部分伪军被击溃，只有一百余人逃往齐河。虽然这次劝降没有成功，但有效地瓦解了敌人，也表明了殷传业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一九四六年底，殷传业转入地方工作，先后任冀鲁豫造船厂厂长，专署管理员，聊城地区交通局运输科长，德州地区交通局公路科长等职。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德州。

（此稿由周影、郭金石、郑丕会口述，刘玉岐同志提供部分文字材料。）

注：周影，原名周子愚，茌平县周庄人。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南军区新八旅“釜南支队”参谋，冀鲁豫一分区六团参谋，分区参谋，冀鲁豫军区教导队队长，贵州省郎岱县法院院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等职。一九八三年离休。现住茌平。

1990年11月脱稿

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朱 九 武

在高唐县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我的胞兄朱九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今就我所知，作较详细的记述，以使读者了解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曾较长时间担任高唐县委书记的庞均同志，晚年担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时，曾电邀我到石家庄。他对我说：“我一直认为九文哥是参加过我们共产党的，时间大约在金谷兰领导农民抗捐暴动时。”我如实回答说：

“我也有过这种猜想，但九文哥生前始终没有向我说过这方面的事，只说过他非常珍惜与金谷兰的私谊交往。”庞均对朱九文在八年抗战中的功与过，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政治上，他有泰山压顶不弯腰，带领朱庄人民拒匪、反顽、抗日的一面；又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为了生存适顽就伪的一面。在性格上，他有坚强、疾恶如仇的一面；又有脆弱、随波逐流的一面。在处世上，他有精明的一面；又有十分糊涂的一面。正如解金声同志在回忆高唐抗日斗争时说的：

“朱九文团原系在二区朱庄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打日本比较坚决”，他是那样的进步，但又不能善始善终。他两次脱离人民军队，从而酿成终生的遗憾。纵观九文的一生，他英勇顽强地打过鬼子，又当过伪军汉奸（虽然是被迫的）；他曾

断决反对过不抗日的国民党，而又参加过挂牌国民党的土顽部队。他“翻云覆雨”，是高唐抗战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人物。近年，一些首长和战友，以及高唐负责党史、文史资料的同志，都一再催促责成我写一写朱九文，但我一直深感不好下笔，这并非他是我的胞兄，而实在是对他一生充满矛盾的行状不好驾驭，但毕竟我对他了解得又较多，现本着内荐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良知，秉笔直书，把我所知道的朱九文记述出来，供高唐史界参考。如有不当，请予批评。

一

朱九文，字化南，1911年生于高唐二区官道朱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1919年起，读私塾十年，1929年到高唐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结构，许多书香门第中的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向城市转移，渐趋经商。我们朱家数代耕读传家，说不上殷富，也算小康，但到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走下坡路，面临着能否保持温饱的问题。所以，我祖父和父亲寄厚望于我长兄，希望他能从商，改换我们世代死守农田的门庭。当时的学徒，并非后来的“店员、”“工人”，他们是掌柜、老板的奴仆：煮饭、喂狗、端尿盆、伺候老板娘，那些卑贱的营生都要干。三年学徒期满以后，才能站柜台，学些从商的技艺。九文由一个书香门第的读书人，而突然变成洗碗做饭的小伙计，倒还能忍受，因为世代人都有“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的思想。九文学徒的这家杂货铺，是家小本经营的小字号，劳作之余还要担上货郎担去沿街叫卖。

一天，他在叫卖中被一名黑狗警察拿去许多东西，当讨钱时，却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到店铺，不仅得不到老板的宽慰，反而因“损失了货物”又被臭骂了一顿。九文一气之下，逃回家来，抱住母亲失声痛哭。慈母怜子心切，苦苦哀求我父亲准其不再当学徒。时下当学徒，是等于订了卖身契约，谁在中途停约都要赔偿对方。学徒是没有工钱的，如主人半路解约，要给学徒工钱；相反学徒者半路不干，则要向老板赔偿损失和饭钱。我们花了许多钱，托人说合，才得以解除学徒契约。这件事，给我们“平静”的家庭增添了许多麻烦。

九文回家以后，再不愿把自己拴在牛屁股上，在本村几位跑济南拉脚的长辈影响下，一心想赶马车拉脚去“闯荡江湖”，终于说服祖、父，卖了家中的耕牛和毛驴，买了两头骡子，套上马车，开始了上高唐，下德州，去临清，走济南的脚户生涯。这时，九文结识了金谷兰。谷兰是领导鲁西北农民暴动的著名共产党人，他的思想品行对九文影响是大的，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九文当脚户，稍有收益，又买了一头骡子。到1934年，他和我姐夫林长全合资在高唐城内中街开了“中西药房”。此后，他的结交更广泛了。谷兰同志出狱后，仍是他药房中常来常往的挚友。这时的九文，已经脱离幼稚状态，趋向成熟，成为一个忠厚、诚实老练、待人接物比较周全、在亲朋乡邻心目中足以信赖的有凝聚力的人物。我父、祖都有文化，但都强烈地信奉中庸哲学，主张办事、置田都不要冒尖，认为树大招风，信守一个“中”字。这些孔孟之道，对九文的影响很大。他支撑门户以后，仍有强烈的安分守己思想。他在钱眼上并不黑心，主张大家都能

过得去，主张处事不要一头碰到南墙上，要留后路，要有回旋的余地。这种单求“茅屋不漏”的思想，始终左右着他的一生。

二

1937年7月，芦沟桥一声炮响，打破了九文“安居乐业”的天真梦。他唯恐以后在城里侍奉日本人，断然结束了收益可观的中西药房生意，从城里回到朱庄，以待局势的变化。当日寇铁蹄刚刚踏上宛平县，国民党的军队就溃不成军，闻风南撤。败军沿途烧杀抢掠。随之遍地而起的一些社会渣滓，纷纷打出了时麾的这种军、那种团，名曰抗日，实际到处打家劫舍，明火执杖地肆意掠夺。这些败军和各种牌号的“义勇军”、“救国军”为非作歹，今天来一帮人催粮要伙，明天来一张条子要银元，要白面，更有甚者，到处绑票架人，动辄抛出数千上万银元的价码才能赎人，闹得完全成了一个虎狼横行的社会。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各村各寨都向联合自卫的方向发展，保家卫村成了当务之急。朱庄也不例外，面对周围已出现的祖长德、陈耀泰、王长山、陈振兰、陈胜堂、云茂才等数十股土匪队伍，众望所归，纷纷要求守土自卫。朱庄鲁其俊、朱友堂、朱九州、朱九常、王振河等急公好义受人尊敬的长辈，被群众推选出来，成为组织者。一天夜里，这几个人正在朱九州家开会，具体研究防守计划。正在房上守夜的朱明鹤，突然发现土匪包围了朱九州的宅院，刚问一声是什么人，即被土匪开枪撂倒（负重伤）。全村人闻枪声立即奋起自卫。经过一场激战，打死两名土匪，其余的人乘混乱逃走。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朱庄

人守土自卫的士气。但，打死了土匪，土匪也绝不会就此罢休。九文主张还尸议和。果然，说客上门来讨尸，说是一场“误会”。他们是邻县平原土匪祖长德的部下，目的是来朱九州家拉票。

朱庄首战获胜，等于向上匪宣了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全庄人公推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朱九文为领头人，全村老少都愿听他的指挥。朱庄自卫获胜，也震动了各村，村村纷纷起来联防，呼吁彼此支援，共同御匪，朱庄人也迫切需要走这条联防的道路。在与各村协商签订联防盟约和各项应酬活动中，九文又起着主心骨的主导作用。不久，朱庄与钱庄、谢王庄、蛮子营、董官屯等村，缔结了联防公约。

为了更好地保卫村庄，朱九文又与原高唐三区老君堂的李玉广（字汉卿）民团、原三区南蛮子营的王竹林、原高唐一区吕寨的梁树梓（当时他的民团势力较大）共同缔结了联防公约。朱庄在危难时确实得到李、梁民团的有力支援。

果然不出所料，1938年阴历正月初七，祖长德勾结陈耀泰、陈振兰、王长山、桂文灵、云茂才等十余股土匪，出动六百多人，乘夜包围了朱庄。祖长德与匪首们共饮血酒发誓：“不踏平朱庄，我们弟兄就无脸见人！”但朱庄人并未被吓倒，在九文的率领下，奋起自卫，与朱庄联防的各村也闻枪声赶来支援。大家内外夹击，经两小时苦战，终于打退来犯之匪，保全了村庄。这次战斗，土匪又遗尸八具，我们缴获长短枪九枝，战马四匹。胜利来之不易，朱庄朱明岭、刘德祥英勇献身；程性之、王立相等人负伤。

是年临近麦收时，一股土匪又来洗劫董官屯。朱庄人听到枪声，九文和鲁其俊迅速带领七十多人去支援。激战一小

时，全歼来犯之匪一个整连。谁知，打了土匪，惹下麻烦，因为这股土匪是国民党齐自修的部队。经九文与区长商量，赶快释放全部俘虏，发还了他们的枪枝。这时，齐部又派来了一个营长，点名要董官屯交出“肇事祸首”朱九文。结果，请客送礼不济事，又送齐自修部一千个银元，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不久，齐自修投降日寇，又与朱庄有仇的祖长德勾结在一起，放出风说：“定要血洗朱庄，活捉朱九文报仇！”麦收在即，朱庄人人心情沉重，不知那天要大祸临头。九文作为全村的带头人，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对我说：

“个人安危无所顾忌，既然当了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容后退，但朱庄的命运可虑，自惭能力不足。”我父亲见九文愁眉不展，就宽慰九文：“车到山前必有路，带头人要精神振作，有天大的心事，也不能愁眉苦脸啊！”正在这时，我叔伯弟弟朱九卿进来说，有九文哥一位朋友来找他。客人进来以后，九文并不认识。对方自我介绍，叫杨厚基，是八路军冀鲁边支队派来帮助朱九文的，是为其分担忧患，帮助朱庄人民摆脱困境的共产党员。他代表县委和冀鲁边支队，高度评价了朱九文带领朱庄人民在抗匪联防斗争中所取得的战斗功绩。杨厚基的出现，给朱庄人民送来了春风，也给朱九文带来决心抗战到底的勇气。接着县委又派来一位年轻干部赵毅民。朱九文在杨厚基、赵毅民两同志悉力辅佐下，迅速集结三百四十多名武装队员，到三区杜庄驻防，成为八路军领导下的农民自卫队。接着，一位叫谭锡三的特派员（外省人）又代表冀鲁边支队孙超司令、彭天杞政委来看望大家，并给这支农民武装授旗，正式纳入冀鲁边支队的行列。是年9月，经过精简整编，留下六十多人。我们奉命从杜庄移防

到夏津县城里，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冀鲁边支队，直属特务连，杨厚基任指导员，赵毅民任副指导员。孙超司令和彭天杞政委亲自接见讲话。10月，组织上派我和李文月去支队教导队学习。一个月后，我被调到支队政委彭天杞身边当警卫员。从此，我和九文哥分手了。

三

1939年春节时，老家两次来人，说我父母身体不好，老人很想念儿子，愿叫一个儿子回去。九文至孝，不忍心父母久久牵挂，就找我商量，主张我们两人中回去一个。我当时年轻不懂事，怀疑九文是吃不了部队的苦，就生气呛他说：“要走你走，我是不打败日本鬼子不回家！”厚基、毅民都不同意九文走，九文就直接找孙超司令，请求离队回家侍奉双亲。孙司令和彭政委见九文走意甚坚，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念他带领一支武装参军有功，特意请他吃饭，并以叫九文为父母买些礼品为由，赠给他百十个银元。九文走时曾激动地说：“那怕只是一元钱，这是共产党、八路军对我的奖励，我不能不接受。”

九文在领导朱庄人民拒匪抗顽最危难的时刻，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带领一支完整的武装连队集体参加了八路军，到1939年初春，又经组织批准自动离开部队，满打满算不到一周年。这一段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较顺利发展的时期，朱庄也比较稳定。九文从部队回到朱庄不久，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原有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土匪团伙，一部分被日寇“招安”，如祖长德、曲捷清等，一部分正式被纳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十军团石

友三部的序列，公开与八路军决裂。他们捕杀、活埋共产党人和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军民。九文和朱庄人民，又陷入日、伪、顽的包围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回家当一名孝子，好好侍奉父母，做个安劳务本的农民，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允许他这样做。为了朱庄的自卫，邻里乡亲又把他推上领头人的地位，带领朱庄人民再次举起抗日拒匪、守土自卫的旗帜。这时（约在1939年底）已经完全投靠了国民党的陈胜堂，为了扩充实力，拼命招兵买马，并向朱九文招手了。朱九文没有在真空中，也找不到封村自守的安乐窝。为了生存和保护朱庄不受侵害，也需要找个靠山。一个相邀，一个“自愿”，各有各的打算，一拍即合——朱九文接受了陈胜堂的委任，出任了国民党高唐二区区长兼区团长。

在这个阶段，由于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活动区域一度缩小。平原、高唐、恩县成了国民党吹嘘的“抗日模范区”。虽然朱九文身披国民党区长、团长的绶带，而他毕竟当过八路军，接受过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仍然或明或暗地做一些有益于我抗日部队的事情。有这样两件事，可以说明他当时的表里。一是他与我父亲朱友堂、伯父朱升堂共同营救我军一个负伤掉队的战士；二是他经常利用身在敌营的这个有利条件，为八路军送一些象鞋袜之类的日用品。

1939年旧历三月初四，八路军津浦支队新一营，在营长曹丕堂带领下，由堂邑县出发，向平原、禹城方向转移（时，我在营部任通讯班长），一天拂晓，驻进禹城八区常赵庄。筑先纵队副司令朱德崇随我营行动。我们刚驻下，即听到稀疏的枪声。朱副司令和曹营长到寨墙上观察敌情（时，我在他们身边），当即看到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逃难的

人。朱副司令断言：是日本鬼子出来扫荡了。可是部队已来不及转移，很快日寇骑兵就把常赵庄包围了。我军立即投入掩护逃难老百姓的阻敌战斗。这一仗打了一天，到黄昏才撤出战斗，敌我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此战，在战史上被称为“常赵庄战斗”，也叫“常赵庄遭遇战”。三连一个班长叫宋玉文，负重伤后掉队，爬了一夜晚，才到朱庄，找到我家。适九文刚从部队回来，还没公开露面，立即把宋玉文同志掩藏起来。因我家“树大招风”，九文和我父亲、伯父商量：认为在我家不安全，立即把他转移到我伯父朱升堂家。朱升堂是贫农，靠得住，他把宋玉文藏在放柴禾豆秸的小南屋里，把铺位安放在柴草背后。九文写了信，叫升堂的儿子九芳到周官屯请来医生傅钟林（曾和我们一块参加八路军，后又回家），给玉文治伤。三个月后，玉文伤愈复原才回部队。宋玉文回到部队后，就把曾在我家养伤一事告诉了我。他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九文、我父亲和伯父的细心照料，他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九文在当国民党的区长之时，当时活动在恩县、高唐地区的曹丕堂营长，原是九文的首长，杨厚基、赵毅民是他的老战友。他们经常得到九文的接济，并与九文秘密保持着联系。九文曾给我军送过鞋袜、牙粉、肥皂、食盐、药品等物资。曹营长每次得到九文的赠送，都兴奋地悄悄告诉我：“九文又送东西来了。”还曾批评过我：“你不要总是埋怨九文落后、不抗日，他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还是有贡献的。”

四

朱九文当了陈胜堂的区长和团长以后，陈胜堂并不相信

他，所以，派了亲信刘福成任副团长，掌握九文的武装。刘福成学生出身，又是我们朱家的女婿，福成岳父朱九余是我们同族哥哥，福成的年龄、学识、阅历都不及九文，他内心是敬重九文的，加上从亲戚角度上讲，他辈份小，所以，并未构成对九文的威胁。

陈胜堂有个亲侄子叫陈耀泰，是个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惯匪，“七七事变”后，也拉起杆子，结伙为患，曾伙同祖长德攻打朱庄。九文当了“团长”以后，陈耀泰又投在九文麾下，当了队长。九文收容这个土匪，并非与他“化干戈为玉帛”，无非象九文投陈胜堂那样，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陈胜堂与陈耀泰虽是叔侄，但二人却有不共戴天之仇。陈胜堂三番五次密令朱九文处死陈耀泰，意在借九文之刀杀其侄。九文多次调解无效，就屈从了陈胜堂的淫威。另一方面，也想洗雪陈耀泰伙同祖长德攻打朱庄之耻。即策划了以宴会为名，捕杀陈耀泰的计谋。时值深秋，枣梨皆熟。九文在其区公所房内请陈耀泰喝酒，屋外的护兵抱着陈耀泰的护兵摘枣，趁机下了陈耀泰护兵的枪。然后以举杯为号，令埋伏的枪手从窗外黑暗处向陈耀泰射击，但没有击中。陈耀泰一拳打碎罩子灯，趁机破窗逃走。然后带着他手下的人，逃进县城，投了高唐县伪县长李采题。这时我已接受了党让我转入地下，争取朱九文团反正的使命，回到家中匿藏。九文计杀陈耀泰事先没有向我提起，失败后我曾委婉地批评他：

“不该为了陈胜堂而恶了陈耀泰。”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帮助九文树立除恶务尽的决心，否则必为陈耀泰所伤。

果然，李采题恰恰任命陈耀泰为（九文所任国民党区长

的二区）伪区长兼团长。陈耀泰上任伊始，为公（争夺地盘、粮税），为私（报九文谋杀之仇）都把他的满腔仇恨对准了朱九文。陈耀泰曾在神案前对天盟誓：“不杀朱九文，誓不为人！”

此事反而促成了九文下定收留我并替他掌握军权的决心。陈耀泰当了汉奸以后，疯狂地“讨伐”、“扫荡”、捕杀抗日军民，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成为日寇在高唐的一个最凶残的恶狗。我以“军事教官”的身份进入朱九文团之后，威义兼使。在“威”上，首先严厉整饬纪律，明令不准扰民害民，违令者杀。事有凑巧，正这时，团部手枪队一个士兵强奸民女。这事由我主持，让苦主在队前把强奸犯认出，我在队前亲手处决了这个坏蛋。这种事情以前在半匪半军的杂牌队伍里经常发生，但向来无人过问。不久，又有一个手枪队员回家探亲，在他本村杀了两个人。地下党通知我说，他杀的两个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我便以扰民杀人罪，在全团部队前亲手处决了那个手枪队员，替我们死难的同志报了仇。这两件事我都是先斩后奏的，九文丝毫没有责怪我，反而表彰了我，干得对，干得好！他说：“治军只有这样从严，才能带出一支有战斗力，能令行禁止的部队。”在“义”上，我向部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士兵的抗战意识。朱九文对此也给予表彰和支持。但也曾警告我：“八路军那套治军方法很有效，但我们现在是国民党的部队，不能太表露了，免得陈胜堂怀疑。”

我在九文团刚站稳脚跟，陈胜堂身边有一个沈鸿烈，是上头派来的政训副旅长，实际是个特务，曾出面审查我，布置刘福成监视我。刘福成把实情告诉我，并又替我在陈胜堂和

那个政训副旅长面前说好话圆合，说我是“青年学生，吃不了八路军的苦，才逃回来的”。当时因这种情况脱离部队的不少，所以才取得政训副旅长的认可。我下定决心除掉心腹之患陈耀泰，消除对朱九文团的威胁。陈耀泰的副团长曲捷清（外号“曲瞎子”），与其沆瀣一气作恶多端，是陈耀泰的膀臂。一天，我听说“曲瞎子”的母亲死了，要大肆举丧光宗耀祖。我判定陈耀泰一定会去祭奠，征得九文批准，精选近四十名骁勇，乘夜色奔袭曲庄，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朱九文夜袭“曲瞎子”事件，在高唐以及邻县各杂牌军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说打得好，为民除害；也有的说不该乘人之危袭其母丧，但得出一致的结论：朱九文意在消灭汉奸，是真心抗日的。这一名声传出，有得也有“失”；得之是民众的拥戴；“失”之是引来日、伪、顽三位一体联合对付朱团，就连跟陈耀泰有深仇大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陈胜堂也对朱九文有了微词，说什么“朱九文羽翼渐丰，不能不严加提防。”

朱九文夜袭曲庄后，陈耀泰、“曲瞎子”脑羞成怒，1941年腊月十九日亲领日本鬼子山口中队长，带领300多人的日伪联队，分三路包围了朱庄。当时我带少数人驻守蛮子营，九文带大部住在三官庙和杨官屯，朱庄村内没有一兵一卒。日寇先用掷弹筒向村内射击，接着以密集的枪弹向村内猛扫。村民听到炮声，鸣金击鼓。男女老幼一齐拿起红缨枪、大刀片、锄头、菜刀和少数手榴弹，进行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抵抗。激战半日，终因武器落后而村落失陷。在肉搏中，我父朱友堂、刘福成的岳父朱九余、我的护兵鲁文才的父亲鲁其俊，还有朱九洲、朱明立、朱长升、马进水、张展

武、刘文明、李家尚等四十余人战死。鲁其秀、朱九常、王兴拜等数十人负伤。敌人占领朱庄后，烧杀掠抢，民房全部烧毁，全村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烟火月余不熄。敌人把活着的五畜六禽，不能带走的全部戮死。幸能逃出来的父老姊妹，隐名埋姓，流落四乡，不敢说是朱庄人。到了第二年惊蛰以后，才陆续回村，重新在一片瓦砾废墟上营造家室。当九文闻知朱庄被洗劫赶来时，敌人已经撤走。九文跪在父亲和死难的乡邻尸前，捶胸顿足，放声痛哭，责骂自己无能，愧对全村父老乡亲。他曾一度想自刎以慰死难英烈忠魂，我力劝其大仇未报而自寻短见是逃避罪责之举，大丈夫三年报仇不晚，只有打倒日寇汉奸，才能报仇雪恨、慰祭英灵。他急于报仇雪恨，曾幻想借助陈胜堂的实力，联合去追杀陈耀泰、“曲瞎子”和日寇，但陈胜堂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朱庄之难，追其原因，恰是陈胜堂密令朱九文铲除陈耀泰而诱发的。这时朱九文才醒悟过来，连呼上当。陈胜堂密令他暗杀陈耀泰正是让朱九文和陈耀泰互相厮杀，实现陈胜堂铲除自己心腹中两个块垒的一箭双雕之计。朱九文大骂陈胜堂，从此两个人彻底决裂。

五

朱庄被洗劫，父仇未报，陈胜堂却勒令朱九文团“化整为零”、妄图解散他的队伍，取消朱九文团的番号。实际上这是陈胜堂联合汉奸李采题（在口伪汉奸的默许配合下），欲意消灭朱九文团的信号——你若不执行命令，他就以这个借口对朱九文用兵，如不经过他批准转移，他就可以联合日伪“聚歼”朱九文团。我和朱九文充分研究了这一形势后，认

为只有“委屈求全”，不能使陈胜堂取消番号。我和刘福成去“晋见”陈胜堂，“请求”移防外地，“以减轻他的供给负担”，收回“化整为零”的诏令。当时陈胜堂毕竟还挂着国民党“抗日”的招牌，不便拒绝我们到其管辖区之外去抗日。再加上刘福成与陈胜堂关系较密切，经过刘福成的一再陈词，总算默许了让我们可以离开高唐，并保证在我们转移时不下毒手。于是，朱九文团于1942年冬前移防恩县吕井。高唐二区即被陈胜堂拱手让给伪军陈耀泰和“曲瞎子”。

朱九文团移防恩县以后，实际与陈胜堂脱离了一切关系，成了一支孤军抗日的独立部队。力量也不过三、四百人（枪），生存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这时，鲁西北抗日形势继续恶化，许多原先挂着国民党旗号的杂牌团，纷纷易旗当了汉奸。坚决不改旗号的李文魁，被日本人消灭了。我八路军主力撤回运河以西，恩县几乎全部落入日伪之手。这时恩县的伪县长王化三向朱九文招手了，先后派纪希文（日伪团长）和恩县伪警察局长孟宜萱当说客，劝说朱九文和他们一道搞“曲线救国”。王化三原是范筑先抗日部队第三十四支队的司令，后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朱九文并不认识王化三，但早就认识纪希文和孟宜萱。纪、孟当说客，以“曲线救国”谋求生存为招牌，表白他们自己识时务，以灭朱九文不愿当汉奸的民族自尊心。我知道九文与纪、孟的暗中勾结后，极力反对他从伪。并说服刘福成去做九文的工作。我曾当面刺伤九文忘了国仇家恨，当汉奸辱没祖宗，父祖在九泉下也会骂我们是不忠不孝的逆臣贼子。九文曾哭着对我说：

“陈胜堂叔侄迫使我们在高唐呆不下去，来到人地两生的恩县，这里日伪势力强大，不走这条路就要走李文魁的道路。

我并非忘了国仇家恨，而现在处境实在艰难啊！”九文还说：“从抗战初，我们带领朱庄人反祖长德就骑在老虎背上了，手里的枪一旦丢掉，你我弟兄一天也不能生存。”说到这里，他还责怪我不该离开八路军回到家里来。党纪不容，我不能把回家来的真正目的明告诉他，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那种处境下，我无力挽救九文于“危亡”，真想一走了事，重回自己的部队，明枪明刀、叱咤风云地到战场上与敌人大干一场，以排心头的“郁闷”之气。但党叫我争取九文相机反正，要牢牢把朱九文团的武装掌握在手，党的使命不容我甩袖而去。正这时，接到地委敌工部长庞均的指示，要我坚持下去，完整地保存朱团，以待革命高潮时机的到来。终于，我“放弃”了与九文的争执，朱九文团也改换成了王化三汉奸队伍的旗号。

六

朱九文被王化三“招安”以后，他的困境并没有改变，因为王化三同陈胜堂、李采题等人，只有姓氏的差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卖国求荣的汉奸，都是或明或暗为日寇亡我中国当帮凶，绝不能容忍象九文这样积极抗日拒匪，为权宜之计而被迫易旗的人存在。实际上，“招安”仍是王化三要消灭朱九文团的一种手段。于是，王化三与武城伪县长周杏村合谋调九文团去武城某区驻防。朱九文仍保留区长、团长职务，但武城是我八路军控制地区，实际上是让朱九文到武城同八路军作战。胜，则为日伪争得搜刮民财的地盘；败，则借八路军之刀杀朱九文。王化三的阴谋不可谓不毒辣。我向九文指明利害，主张坚决拒绝接受去武

城的调迁。朱九文对此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幻想和脆弱。他怕拒绝受命会惹了王化三，在恩县无法立足。我见拦阻九文不成，即提出与他“分家”，以保存一部分实力，再徐图生计和退路的请求。为“生存”朱九文总算有了点心计，同意我分兵一半化整为零，在平原、恩县交界处匿藏起来。此后，九文当了武城的“流亡区长”，带了两个连的人（约200多人）去“走马上任”。但到了旧城（武城县境）就不能前进了，再前进就要和八路军作战，只好客居旧城，“等待”去武城的时机。旧城当时有一条公路，路南驻王化三伪军一个中队；路北驻孟宜萱伪警察20多人。朱九文因原与孟宜萱有些私交，另外九文易帜又“多亏”孟宜萱周旋，所以暂时驻在路北伪警察所的一边，自感还“安全”些。其实孟宜萱、王化三和周杏村早就定好了消灭朱九文的锦囊妙计：到一定时间，诬陷朱九文违抗军令和怕死，不敢开进武城，把朱九文拿下问罪。

我认为九文为人憨厚，少机谋，对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危机不敏感，我总是放心不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怕他去武城凶多吉少。因此，我回平原找到马神同志，向党汇报了我的想法，请求马团长急转庞均部长，请示处理办法。马神听了我的汇报，也感到九文的处境十分危险，就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提出要我部队让出一条通道，以使朱九文能从旧城途经恩县一区、六区撤至平原四区大张庄的方案；如九文被迫与旧城王化三部队交火，希望我军能化装成朱团的人予以火力支援。马团长当即同意了我提的方案。并说，一边设法向庞均（代表地委）汇报；一边行动。当夜我告别马团长返回原地，将化整为零的武装人员和家属由耿际厚、耿安楨负责，

按时集中到大张庄。第二天，我骑自行车直奔旧城，到旧城见到九文，他正象热锅上的蚂蚁，自感已陷入王化三、孟宜萱的套索之中，正愁着无计脱身。当天，我以“家中有急事”为由，派人护送九文到了平原四区，与耿际厚会合后一同到大张庄等我。这天晚上，我和警察所全体头目聚赌打牌，本来我打牌不内行，又假意大肆输钱给他们，几个警察头目联合捉弄我，越赌他们赢得越多，钱来障目，忘乎所以。我见时机已到，乘赌徒们赌得尽兴之际，摔牌为号，没发一枪一弹，把他们全部拿下。我义正辞严宣布：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事出有因，只要不反抗，保证每人的生命安全！又向他们规定：待我们撤出半小时以后，方可向对面的警备队报告；如果胆敢违抗，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伪警察百依百顺地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我顺利地带领朱团的二百多人撤出旧城。半小时后，才隐约听到旧城方向传来的“送行”枪声。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平原四区大张庄刘宝珠的据点，先到的朱九文正焦躁不安地等着我们。

王化三闻旧城之变，知他的毒谋落空，当探知九文撤到平原四区刘宝珠之哥刘宝忠（任区团长）的防区后，他又派纪希文、孟宜萱带着礼品到九文驻地慰问，并承认派朱团去武城处置不当，收回成命，并委九文为吕井区长。这样，九文又返回吕井旧防地。为了照顾孟宜萱的面子，在纪希文一再说合下，退还给旧城伪警察所九枝次枪。

经过这场斗争，深深教训了朱九文，也打击了自持老谋深算的王化三和自称是朋友的纪希文、孟宜萱。只是当时我无法把庞均、马神同志伸手营救九文的实情，明告于糊里糊涂的朱九文。

七

朱九文对人处事，属于“忠厚长者”类型，在许多事上既表现了他的憨愚，又表现了他的糊涂。我到底是逃兵呢，还是八路军派到他身边来的人员？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九文是心中有数。如我执意替他掌握武装；我处决暗杀地下党员的手枪队员；我配合陈胜堂进犯禹城解放区时，率一个连向八路军投降，我被“俘”后又被八路军放回；我以八路军的公开身份对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我经常大量购买子弹和药品，秘密派耿际厚、耿安祯和鲁文才送给我军马团长指挥的部队；我曾较长时间掩护被日伪汉奸追捕的地下党员鞠学顺（九文认识此人）；我在恩城内开鞋店，平原城关开粮店，在恩县六区门吴庄开油坊；在津期店我驻守的据点外，建立为我军收集情报、采购军需紧缺物资的“办事机构”（联络点）以及马神团长为加强朱团实力，秘密送给朱团一挺机枪和十几枝长、短枪的事等等不会不被九文觉察。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事上从来没有质问我，更没有责难过我，更何况他自己也曾秘密给曹丕堂营送过军用物资呢？但别的事也有责怪过我的时候。

事情是这样：我们从旧城撤回吕井后，恩县六区小董庄是个有防守价值的前哨阵地，好几个杂团都想到这里修据点。从小董庄再向前就是我八路军控制区。我认为小董庄被其他伪杂团占领，就会对我根据地造成威胁，如让朱团占领却有利于我军。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我军马立轸团长商量，马团长非常赞成。我要求马团长在朱团修小董庄据点时，八路

军打打枪，以掩人耳目。马团长开玩笑地说：“你朱九武给我送了多少子弹？我的子弹要用在打口寇汉奸上，没有那么多子弹浪费。”我说：“在小董庄修据点，是在八路军眼皮底下，我们的部队没有一点表示，那不等于公开宣布朱团与八路军是一家吗？”马团长说：“你的困难，你自己去克服。”一句话点破我僵化的思想。我就命耿际厚（我地下联络员）、耿安楨（我的警卫员，是共产党员）带着我堂弟朱九升、鲁文才等十余人，化装成八路军，趁我们夜晚修据点时，两次攻打小董庄。我们“英勇”作战，迅速击退“八路”的进攻，并速向王化三报告了“战果”。九文曾天真地以为朱团真的和八路军开了火，曾在背后劝我：“和八路军作战不要太认真，要留后路。”还说：“八路军这样重视小董庄，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向小董庄发展了”此事说明九文从感情上不愿和八路军作战。

另一件事是：一次我带部队从恩县马王庄去河圈村，黄昏时路经陈营，我进了村公所，伪村长陈长贵正与我寒暄套近乎，手枪班长尹世杰匆匆进来，当着陈长贵的面向我报告：“抓住一个八路，”我立时训斥他：“你叫八路吓破胆了，那有那么多八路，还不赶快把人放了！”尹世杰又重复说：“是真的，他身上带着八路军的文件哩。”我知事情坏了，又接着训斥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人带来。”我看了他携带的文件，知道这无疑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掩人耳目，蒙骗我手下人和陈长贵，只好“严令”尹世杰：“人脏俱在，还不给我准备镐锹，拉到河圈村外活埋！”我同好友耿安楨、朱九升、鲁文才等，把那位同志带到河圈村西北角沙岗后边，看到四下无人，就叫耿安楨给他松绑，把

文件退还给他。我不能向他表白我和耿安祯的真实身份，只好向他说：“念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赶快走吧。但请求一定替我保密，保证我的安全。”那知那位同志对死里逃生不敢相信，仍骂不绝口。我这个“伪军军官”，只好跪在地上对天盟誓：“如我有害你之心，不得好死；时间不早了，你赶快走吧！”这时他才看出我的诚意，也侧身跪在我身边，说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后会有期，望你保重。”然后我又派耿安祯送他一段路才放心回来。当夜，忙派耿际厚去夏津支队找马团长，请求迅速把那位同志调离，以免惹出麻烦来。这件事竟然叫九文知道了。他以为我真把那位同志活埋了，在背地里，他严厉地批评我：“这种活埋人的事，绝不能再干！对我们的敌人、仇人还不曾采取这种手段，更何况八路军呢！”我对兄长的批评能说什么呢？除了从内心深处对九文的正直以及他对八路军的真情实感而高兴外，我只能埋着头，装出接受兄长教诲的样子，默默地向他点点头而已。

还有一件事，那是1945年五、六月间，庞均召见我，要我把朱团占领的津期店交给八路军。因为津期店处于夏、高、恩、平四县的交通要道上，我军扩大活动范围必须占据津期店这个要道。我没有向九文报告，立即撤出津期店。此事引起九文的怀疑。他曾质问我：“为什么把津期店据点放弃了？”我说：“部队需要集中，以防被动挨打。”九文迟疑了一会说：“那就是了。”我估计九文当时会想：“你朱九武到底是那边派来的？”只不过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罢了，这也说明九文对我的来意是越来越清楚的。

八

1945年6月27日，庞均同志再次召我去他的住处，向我传达地、县委的指示，要我立即把朱九文团拉回解放区，以壮大人民武装，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又问我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好工作，把队伍一人不少地带过来，有无困难。我说：“七天左右差不多，但确切时间待我和九文商定后再报告。”我也自信这支队伍经过我四年半的政治工作，全部人（枪）已完全掌握在我手中，要带出来，一道命令即可。但难度还在九文身上；因为于私，他是我的亲哥哥，没有他第一次参加八路军，也没有我的参军入党，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于公，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我的任务是争取朱九文反正，他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从这两层意义上讲，都不允许我把他丢下不管，叫日寇汉奸去杀害他。所以，我必须做好朱九文的疏导工作，这也正是庞均对我提出的明确要求。

那知事情比我想象得顺利，我回到朱团，向九文讲明形势，提议在七天内把队伍带到解放区，要他率领部队第二次参加八路军。他慨然应允，并说夜长梦多用不着七天，四天内即可做好一切准备。我再三向他提出这个期限当否？他断然咬定，毫无反悔之意。但到第二天，他却提出要我带部队起义，他只身移居武城城内（时属日寇占领区）。我向他陈述利害，明确告诉他：逃到城里去，日寇和王化三会杀害你，但九文听不进去。出于兄弟之情，为说服我同意他进城，让我放心，特地请来我十分敬重的于八爷来当说客。当于八爷听过我的分析后，他也支持我的意见。对九文说：

“王化三之流是不讲信义的，你应该听九武的话，去投共产党，绝不能进城去。”九文接受了于八爷的规劝，放弃了进城的想法，同意和我一块率部参加八路军。

我高兴地派耿安祺做联络员，把争取朱九文起义的过程如实向庞均做了汇报，并说定四天内，即7月1日，在党诞辰二十四周年那天起义。庞均听后，异常激动，并派出一位联络站站长，作为分区和地委的代表，随耿安祺来到我的驻地胡庄，担任庞均与我之间的联络员，具体研究行动方案。

但到了7月1日那天，九文又变了卦，说坚决不跟着部队走，要一个人留下。我哭着向九文泣诉：“念我们手足之情，那怕请您陪我这一次。上次您参加八路军，我义无反顾地跟着您，没有您最早和共产党的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我这个共产党员来争取您。”同时我还为难他，向他陈述：“我受党的派遣冲你而来，你是争取对象，你不去，就是我把全恩县的伪军都带过去，也没完成任务……”

九文显得意如铁坚，毫不为我的陈情所动，甚至耍赖皮说浑话：“你把八路军带上来攻打我，我也不投降。”就这样，我俩磨了十几个小时的嘴皮子，也没能解决问题。他主意已定，毫无动摇之心。因此我又转过来做副团长刘福成的工作。我第一次向刘福成暴露了身份，刘福成却爽快地支持我，并答应去说服九文，结果刘福成说得口干舌燥，朱九文还是依然故我。

我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真想带着部队把这“油盐不进”的朱九文丢下不管，当然这是气头上的想法。党的使命，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想到了嫂子，她曾读过“洋书”，有些文化，对国家大事也有认识，敬佩真抗日的共产

党，我把动员九文哥率部起义的事告诉她后，头脑清醒、深明大义的嫂子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婉言规劝丈夫走光明大道。九文以“妇人之见”为由，掩耳不听。嫂子见其如此愚顽不化，最后果断地大声说：“兄弟，把你哥哥留下，嫂子我带上两个闺女跟你一块走！”这样，他才同意率部起义。我立即飞车回到胡庄，请联络员向庞均同志报捷。

地委派庞均部长为代表，军分区派恩县独立团许团长、胡永昌政委（离休前曾任四川省军区政委），按时到达距吕井三里远的陈营村欢迎朱九文反正起义。

7月1日，我回到朱九文团的集结地吕井，向全团人员郑重宣布：“经朱九文团长、刘福成副团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我们这个团，从今天即1945年7月1日起，弃暗投明，反正起义，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徐团长和胡政委还到吕井村拜会朱九文、刘福成。他们没带一个警卫人员，充分表示了对朱九文的信任。九文对此很受感动。当天，我们带领全部人员（枪、马匹、弹药）撤出吕井，向解放区开进。到达肖里长屯村时，以庞均为首的党政军领导和数百名军民夹道欢迎我们。两天后，又在新盛店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刘华清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介绍了抗日反攻阶段的斗争形势，并宣布正式命名这个团为“冀鲁豫六分区特务团”，任命我为团长，蒋怀玉为政治委员，王统军为参谋长，赵玉树为政治处主任，陶玉章为政治处副主任。十天后，我和蒋怀玉政委率部参加了解放新桥镇，消灭王纯修伪军杂团的战斗，士气高昂，初战获胜。此后，我们这个团又调回高唐，参加了保卫高唐和消灭陈耀泰等伪杂军的战斗。再后，特务团与恩县独立团合并，正式

命名“夏津军分区基干一团”。我调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从此我离开鲁西北。基干一团后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六旅十六团”。在解放全中国的南下作战中，耿际厚任团后勤处长，耿安祯任副营长，（二人在中原战场作战时英勇献身），朱九升任副连长。

朱团起义后，组织准备安排朱九文到武城任职。分区首长和庞均等同志几次找他谈话，他拒绝接受任命，坚决不离开生他养他的鲁西北故土，一再要求还家为民，去耕耘土地，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同意他回高唐或回恩县的要求，而把他安排到刚解放的武城城里，划给他一个独院居住，生活也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但到春节，他又一再上书要求回家。后来，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拨给他十几担小米和一宗布匹，着令恩县县委帮助他安家。此后，他回到高唐县朱庄老家，于1967年去世，终年56岁。

纵观九文的一生，从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角度看，他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从他个人的多次反复和不坚定性看，他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悲剧人物。（党史办供稿）

还乡报复 血案如山

邵金铤 王连元 杨旺谱

〔编者按〕1945年8月，高唐县城解放，此后各区陆续解放，各村相继建立农村政权，成立农会和民兵组织，对地主、富农进行清算斗争。在高唐县境内，敌伪顽杂活动仍很猖狂，徒骇河以东仍为顽匪杂团所占。敌人贼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流亡到济南的国民党高唐县党部先后组织的暗杀团及还乡团，勾结在高唐的国民党头子邓协忱、杨敬斋及杂团陈胜堂、云茂才、吴春阳等残余势力，不断从济南、齐河、禹城等地派特务小组回我高唐县解放区进行报复，破坏我党建立的地方组织，杀害我基层干部、民兵及无辜群众，在高唐制造了数十起血案、惨案，下面记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例。

一 内奸为患 勾匪杀人

——邹阁惨案的真相

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邹阁惨案。

（一）事件的起因

邹阁村原属城关区，全村有四百多户，是城关区西南片的大村之一，该村历史上即分东西牌。一九四六年农历七

月，城关区决定以该村为重点，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建立民兵联防队组织，进行土地改革，于是派区武委会冀一耀同志带领小刘同志进驻该村，发动群众，并于七月底组成邹阁村东西两个农会和两个民兵联防队。西牌农会主任徐金旺，民兵队长邹金玉；东牌农会主任王荣先，民兵队长张禄昌。

邹金玉解放前曾当伪村长一年，解放后在我第一区当通讯员十个月，后又在基干连当通讯员三个月。该村组建民兵时邹金玉回村当了西牌民兵队长，西牌所配三支步枪由他和其族兄邹金台、邹金元三人掌握。邹金玉是当时该村西牌的实权人物。一九四六年八月间邹阁西牌首先斗争了地主分子邹吉贵的儿媳，斗争出棉花两千斤。原来东西两牌联合行动，斗争的东西本牌分六成，另方分四成，这次东牌应分八百斤，但西牌坚持只分给四百斤，因此双方农会闹了矛盾。区干部李华认为此事是邹金玉的主意，蓄意破坏团结，乃将邹金玉扣押在民兵队部令其反省。这时混入民兵内部的邹金台，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致使邹金玉逃跑，投入顽匪杨敬斋部，充当了特务分队长，随后酿成了“邹阁惨案”。

（二）内奸的一系列阴谋

邹金台是邹金玉的族兄，他二人一向关系密切，混入民兵组织以后，因和东牌农会主任王荣先有仇，就乘机挑拨两个农会的关系。当邹金玉被扣押以后，邹金台认为有机可乘，乃对他进行策反活动。一天夜间他在民兵队部的窗外对邹金玉说：“农会要罚你三千斤皮棉，交不上就枪毙你！”这实际上是他造的谣言。邹金玉果然害怕了，次日夜间乘看

守人员疏忽而逃，逃跑至河东吴庄投入顽匪杨敬斋部，充当了武装特务。邹金玉先跟匪连长王子荣当警卫，不久即当上了特务分队长。

邹金玉叛变投敌以后，邹阁西牌农会将其父母扣押起来。与此同时，该村群众即对地主富农开展了“清算”斗争，对富农邹金盛罚棉花六百斤，责令富农邹金秀献出土地十五亩，棉花一千二百斤，谷子六百斤，麦子五百斤，花生三百斤。这时邹金台找邹金秀商定，派邹金秀的儿子邹兆贞去河东找邹金玉。一九四六年农历十月初四，邹兆贞在夹滩集上找到邹金玉，他对邹金玉说：“俺金台叔和俺爹叫我来找你，你父亲被农会押起来了，每天晚上吊起来挨打，还饿着不叫吃饭，你想法赶快去救人！”于是他二人商定，五天后由邹金玉带人回村，邹金秀父子和邹金台作内应，并商定了联系暗号。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月十日晚，邹金玉带领武装匪徒十八人潜回邹阁村，入村以后先到了邹金元家，在大门口碰到邹金台。邹金台说：“区干部正在东头民兵联防队部开会，西头没事”，于是邹金玉先到西牌民兵队部，收去民兵大枪三支，抢出他父亲，弄了两辆大车，装满东西拉出村去。这时邹金台说：“区干部在东头队部里开会，咱去看看”于是邹金玉又带领匪徒，由邹金台引路并亲自扛着梯子直袭东牌民兵队部。在路上邹金玉给他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到了队部以后竖起梯子，邹金玉和邹金台二人先后上房。邹金台首先大喊大叫说：“王荣先出来，有人找你！”邹金玉喊道：“我来了！你快出来！”一阵寂静之后，北屋的门敞开了，王荣先手里提着刀从屋里走出来，说道：“有种的下来！”邹金

台首先开枪，一枪击中王荣先胸部，王当场牺牲，这时他二人下房，又携走村干部小刘同志（至今下落不明），并缴去大枪一支。在出村时走到街上，正巧遇上从队部冲出的冀一耀同志，邹金玉和邹金台同时开枪将冀一耀同志击伤。

匪徒们撤走了，富农分子邹金秀与其子邹兆贞也随匪徒逃至河东杜庄。邹金台当夜随匪徒走至李棉庄西，邹金玉说：“你该回去，王荣先已死，没人知道有你的事！”于是邹金台又匆匆回到村里，跑到农会里去敲鼓，大喊“赶紧集合！快去追土匪呀！”这个叛徒内奸又装起好人来。

（三）再次制造血案

邹金玉回村杀人并抢走其父的第四天，邹金台派张武昌到夹滩给邹金玉送去八万元钱（冀南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五日，邹金台亲自跑到夹滩找到邹金玉，邹金玉同他到了尚官屯村公所。邹金台说：“东牌民兵队长张禄昌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有我，打算到区里去汇报，我已经打探准了，他晚上藏在他北屋东北的地窖里，你想法派人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事了。”于是二人商定好了时间和联系暗号。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一月十日晚，再次带领武装匪徒三十余人窜入邹阁村。进村以后首先找到邹金台，问张禄昌现在哪里？邹金台告诉说：“现正在张怀昌家里。”于是邹金玉便带人将民兵队长张禄昌抓走，携至王楼村南由匪徒将张禄昌勒死，投尸于井中。叛徒内奸邹金台则从此隐藏起来，不久反而当了村长。

（四）帮助反动富农倒算

邹金台和邹金秀同谋，勾结匪徒连续制造两次血案以

后，邹金秀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并于一九四六年腊月初一日，由河东杜庄返回家乡。当日晚上在家中摆酒，叫去农会主任徐金明和村长邹金台等四个村干，以喝酒为名，公开向农会索要被斗出的财物。邹金台说：“斗争金秀都是东头王荣先和张金昌的主意，应该把东西还给他”，公然威胁其他村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邹金秀向农会索回了除地之外的大部财物，严重破坏了该村群众的“清算”运动，致使民兵组织解体，群众处于恐怖之中。

（五）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一九四七年春，我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发起“讨李战役”，一举消灭河东各部顽匪，残匪逃往齐河。我县的土改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三月间，勾匪杀人犯邹金秀被群众揭发被捕，其子邹兆贞逃跑。但在审理中该犯始终未供出邹金台的罪行，供认两次勾匪都是他个人所为。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被判死刑枪决，而邹金台则又一次隐藏下来，并继续当村长。

一九四七年春河东顽匪被歼时，邹金玉逃往济南，在兴成客栈住了一段时间，四月末前往齐河。由尚官屯王家骧介绍到国民党高唐县大队，叫邹金玉组织四中队任中队长，继续进行特务活动，骚扰解放区。齐河解放时邹金玉逃往济南被编入吴化文的三十五军任副官，一九四八年九月随吴化文部起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吴部奉命南下，邹金玉离队潜回高唐，隐藏在徐官屯其岳父家中。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他曾回邹阁村一次，打算向政府坦白交待。邹金台对他说：“你做的事自己不知道吗！千万不能坦白。”于是帮邹金玉筹集

了冀钞三十五万元逃至河西县。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邹金玉被捕，审讯中供出全部犯罪事实。五月二十四日政府将邹金台逮捕归案，后经审理，邹金台对所犯罪行为均供认不讳。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二犯死刑，执行枪决。（邵金铭撰稿于1990年10月）

二、北五里铺惨案的始末

北五里铺位于高唐县城北五里处，是一个三百多户的大村，解放前除四户地主以外，多数是贫苦农民。日伪时期是城关区忠七乡的所在地，该村的大地主、日伪乡长王玉玺当时被称为城关区的“三王”之一（即忠一乡乡长王汝懋；忠六乡乡长王缉如；忠七乡乡长王玉玺），而群众则称之为“三狗”。这些人都是当地的恶霸地主、铁杆汉奸、日伪县长李九的大红人。他们对贫苦农民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一九四四年日寇强行征收每亩地籽棉四十斤，这些人都是罪魁祸首。北五里铺村是日伪统治的重点村之一，群众受害最深。同时该村还是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村正中有高大的洋楼作教堂，日伪时期有教徒七十四人，不少不法教徒平日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使农民辛勤劳动一年而不得温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三年大灾荒，全村饿死二十多人，并有十四户逃荒到东北。北五里铺村的贫苦农民，和全县人民一样，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东方出太阳——一九四五年八月高唐县城解放了。

（一）解放后的喜悦

高唐县城解放后，日伪县长李采题、城关区长梁树梓、

七乡乡长王玉玺等汉奸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逃往外地。形势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喜悦，使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九四六年夏季村里办起了小学，到校学生一百三十多名，并组织了儿童团，到处可以听到“多年受苦见青天，咱们穷人把身翻……”的歌声。广大贫苦农民，吐出了冤气，青年们放开了喉咙唱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多年受苦的群众，最懂得胜利来之不易，更懂得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这是因为一九四六年高唐县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由于战争的需要，我军主力部队转移以后，盘踞在徒骇河以东的顽杂头子杨敬斋、陈胜堂、吴春阳、云茂才等和逃亡的反动地主勾结在一起，对我们的农会、民兵和村级政权进行疯狂的破坏，不断派武装特务偷袭和暗杀。严峻的现实迫使群众积极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春季五里铺开始组织“民兵联防队”，筹建农会。在驻村工作组的协助下，很多贫农积极分子行动起来，贫农王玉德几辈子受穷、苦大仇深，直到解放后仍然是光棍一条没有混上媳妇。在他的带动下，许多贫农出身的青年，如王金星、高林之、高凤瑞、高金奎、高海之等都第一批参加了民兵组织，并以这些人作为骨干建立了农会组织。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日伪乡长王玉玺家起出四支枪（即匣枪一支，六轮子一支，九连登一支，单打一短枪一支），并买了二百枚手榴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二十五人的基干民兵班和四十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组织健全以后，由王玉德任农会主任，王金星任民兵模范班班长，高金奎任村长，高林之任自卫队长。

一九四六年秋后，为了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加强农村的

领导，区县联合工作队进驻了北五里铺，其组成人员有城关区组织委员王响，城关区公安助理员张恒发、县政府干部张金箱。工作队进村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正在准备开展对地富的斗争，进行土地改革，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吋一场悲惨的血案发生了。

（二）魔鬼们的行径

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然而一切反动势力，越是在其临近灭亡的时候，越要作垂死的挣扎，他们变换着各种方式向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该村有户姓张的，兄弟七人，老四张元义自幼不务正业，十九岁即跑山西贩烟土，日寇入侵以后即投入杂团祖长德部当兵二年，后又到日伪区长梁树梓处当兵，高唐县城解放后，又投邓协忱部，邓团被打垮以后，张元义携枪逃回家中；老七张元信，日伪时期先后在田传策、汪彦田部当兵，日寇投降后投靠邓协忱加入了特务队，邓团垮台以后，又投伪区长赵洪烈部任特务队副队长。该村的王金河日伪时期在八区汪彦田部当卫兵，日寇投降后，投入邓协忱部，邓团垮台以后，携枪投入伪区长赵洪烈部任特务队长。这些人都是惯匪兵痞，素日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解放后对革命干部和群众怀有刻骨仇恨。张元义在邓团逃回家中以后，伪装积极混入农会，后来当了贫农组长。一九四六年入秋以后，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日益激烈，十月间张元义派他弟弟张元之伪装赶集，到城东迈官屯王延彬家见到张元信，把五里铺的内部情况报告了赵洪烈，此后又曾多次和张元信密通情报。是年农历十二月初六日夜，张元义潜逃至城东芒庄赵洪烈处，但当时农会和村里的

人们谁也没有注意。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夜，寒风吹得厉害，数九的寒夜，寂静地使人有些恐惧。夜深了，一伙二十多人的武装匪徒，在张元义、王金河、张元信的带领下，绕过岗哨悄悄地进了村，这些匪徒中有麻振兴、华崇凯、王延彬、刘德生等惯匪，个个心毒手狠。农会主任王玉德这一夜住在邻居刘如林家，因为张元义十分了解底细，直接找到刘家，先由张元义叫门，因为王玉德闭门不应，后来匪徒们听到枪的扳机响，料定枪没打响，所以撞开门，王玉德等当即被俘，并缴去六轮手枪一支。随后匪徒们就赶到农会，当时在农会值班的民兵班长王金星，听到狗吠声逃了出来，藏在邻户的秫秸堆里，不幸被发现而被俘，并缴去大枪一支。接着由张元义带领，又抓去自卫队长高林之。这次事件的发生使五里铺的革命事业受到极大损失。

（三）智退敌顽

这天晚上，工作队的王昀、张恒发、张金箱三人住在王保太家，村长高金奎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当时工作队共有步枪三支，半夜间王昀同志听到街上有杂乱的脚步声，立即叫醒其他同志，迅速作好战斗准备。他从窗口向外一望，发现对面南房上有持枪的敌人。于是他们四人立即从后门撤出，由村长高金奎带路突围，张恒发同志作先导，王昀同志殿后掩护，当张金箱同志从后院爬上房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开枪射击，张金箱同志翻身滚下，落在一个草垛上，幸免受伤。这时走在最后的王昀同志，只得从东面的高墙上突围，在翻墙时腰中的手枪掉在墙角下。在这紧急情况下，他手提步枪

突围到街后的苇塘边，与先行的三位同志会合。村长高金奎熟悉地形，带领大家迅速撤到村西的一片坟地里，脱离了险境。

月亮已落下西天，大地一片黑暗。工作队的同志们怀着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心情，积极筹划着如何营救村内的干部，这时敌人仍在进行搜捕，因此几个同志商定，对敌人进行迷惑性佯攻。于是，先在村西打了一阵枪，又迅速转移到村南的道沟里打了一阵枪，因为敌人害怕城里县大队增援，又怕周围村的民兵闻枪声赶来，听到村外枪声，即匆匆逃走。使不少村干、民兵免于受难。

（四）血洒异乡

王玉德、高林之、王金星三人被俘以后，九日凌晨被带到城东芒庄，上午被押到王屯集上游街。十二月十日，敌人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张元信和王金河二人亲自动手，首先对农会主任王玉德严刑拷打，然后把他打倒在地，身上压上七个大土坯，一群匪徒狂叫着“你不是要翻身吗？赶快翻！”他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但醒来以后，仍然对土匪们破口大骂。随后王金河又问高林之“你愿意尝尝翻身的滋味吧？”高林之正气凛然地说：“穷人要翻身，三座大山都压不住，几个土坯能压垮我们吗？”一群土匪丧心病狂，轮番将他二人打得死去活来。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将高林之、王玉德二人押到杨官屯集上游街，下午又将二人痛打一顿，后用杠子将二人抬到小井村东的枣树行子里，由张元信、王金河、杨铁民、麻开先、赵友三等人用杠子将王玉德、高林之二人活活砸死，又用刺刀向尸体捅了数十刀。两

位村干部就这样惨死在异乡，尸体被抛在小井村东湾坑里，落得尸骨无存。王金星被敌人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全县解放以后，村里的人们几次前往觅寻烈士的遗骨，但始终未能如愿。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怀着悲痛的心情，遥望东方奠祭烈士的英灵。

（五）罪有应得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首犯张元义在河东杂团被歼以后，逃往济南。解放济南后被捕，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判处三年徒刑，解往夏津白新院服刑。一九五一年逃亡回家，由于当时划省（平原省划归山东省），未予追捕。但这个作恶多端的匪徒贼心不死，家中仍藏有两支短枪（有匣枪一支，另一支即是缴去的王玉德的六轮手枪未交给他的上司），经常带在身边，伺机杀害我村干部。一九五二年一月重又被捕，当场在他家抄出短枪两支，子弹四十三发，其中匣枪擦得很亮，子弹满膛。经过重新审理，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被判处死刑，在曲庄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执行枪决。

但是，在此案的审理中，张元义并未供出同案犯王金河和张元信二人。在高唐全县解放以后，张元信在齐河又当了国民党四十五师的兵，解放蚌埠以后，带着他的小老婆逃往潍县马府村他岳父家隐藏起来；王金河则隐瞒罪恶，在家劳动。但是，法网难逃，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张元信在潍县被捕后解回高唐。经过审理供出他和王金河在北五里铺事件的全部罪行，于是将王金河抓获。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张王二犯分别被判处徒刑八年。

烈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几十年来北五里铺的群

众，永远把这个惨痛事实记在心中，他们继承烈士的遗志沿着党所指引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邵金铭撰稿）

三、王洪达同志家属被害真相

一九四六年冬季高唐解放不久，前方部队把捉住的原杂团首领赵长声和惯匪陈××（外号胶皮腿）一同押到高唐县交地方政府处理。这一消息传开后，黎民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尤其是深受其害的城东南一带群众，纷纷向政府控告他们的罪行。当时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王洪达同志亲自审理了此案。鉴于赵长声在高唐期间伙同云茂才作恶多端，并且杀害了地下党员于时英同志，胶皮腿在当地也是恶贯满盈，所以人民政府决定处决他们。

当时还在杨官屯一带活动的胶皮腿的儿子、杂团营长陈松龄（外号陈钢蛋），是陈耀泰手下的一个队长，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又成了杂团营长，所以他想方设法救出赵长声和胶皮腿。于是，他首先通过一个“反正”的连长（经党组织允许，曾在敌人内部工作）去公安局找王洪达说情：

“只要把他俩放了，要钱有金条，要枪几箱也行。”王洪达同志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为民除害！”利诱不成，后来，陈松龄又捎信对王进行威胁，王洪达同志毫不畏惧，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赵长声和胶皮腿这两个败类。对此，陈松龄怀恨在心，伺机报仇。他先是派人刺杀王洪达同志，出四十万买王的人头，但未能得逞，后又想法杀害他的家属。

一九四六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城西于庄王洪达同志的家随着一阵狗叫声被陈松龄带来的土匪包围了，紧接着

大门被砸开，一部分人窜上了房顶，声嘶力竭地叫嚷起来：

“于庄的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找王洪达算帐的。因为王洪达是共产党，……”另一部分人在陈松龄的带领下，先撞开了西屋门，用枪打死了王洪达的父亲，接着又砸开了北屋门，杀害了他的伯母和妹妹，幸好他的伯父从后门跑到邻居家，才幸免于难。等他们最后砸开东屋门时，王洪达的母亲和妻子已藏进了里间屋的破被套里，外间炕上被子里裹着他那不满周岁的儿子王立阁（现在县水利局任保卫科科长）。这时，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本来就吓得心惊肉跳的敌人，听到枪响就更惊慌了，纷纷向后退缩，房上的敌人也悄悄地溜了下来，其余的跑到大门外。陈松龄觉得这样走了太不解恨，又闯进屋里放火，把被子、孩子扔到火里，在堆放的杂物中乱插了几刺刀，就慌忙带着匪徒逃窜了。

原来，村外的枪声是共产党员、九区区长李海传领着几个民兵打响的。那天晚上，李海传正好回到家里，刚睡下不久，朦胧中听到狗咬声，他急忙抓起手枪跳下炕，听到敌人的叫喊后，他一切都明白了。他考虑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时间把敌人吓跑，于是，他让共产党员李家丰火速去县城送信，自己急忙带领几个民兵在村外鸣枪迷惑敌人。

乡亲们也纷纷赶到王洪达同志家里，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救出了已烧伤多处的孩子。

就这样，为了革命，王洪达同志的三位亲人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杨旺谱撰稿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

四、琉璃庙惨案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高唐原六区琉璃庙村，发生

了一起震惊全县的大血案，有两户村干部的家属共五人惨遭杀害。

（一）党的忠诚战士

琉璃庙村是我县的革命老区，一九四一年我党开辟卫东根据地时，曾建立过政权，因此群众基础较好。当时该村共九十多户，除四户地主以外，多数户是中农。该村的赵德森、赵长震两户是贫农出身，赵德森因为家境贫寒，少年时代曾给梁村一户地主家扛小活二年，后来又回家以放羊为业，青少年时代受尽了熬煎。成年以后过继给他的伯父赵长林，继承了七亩地和五间房，才成家立业。贫苦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一九四五年春，由朱楼村地下党员张长荣介绍认识了庞均同志，从此赵德森与党保持了联系，并曾两次为地下党组织送信，一次是将庞均同志的信送到西关，交给一个卖豆腐的人（郭宗善）；又一次是去夏津送信，不幸在张集被张八师部（即张栋臣部）逮捕，后托人由恩县的“于八爷”（三番子头）要出来，幸免被害。一九四五年八月高唐县城解放，但原六区仍由袁采蓉、祖长德两部顽匪盘踞，他们派款派粮到处作恶，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我党在一九四五年冬派高立柱同志去六区工作，只能暂时在地下活动，赵德森经我地下党员张长荣介绍认识了高立柱，从此即为党作秘密交通工作。随后建立六区区委会，由石子侃同志任书记，王伯群同志任区长，赵德森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担任秘密交通员。一九四六年邓协忱，袁采蓉部被击败后，高唐东北部仍留有大量残余武装，有一次赵德森奉区委的命令，去朱庄刺探敌情，他扮作小商人，背着二十

斤皮棉去换纸烟，深入到朱庄邓协忱据点里，探明了邓协忱已经跑了，只有七十多名残匪正准备逃往齐河的重要情报。由于他对党忠诚，工作积极，一九四六年由吕希海、张长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工作更加积极，一九四七年夏季，他奉令将该村的日伪乡长（国民党员）赵文林活埋。赵德森忠诚党的事业，对敌斗争坚决，引起了反动分子极大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杀害赵德森同志，这就是“琉璃庙惨案”的起因。

（二）行凶报复，血染两家

在敌我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在窥测方向，寻求时机以图报复。琉璃庙村有一个名叫赵德元的，当地群众都叫他“赵六”。从十六岁开始跟张长河当土匪，后又跑到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当兵九年，日寇入侵后，又到日伪祖长德处当兵，是个惯匪。他有个弟弟赵德奎（即赵和尚）也是个兵痞出身。解放以后他兄弟二人逃回家乡，伪装进步，一九四六年二月赵德元混入农会，当了农会主任。但在他当农会主任的一年当中，多次给顽匪袁采蓉敛钱催粮，同袁采蓉、杨洪江等暗中勾结，传送情报。后来被六区区委发现，逮捕未获，赵德元乃逃往齐河，投入袁采蓉部。于是年五月袁采蓉组织武装特务小组，网罗了一些亡命之徒，如朱华臣（原袁团连长）、杨洪江（原祖长德部连长）、薛德友（袁部连长）、杨德庆（杨秃子）等，赵德元就参加了这个特务小组。

一九四七年春，琉璃庙村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改组，由赵德森任农会主任，赵长瀛任村长，赵长震任宣传委员，并组

成了以赵德森为支书的党支部，成立了十四人的基于民兵组织，由赵德森兼任队长，民兵有六支步枪。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成为原六区北部的重点村。

一九四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下午赵德森接到区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民兵到茶棚村集合待命，赵长瀛去夏津房庄给解放军碾米，主要干部都没在家。傍晚时刻，由特务小组组长朱华臣、杨洪江带领十二名武装特务摸进村，在赵德元的指引下，首先找到隐藏在村内的赵德奎（赵和尚）。于是这些匪徒就分头去杀害赵德森、赵长瀛、赵长震三人，在村东头碰见赵德森的父亲赵长玉，赵德元恶狠狠地问：“三妮在家吧？（赵德森的乳名）”赵长玉说：“不知道！”“枪放在哪里？”“不知道！”赵德元气极败坏，开枪将赵长玉打死。随后就到赵德森的家中，因赵德森不在家，匪徒赵德元乃将赵德森的妻子于一俊枪杀，将其周岁的儿子用刺刀挑死，抢走全部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子。其他匪徒由赵和尚带路到赵长震家，因长震兄弟二人均未在家，赵和尚开枪打死赵长震的父亲赵立训，这时年仅六岁的赵如意抱着爷爷的尸体大哭，赵和尚这个万恶的匪徒，大声吼道“叫你哭个够！”开枪又把赵如意打死。就这样两家五口人惨遭杀害。

（三）人民的法网难逃

反革命匪徒赵德元、赵德奎兄弟二人逃往齐河。在解放齐河的战斗中，赵德奎（即赵和尚）被击伤，后死在济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匪徒赵德元在齐河解放后逃往济南，济南解放时携枪逃到平原县四区姜集他女儿家，将枪支匿藏之后只身逃往天津。在天津当小工时，认识了禹城苏集的一

个逃亡匪徒佟少彦，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同佟少彦潜回平原姜集，取出所藏枪支以后，与七月二十三日到禹城苏集。这两个反革命分子贼心不死，继续作案，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禹城持枪劫道时，被禹城县公安局捉获解回本县。经审理后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被判处死刑，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邵金铭撰稿于1990年9月）

五、还乡团对解放区的三次袭击

一九四五年高唐县城解放后，以国民党伪区长杨敬斋为首组织的特务小组，由林德章、刘守清、孟宪法等匪徒带领，三次来我解放区大肆杀害农会干部、基干民兵及其家属、荣军，妄图破坏我群众组织，破坏土地革命运动。

（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晚，林德章、刘守清、孟宪法带领特务四十余人到老七区老王寨村，杀死农会副主任共产党员秦立生，并将农会主任王荣祥临产的妻子孙氏和岳母孙刘氏二人拉到南门外，浇上煤油点燃，二人被活活烧死。同时还枪杀了王荣祥四岁的小女孩，其手段残忍，无以复加。

十一月十四日晚，这伙特务匪徒窜到姜店乡王楼村催要粮款。因村长王忠法拒不交纳，当晚将王忠法双目失明，年已七十五岁的老母，用刺刀活活挑死，并把右手砍掉；同时把王忠法（四十一岁）及其妻梁氏（三十五岁）和八岁的儿子黑丑、五岁的小女儿，带到村外投到井里淹死。全家五口均遭残杀。

(二)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林德章带领匪徒十人，手持七支步枪、一支手枪和几十颗手榴弹，从齐河北关万足酒店出发，来高唐活动。当夜窜到杨官屯区的王架子庄，隐藏在一个独院里。第二天晚上窜到林德章的家乡栾官屯，藏在他自己家中，准备伺机杀害村干和民兵。六月三十日上午被发现，午间与民兵交火，匪徒们突围而出，向西跑到三十里铺的王架子庄，在村东场院休息。该村民兵肖金元发现后立即报告了民兵队长，同时农会主任王友德越过北墙向大徐庄送信，民兵队长孙长兆带领全村民兵持大枪向村南去，出村不远，发现敌人从大徐庄西去，立即用步枪向敌人开枪射击，枪响以后敌人随即还击，将民兵队长打伤。这时民兵把队长背回村里，立即向三十里铺区公所报告情况。区里接到报告，政委王丕林、区长杜文英迅速布署，由区长杜文英带领武装干部李金桂、李禄庆、肖金亭等人前往袁庄、王庄、五神庙、长屯组织民兵，向村南沙窝行子围剿，其他干部分头到董集、李奇庄集合民兵带机枪及时赶到。当区长杜文英带干部民兵赶到袁庄以南时，隐蔽在一人多高的杜棵丛中的敌人，突然窜出开枪，当即打死袁庄民兵四人，王庄民兵二人，长屯民兵一人，并弄去大枪一支，打伤我区干部肖金亭和长屯公安员杜秀贵。敌人沿沙丘中杜棵行子南窜，经沈庄、军户李庄连夜逃回齐河。

(三)

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初，特务组长刘守清伙同孟宪法在

三县大队（高唐、夏津、齐河）拼凑了三十多人的武装特务团伙，再次窜入高唐进行袭扰。首先，这伙土匪来到原三区刘平庄，弄走冀钞三万元，接着又窜到芦头村，把农会斗出并已分给群众的元宝和银元，全部逼出来掠走。天明以后又往西逃去，走到聊禹公路时，遇上九个荣军（八路军）坐着牛拉的大车往北走，有两个车夫赶着车。这伙匪徒冒充我解放区的民兵联防队，叫这些荣军到区公所去说说再走，并谎说：

“前边的村（毛庄）就是区部。”随即连车带人进了村，这时村里无人，他们又赶车出了村。到了毛庄南寨门外的场院里，一个姓赵的匪徒，翻了一个荣军的皮包，荣军骂了他，姓赵的匪徒举枪将这个荣军打死，拿走他的皮包。这时有的荣军在车上，也有的走着，枪响以后这伙匪徒一齐开枪，一排子弹当场打死八名荣军。一名荣军幸存，车夫也赶车逃走，敌人怕有人追赶，迅速逃跑，当夜向东窜到高唐原八区濶河附近的一个小村，被在当地驻防的我分区独立营发现，予以截击。因为独立营人多武器好，敌人借青纱帐的掩护立即逃脱，转回齐河。（王连元供稿，邵金铭整理）

刘宝善的罪恶一生

张立亭

刘宝善，今尹集镇小刘庄人，生于一八九五年。他在青年时代，以做小生意为业，贩过粮食，跑过行商，经常在高唐、恩县、平原、夏津等县的集市上混。因为他的个子高，皮肤黑，脚大出奇，又常穿一双铲鞋，因此得了个“大铲鞋”的绰号。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鲁西北地区土匪蜂起，很多兵痞流氓，到处占地盘拉“杆子”，绑票抢劫。民国十四年前后，高唐县的土匪已有数十伙，其中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南店村的李长兴，他同时又是鲁西北一带“安清道义会”（即三番子）的头目。刘宝善自青年时代就以作小生意为名，东游西逛，他所结交的人均非善类，狐朋狗友，胡作非为。一九三〇年前后，拜李长兴为师，参加了“三番子”，与李采题、张栋臣、冯寿彭等土匪头子相结识。刘宝善便纠集了不务正业的人，拉起了土匪团伙，拦路抢劫，架户绑票无恶不为。依仗李长兴、李采题等人的土匪势力，不到两年的时间，便拉起一百多人的团伙，自称“民团”。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的头目李长兴于一九三三年春被韩复榘枪决于济南。李采题、刘宝善等纷纷如丧家之犬，到处逃亡。此时刘宝善则疏散了人员，并将三十多支枪埋藏起来，之后逃往徐州，开了一座肉铺，以掩人耳目。后来闻知高唐“风声”

已不紧，乃返回高唐，寻机蠢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是年秋李采题闻高唐国民党地方政府弃城逃跑，便陆续窜回高唐。李九于是年十二月，假“抗日”之名，组织了武装自卫团，自任团长。与抗日武装力量相对抗，受到严重打击之后，于第二年九月撕去伪装，卖国投敌而充当了日伪高唐县长。大铲鞋刘宝善见时机已到，有了李九作靠山，也拉起了队伍，自称“自卫团”，谎称“守土保家”，在小刘庄一带敛钱派粮，扩充实力。刘宝善匪性难改，不久便和李九勾结起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宝善被李九任命为日伪高唐第七区团长，后又兼任区长。此时，刘宝善的武装已有二百多人（枪），驻扎在小刘庄和明新寺两个据点。此后，刘宝善又强行招骗农民子弟，扩大势力，他规定“一人当兵可免收二十亩地的花销”，在当时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子弟被迫当了兵。时至一九四二年前后，他的团队已发展到七百多人，下设大、中、小队若干，同时建起有四十多人的“造枪局”，自己制造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并先后在小刘庄、明新寺、双庙、彭庄、徐官屯等村修起十多个据点，调集民工，征集物资，给周围的群众造成极大灾难。仅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因在唐洼村西首修据点，一次就拆毁百姓民房数十间，使十多户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并借此敲诈群众钱财数千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刘宝善强行征集南五乡的村民在四姑庙、杨寨子、刘湊庄等村修筑据点，同年十一月又重修了刘皮子庄据点，劳民伤财使百姓痛苦难言。

刘宝善在其控制区内，横征暴敛，逼得百姓家破人亡。一九四四年十月，他派伪队长张英才在七区九乡强敛花销，

使不少群众弃家外逃，其中以陈庄受害最为严重。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刘宝善亲自率伪兵在徐庄、盐场一带抢掠棉花十余大车，使这一带的群众生活无计。

刘宝善认贼作父，无恶不作，草菅人命，枉杀无辜，在这方面的罪恶更是十分严重。一九四〇年夏津“黄沙会”有一百三十多人，经高唐去泰安“进香”，刘宝善向日寇报告，并带领伪兵协同日寇在店子村拦截，枪杀“黄沙会”数十人之多。一九三八年春，李九杀害崔子固、吴子杰、刘嘉义三位抗日人士，刘宝善也是亲自参与者之一。郭善成等六人原在伪四区郭隆元处当兵，后来投入抗日的刘化溥部，一九四三年二月，刘化溥在堂邑牺牲，郭善成等人逃回高唐隐藏，刘宝善将其抓获交给了郭隆元，郭隆元在辛店集上将郭善成等人凌迟处死。一九四三年间，刘宝善部的两个士兵，一个是大王庄的，一个是杜李庄的，因不愿甘心卖国为日寇效力，商定携枪投奔八路军，被刘宝善发现后，将此二人勒死在明新寺据点里。小刘庄的肖禄祥，在刘宝善部当小队长，他父亲做小买卖，一九四四年夏，刘宝善与邓协忱交战，刘部被打死很多人，肖禄祥被邓部俘去又放回，刘宝善认定是肖禄祥的父亲勾通邓协忱，于是将肖家七口人全部勒死。小李庄的牛××，因以卖“甜沫”为业，绰号“甜沫牛”，他和邓协忱部的营长刘文彬是两姨兄弟。一九四四年秋，“甜沫牛”与刘宝善的小老婆同车去济南，回来时路过房寺，被邓协忱部包围，好不容易乘汽车逃回高唐城。刘宝善将其小老婆接回后，得知刘文彬在现场，他认定是“甜沫牛”报的信，因此将牛家六口人全部勒死，上至七旬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儿童，其手段的残忍无以复加。刘宝善的小

老婆本是刘百户庄人，她先嫁到洼里庄，因为她父亲被仇人所杀，为替她父亲报仇，后又自愿作妾嫁给了刘宝善，要求条件是替她父亲报仇，刘宝善为这个女人，杀了十多口人。与此相反，刘宝善对日寇则是百依百顺，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得知日寇将到七区扫荡的消息，立即派伪兵到各村向群众要猪肉馒头等食品，为其主子作好后勤供应，使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多次秉承李九的旨意骚扰村庄袭击我八路军。与此同时，经常与邓协忱部交火，使很多人为此而丧命。仅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的一次交战中，刘宝善部就三十多人丧命。

刘宝善为了其荒淫奢侈的生活，劳民伤财大肆修建。当时刘宝善常住明新寺，他二弟刘宝和、三弟刘宝奎驻小刘庄。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同时动工修筑明新寺和小刘庄几个据点，至一九四二年完工，寨墙高五米，宽两米，壕深墙高，并修有炮楼，小刘庄修有二至三层的土楼十座、瓦房三十五间，耗去百姓的大量财物。他在小刘庄雇用了四十多名劳力，代种一百多亩土地，养骡马三十多匹，并开有油坊、酒店，大肆进行搜刮盘剥。

一九四五年日寇宣布投降以前，张栋臣（即张八）以“山东挺进第三纵队”的名义，接管了高唐县城。刘宝善摇身一变，又当了张栋臣部的团长，由日伪军变成了“国军”。张栋臣在高唐驻了半年多，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即我八路军解放了高唐城后，刘宝善随张八逃往平原，不久张栋臣病死。我渤海军攻打平原时，刘宝善等一群乌合之众，四处逃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宝善带家口十余人，由尚家纸坊出发逃往济南，在禹城车站候车时，被邓协忱部侦

悉，由邓部营长谷廷章将其抓获。报经国民党专员熊纪明同意，由邓协忱下令将刘宝善凌迟于豆腐陈庄，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根据刘广伟，刘清溪等同志口述整理成文）

赤诚的爱国者杜友棻

张金洪

杜友棻先生，字馨斋，清朝乙酉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友棻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0岁。

（一）

杜先生祖居高唐城东南杜庄，祖父因赤贫过继于城里南街一杜姓贫苦人家，该户主去世后，因杜的祖父是外来户，常受本街读书人家的欺侮，激愤之下，乃送其子杜维章入私塾读书。杜维章工于书法，长大后到县衙做包收粮食的县吏（清制县衙收税粮款，命人分片包干，到豪绅家收粮，形同乞讨，被人视为贱业），后提为录事。友棻出生后即因生父的职业而吃了“百家粮”（即征收交剩的粮食），清末人民生活困苦，很难按期收足科粮，家境依然贫寒，杜维章一面送长子友棻读私塾，但规定其每日回家后做一些农活，一面命次子友藻专门务农理家。友棻先生体魄高大健壮（在校绰号“杜大个”），他在课余劳作中养成了喜劳爱动的习惯，特别是建立了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友棻先生在读私塾时，常因下地劳动和吃“百家粮”，而受到富豪子弟的数落挖苦，乃更加发愤苦读，学业远远优于纨绔子弟，被恩师作为重点对象培养。

1905年，他二十岁时考中满清的末科秀才，当年度除科举制，建立中学，友棻先生即享受官费被保送到山东最早的东昌(即聊城)中学，当时除学《四书》、《五经》外，开始初学理、化、史、地、数学和英文。

1910年以学业第一名被保送到旧制济南山东高等学堂，在校品学兼优、名列第二。时维新改良思想盛行，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学说，尤为友棻先生所接受，他冒杀头的危险，不顾父亲及亲友的斥责和嘲笑，于辛亥前，毅然剪去发辫，后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号召，后来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借兑换苏联退还的庚子赔款卢布，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筹措过建党经费。

(二)

1913年秋，友棻先生于高等学堂毕业前夕，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联合同学李秉元、李允峰、朱建桂、刘清沂、张启昆、王克忠及教育界人士共十三人，取得高等学堂前校长丁惟楸、现任校长孔祥柯的支持，又得到社会知名人士张公制、李和卿、邵晋蕃、曲卓新等人的赞助，经呈准选旧布政司经历厅为校址，创办了山东育英中学。他毕业后，遂到该校任教务主任。育英中学初创是艰苦的，创办人既是教员又兼职员，还干校役。他也是如此，在他及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学校初具规模，为日后育英中学名声大振做出了贡献。时，山东早期的党员中有的在该校读过书，曾受到过先生爱国思想的熏陶。还有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如友棻先生的三弟友棻，也是由育英中学考取北大的，友棻在北大

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后得肺病于1920年元宵节去世。

他除了与人联合创办了人才辈出的育英中学外，在故乡，还率领大家一块拉神破庙，亲自创办了山东省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七年級制三清观女子学校（这也是高唐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女子的学校）。校院广种桑树，为女生采桑提供方便，并寓有劳动建校之深意，蚕茧盛时，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采桑，有劳有逸，其乐无穷！友棻先生还协助县助学所（现称教育局），开办文庙和书院小学（后改中学）。为了使离县立小学远的儿童能读上书，还把南关龙王庙和南街的杜氏家祠，改为龙王庙小学和尚志小学，自出薪金买书桌教具，使南街、南关儿童免费读书。

1915年（民国四年），友棻先生被山东省教育厅聘为全省教育督学，并被选为第二届山东省议会的议员，曾兼任高密中学校长和当过胶济铁路职员。此后，他每从外地回乡都到县城各校视察。有一次，他路过三清观，见女校内他亲手栽种的桑树全毁，杂草丛生，教室被土墙挡住，阴湿黑暗，怒从中来，打了该校男校长一个耳光，事后向人家赔礼道歉。足见先生之耿直。他在高密任中学校长时，见有穷苦儿童杨逢春（又名杨笙甫，其兄为长工，其母打零工），每日要饭之暇，坚持在教室外隔窗听课，日久天长，友棻先生把他招入室内，以校工（负责打铃扫地）的名义免费供给食宿，杨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到济南一师上学并工作，友棻先生把他招为女婿。1926年，杨借到高唐探亲之机，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进步知识分子金谷兰入党。友棻先生还以同样情况培养了不少贫苦学生成为有用人才。他对山东省和高唐、高密县等地的教育工作，贡献甚大。

在封建官僚充斥的北洋军阀时代，象友棻先生那样耿正廉洁、一心为民着想的进步学者是吃不开的。由于他与旧习惯势力格格不入，因而得了一个“杜别古”的绰号。他终因不屑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出旧教育界的官场。

以后他就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下一代的事业上。

(三)

1928年5月3日，日军炮轰济南，蒋介石不准抵抗，中国军民死伤数千，酿成惨案。友棻先生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济南过奴役生活，于悲愤中携四弟友苒、次女修时和两个侄儿超时、道时回家乡高唐躬耕务农。此期间，他目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媚日反共，人民陷身水火的种种景象，感慨万端，当初革命理想，皆成泡影，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代子女侄儿。他指导孩子们一面复习数理外文，教以古典文学；一面叫孩子们参加农业劳动，推车送粪下地，并引古语教导他们：“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悔乎？”热爱孩子、关心下一代的深情溢于言表！这时，家中田地由清末三十亩地逐步发展到1930年时的二顷多地，有二牛一骡，并雇用了三个长工和一位表亲。友棻先生常以仓园中食粮，周济困难亲友和长工。反对二弟留侄子道时在家种地的主张，坚持让其升学深造。因而二弟友藻常呼友棻先生为“败家子”，并苛减子女上学生活费，时常引起纠纷，终于在1930年其母去世两年后分家。友棻先生坚持实行女子继承权，与其他四兄弟一样，分给其妹友菱一份家产，开高唐未有之先河。女儿修时、侄子道时分别进入济南省立

女一中、模范小学读书。不到一年，阎、冯、蒋内战爆发，济南战火纷飞，学潮频仍，为了子女的前途，友棻先生乃鼓励孩子们到北平（北京）深造，因功课有基础，分别考入北平四中、北大女附中等名牌重点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友棻先生对于蒋介石之不抵抗而放弃东北大片河山，极为愤慨，以在家养蜂酿蜜所得及家存制钱共二十余吊（在山东，每吊合一百枚），通过《大公报》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友棻先生平日爱看比较进步的《大公报》，尤其推崇范长江的报道文章）。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他目睹时局，深感国事日危，而对“航空救国”抱有幻想，因此乃鼓励侄子道时报考国民党空军。友棻先生教育青年和子女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女儿修时由保定医学院毕业后，考入中央医院，在友棻先生进步思想的感染下，她积极接近革命组织，在其同学共产党员张文杰（解放后为北京医院医务科长）的影响下，1938年后曾有志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终因障碍重重未能成行，但她常在通信中宣传八路军英勇战绩，借以勉励亲属。

友棻先生正直为人，绝不在军阀手下讨生活。韩复榘在高唐的代理人赵仁泉，听说他有学问，亲自登门请友棻先生帮他做事，遭到断然拒绝。又一次，赵部一军官为讨小老婆来他家借房，友芬先生素来反对纳妾，不畏强暴，坚持不借，遭到赵部士兵痛殴而卧床达半月之久。

（四）

“七·七事变”后，友棻先生鼓励青年学生，参加抗日

活动。在家乡沦于日寇之手后，友莱先生坚决挫败敌伪利用他的名望，诱逼他出仕的毒计，离家出走。离家前，打开粮仓和房门，呼唤左邻右舍：“国家亡了，无国何以有家？！”叫邻居需什么拿什么，把屋里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以免资敌。而自家只带些必需的粮食衣服，躲避于候庄、李棉庄等远近亲友家，受尽饥寒，但所到之处，再苦也不忘教育友朋子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誓死不当汉奸、亡国奴。

约在1940年前后，伪汉奸政权盘踞高唐，友莱先生带老妻、养子杜鸣（又名杜顺时）和外甥杨廉（又名杨幼震）等回家种地。时值青黄不接之际，面对满城蒿草、一片荒凉，无限悲愤，写信寄四弟友崑（中学教员）、女儿修时（医生）、侄儿超时（公路局总工程师）及道时（飞行员）传看，内引杜甫《春望》诗一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字字血，声声泪。字里行间，对弟、子、侄们寓有抗敌救国之殷望。来信以“崑、修、超、道同览”开头，皱褶的微黄色信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斑斑泪痕，似乎听到对家人无限爱国深情的嘱咐，也可以看出家中困难，先生买邮票发信之不易。

1943年故乡大旱，加以日寇汉奸勒索，国民党杂牌军抢劫，人民困苦不堪，当时的地富豪绅认为“不杀穷人不富”，乘民之危，放高利贷打滚粮，逼得穷人更是饿殍载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而友莱先生却将家中勉强糊口的粮食，乘夜投入断炊的邻居家，并收养将要路毙的孤儿多人，送给衣食，加以教育，到新粮下来后才送他们回家，后来有些人成为爱国抗日战士。友莱先生的原配夫人，就是那

时因病饿去世的。他在粮柴将尽、以糠菜充饥、胞弟又不肯救援的情况下，以“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国怜民之情，给在兰州的女儿修时和侄儿道时去信，抒发没有更多粮食周济灾黎的悲痛，并诉说友藻不顾乡邻死活，放打滚粮的罪恶，读之令人泪下！

八年抗战期间，他时刻不忘抗日救国，鼓励孩子们、弟子们为抗日撒传单，隐藏和救护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为了不使日寇获得充足物资，他带头不种棉花；不穿洋布，不点洋油灯，不用洋火，而代以火纸火爓打火以示抗日。并于1942年卖了五亩地买了一头牛，命杜顺时远路送给八路军游击队作为慰劳品。过年时写对联明志：“抗日救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顶天立地，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他不让孩子们升县立中学，因中学推行奴化教育。有一次，伪县大队长李金海领着日本顾问和翻译去聘请他教课，他托病拒绝，以后把家庭教学工作转入地下，把教科书和教材都藏起来。

他在病中还不忘救国宣传，以“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做启蒙课。经常为孩子们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陆游的爱国故事，教孩子们念岳飞的《满江红》。1945年当他自感不久于人世时，他伏在炕上写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让孩子熟读背诵，虽然病危，仍对争取祖国的解放充满着信心。

1945年9月，高唐县城解放，解金声县长上任伊始，即代表我党往访友莱先生，致慰问之意，并征求抗战胜利后建设高唐的意见。当友莱先生病重垂危时，又有我党干部多次往访，有的对他说：“您老人家的品德为人，我们是很

了解，很敬重的，希望你病愈后出来为人民为党工作……”
足见我党对友莱先生——这个赤诚的爱国者，是充分肯定了的，可惜他已病入膏肓，不能如愿以偿了。

（五）

杜友莱先生正直磊落的品格、赤诚爱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家。

1943年，友莱先生的原配夫人去世后，由于家中无人照管，续娶了雇农家女巩立清，这位出身贫苦的女子，敬重友莱先生的人品。友莱先生病危时，劝她改嫁，她发誓不嫁。在十年浩劫中，有人不顾事实，竟把她定为专政对象，她坚信友莱先生是爱国者，是非—定能够澄清，后为她落实了政策，每日起早睡晚，为生产队积肥劳动，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墙上挂满奖状。这一切是和友莱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

友莱先生的弟子侄儿，有的做中学教师，有的做人民医生，有的当空军飞行员……就连去世的（友菱、友苒、淑时、振时、超时）在内，他们都能继承友莱先生的遗志报效祖国，没有辜负他的教育之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立功；有的继承先生愤世嫉邪的精神，在国民党统治下做地下工作，策动国民党空军以各种方式起义；有的亲自驾机第一个从台湾飞回大陆；甚至未得见面的外孙，也有感于外祖父的爱国精神，为了反对林彪、“四人帮”，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敢于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

（六）

杜友莱先生的一生，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功绩卓著，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志士。追溯他的一生，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其一、追求真理，心通民众。

他从幼年时期即建立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因而热切地寻求使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的真理，但因时代的局限，由赞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改良主义，而转向孙中山的同盟会四纲领；由辛亥革命后的旧三民主义而转为信仰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及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学说，终于使他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欺骗中惊醒，而成为一个爱国志士。那些富家子弟的耻笑，贪官污吏的排挤和汉奸卖国贼的诱逼，考验和锻炼了他，他的一生终于被历史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他因穷苦出身，从心眼里爱护穷人，不顾家人的反对，他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穷乡邻，在困难关头，他匀出糊口的粮食，救活了很多穷孩子。他关心民众，从不摆架子，当省议员时，他住在省议会宿舍楼上（原贡院址），临街有一段上坡路，每当看到推车人上坡困难，就赶快下楼相助。在家时教育子女，能干各种农活，做到真正的慈爱。

其二、兴学办校，广泛施教。

友棻先生一生独立并与人联合创办了多所学校，他对发展高唐县及全省的教育工作做出贡献。尤其他兴办女校，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倡导妇女放足剪发，并从本家的孩子做起，身体力行以广宣传，更是可贵之举。

除做好教育领导工作外，他还抽暇教育子侄辈以及一些穷苦人家的子弟，以增加和巩固他们的学业。其弟友棻正是通过他的辅导，不待毕业而以特优成绩考入北大予科的（理

科)。其后又分批教育弟妹和子侄们，使他（她）们先后成为有用之材。抗战期间，对养子、族孙和外甥们的教授，是在环境简陋、身心憔悴的情况下进行的，用心之苦，更非一般。

他贯彻学习劳动并重的原则，教学生边学习边劳动。他有教无类，经常送教上门，对于劳作终日的农民，抽空为他们在地头或晚饭后上识字课，百教不厌，直到学会为止。

他在教学中有极大的感染力，读屈原放逐、岳飞被害的文章，时常令人潸然泪下，而读到《礼运篇》时，则又令人对大同世界产生无限向往之情。他讲到郑子产不畏强暴，雄辩滔滔之利舌，则有气壮山河之概！他能把感情融化于读书声中，潜移默化，使学生志向明确，正气大振！读陆游“示儿”诗时，谁能不产生强烈的敌忾心！如果缺乏对教育对象的热情，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其三、正真爱国，高风亮节。

友棻先生一生坦荡磊落，对祖国忠贞不渝，无限热爱。北伐时，他主张土地交公，但当时又不知交给谁，对国民党很不放心，军阀混战之时，他放弃仕途，不事权贵，回乡躬耕；外敌入侵时，他教育鼓励子女投身抗日，报效祖国；困难中，冒险看护八路军的伤病员夏兴宝、韩九宾，并让儿子杜顺时侍候，直到化装送走；卖了地买牛去慰问抗日的亲人共产党一一炉头的李俊卿等；日军占据高唐，请他出仕，他保持民族气节，宁可饥饿流离，也决不为日本人做事。在那样的环境下，友棻先生的所做所为，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人生轨迹，表现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饱食终日、贪图安逸、庸禄无为的人做不到的，也是一个追逐名

利、慕图荣华、少廉寡耻的人根本无法做到的。

友棻先生有幸看到了抗战的胜利，但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实为可惜。他去世后留有遗物（省督学委任状，银质圆形兰色议员徽章、“同盟会”会员证），但历经战乱，后又遭十年浩劫，遗物已荡然无存。

（承蒙杜道时、杜修时、杜鸣、杜平时、杜方游、王诚华、谢均之等同志提供书面和口述材料，特此致谢。）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缅怀伯父杨清晓

杨 菁 先

我的伯父杨清晓，名奎规，字清晓，一八七九年生于高唐县赵庄乡杨庄。他青少年时代，正值满清皇室互相猜疑，勾心斗角之时，掌权者荒淫无耻，大肆残杀无辜，到处兵痞横行，盗匪崛起，民不聊生。伯父一家人，在黑暗社会中艰苦奋斗，挣扎度日，争得了“小康”之境。伯父的长辈是墨守成规的人，信奉“学而优则士”的信条，谆谆教诲伯父“念书”、“念书”，以求出人头地。然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又迫使伯父不得不抽空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在社会影响和家庭熏陶下，逐渐认识了旧社会的现实，产生了爱国思想，立志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的未来。他在先辈良师的教导下，认真读书，数年如一日，终于考中了清末的“秀才”。后来，他博览群书，认定“事实求是，做出成绩，走正路乃做人之本”。民国初年，他进入高等学堂学习，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蝇头小楷出众，撰文达意著称，当局奖授他“贡生”学位，人们称他“杨(洋)贡生”。随着学业的进步和知识丰富，他感到世态可悲，毅然选定了“育人”这个职业，考入了山东优级师范，毕业后开始了教书生涯。曾先在小华庄、孙家庙、文庙等学校任教。一九二五年，他积极协助金石兰校长筹办高唐中学，并任事务主任两年多。1928年，金石兰校长被土匪头子李长兴和反动分子李鸿楼谋害，

他悲愤异常，帮助料理了金校长的后事，便离开县中学去三清观学校任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战乱不息的年代，他仍坚持教育为本，又先后在文庙、于庄、城北十五里铺、韩寨小学任教，一直到1951年，他七十二岁高龄，才离开教学岗位。伯父的一生，可谓桑梓执教五十年，勤恳育人未稍闲。

伯父和李戟门、李玉轩、李栋卿三位老师，是高唐废科举兴学堂时，开始任教的四位老师。他们德高望重，在一生中总是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应尽的神圣职责，竭尽全力哺育青少年成长，被人们尊称为“老老师”。伯父非常喜爱教学法一类的书籍，得之如获至宝，必精读细研，化为己有，用于教学。他教“国文”课，尽管自己国文基础知识甚厚，又积累了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教高小的语文课，已是轻车熟路，勿需多做准备，但是他仍然认真写教案，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记得国民党北伐后不久，国民政府制定的语文教学计划中，有一课的内容是“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的歌谣。“外婆”是南方的称呼，北方小孩是不懂的。他即向教育局提出：“小学语文课本应照顾地方特点，不能把南方编的课本硬搬到北方来用”。县教育局认为他提的意见很好，随之改换了不适当的教学内容，使教学工作更加切合地方实际了。伯父在三清观女校教学期间，除教语文课以外，还主动担任了自然课教学。他为了教好自然课，购买了许多自然科学参考书，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向刚从一师毕业的杨厚基老师请教，不怕失面子，信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学宗旨。在课堂教学中，从不故步自封，也不含糊其词，而是紧跟时代的步

伐，带领学生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他常和家人讲：“教书是育人的大事，要对学生负责，真正使学生学到知识，误人子弟是不道德的行为，如同杀人。”1942年，伯父在文庙小学任六年级班主任，次年这班学生参加升学考试，报考师范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了，前十名中有九名是该班毕业生。

伯父为人正派。有一段时间，高唐教育界分两派：一派是一师（济南师范）毕业的；另一派是三师（聊城师范）毕业的。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对教学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伯父对此十分反感，宁肯冒着被解聘而失业的危险，也不介入派系的分争，而唯教书育人为己任，得到好评。

伯父主张教学要“有教无类”。他对全体学生负责，不偏爱天资聪明的学生，也不轻视智力一般的学生。他说：“对于学习好的学生，即便是智力稍差一点，也要热心地给予辅导，如同雪中送炭一样。”例如：那时在三清观学校上学的学生中，有豪门杨绍堂、商会会长姚伟亭的女儿，她们自恃聪明，并不十分用功，伯父对她们认真管教和指导，并不表现出淡漠；对一般肯用功的学生彭淑贞、谢清芳等，他都精心辅导，使其学得扎扎实实，这样有力地促进了教学效果全面提高。

伯父对女子教育事业，特别重视。他认为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女孩子有读书的机会不容易，往往上进心比男生强，求之欲比男生迫切，因而读书比较刻苦，当老师的应对她们格外关心，满足她们的求知欲望。他常以“孟母三次择邻”和孙中山先生的母亲育人的故事说明师长对后代成长进步负有至关重要的教育责任。伯父常走访学生家长，同学生家长促膝谈心，他不辞辛劳地劝说学生家长支持自己的女孩子上学

读书。如杨胥婷同学的家境不好，其父母想让他读完小学就辍学，经伯父对其家长作说服工作，杨胥婷同学不但上了高小，而且又上了师范，后来她当了人民教师。谢清芳同学，也是在伯父的帮助下，坚持读到师范毕业，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

伯父培养教育后代，从不溺爱，也不严厉。在他循循善诱的教导下，他的女儿和五个孙女，都读到高中毕业，有的还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伯父教育子女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钱会丢，财会失，只有本领在身最牢固。”他说父母的责任就是教育子女懂道理，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手段。他立说立行，尽管自己的家庭不富裕，当时二十口人靠五十亩地生活，宁肯借债也要让孩子们读书，他的四个儿子和十二个孙子多为大学毕业，成才就业，在广阔的天地里，施展着智慧和才能，为社会作贡献。其身后两代成员中有三十三人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被人们誉为“杨门教育世家”。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1934年秋，我七岁，尚未上学，跟伯父进城住了几天，伯父说他喜欢小孩，他的校长杨厚基也喜欢小孩，还给小朋友讲故事作画。我和常妹跟伯父去了三清观女校，果然大开眼界，对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就很愿意步入学校的大门。可是，我因故未能如愿以偿，直到1942年初春，伯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也不小了，别乱跑了，跟我到文庙念书去。”他对人们说：“越是乱世无投奔的时候，越要读书明事理。”我跟他到文庙小学插了班，他是我的班主任，我们爷俩朝夕相处，我受到诸多教悔，真是培育之恩，千载难忘啊！

伯父寓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每逢节假日，在外上学的做事的都回来了，叔兄弟姊妹等几十名，计青少年有二、三十名。伯父摆好家堂，合家团拜后，就介绍家谱，教导我们长幼有序，说家谱的序文是篇好文章，要求我们认真去读。那时，伯父家以大家庭著称，有六十多口人。伯父教育我们树立集体观念。他说大家庭的好处，一是人多力量大，大小事情都有人来管，忙而不乱；二是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既节省人力物力，又能把各项事情做好；三是全家人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兄友弟恭，互不猜疑。他告诉我们，要养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的好习惯；要艰苦奋斗，女的会做鞋，男的会用锄，人人都能自力更生。在这方面，大哥杨少庚照伯父的教育去做，表现突出。他虽大学毕业，但并非文弱书生，样样农活精通，真可谓文武双全。伯父十分推崇大哥实践了治家格言“过日子有计谋必喂猪，全家人都礼让必和睦，青少年要团结必读书。”要求我们铭记在心，认真照做。

他对青少年思想修养，提出过很多至今仍有教育意义的修身之道。例如，他教导我们要未雨绸缪，强调凡事预则利，不预则废；要自奉俭约，尊老爱幼；遇有争论之事，须平心静气，首先找出自己的不足，然后推及别人；既要听话，又不轻易地听之任之；急则三思，屈志志诚等语重心长的话，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伯父处事通情达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麦收时，城里来人派官车，催车的人是伯父的学生，全家人愿把出官车之役迁往他村，伯父自有主见。他明断说：“咱是该出的不出，让不该出的去出，这是叫猪替羊死，是要受良心责备的，咱决不能

办”。看得出，他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之理，教育家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还有一件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天，某团体的兵痞闯进伯父家，声言：“你家有八路（指廉哥和厢哥），得交出来，否则……”我们一家人被吓得手足无措，唯有伯父胸有成竹。只见他布置家里人，三五成群地出入家门，川流不息，不时说些刺话，激得兵痞灰溜溜地走了，我们全家人都羡慕伯父施计排祸事，智高保安全。

伯父待人诚恳、忠厚，主张友谊为重，厚道为先，不计钱财。他和李戟门老师是同学、旧友，两人关系极好。戟门老师无子，又晚年丧妻，仅靠一点养老金维持度日。是伯父帮他在房庙找了老伴，与他相依为命；伯父还在经济上慷慨相助，使戟门老师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安度晚年。

伯父思想进步，拥护革命。他敬佩杨厚基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好青年，教育自己的孩子“读书明理为国为民”，支持他们走革命的路。他和金石兰校长相交甚厚，其三子杨少廉曾拜金石兰为义父（金无儿）；他赞成和支持金谷兰组织暴动；其侄杨胥调就是在金谷兰组织暴动时，被反动分子杀害的。伯父的内弟李玉红，是金谷兰暴动时的骨干之一，后来逃亡东北九年方回家。“西安事变”后，我兄少廉、少先（伯父的四子）看望已出狱的金谷兰，于1937年9月和金谷兰一起到济南第三集团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后一同回到聊城范筑先部参加了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现在伯父已作古多年（1964年故），可是每当我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是他说服了我

父亲，我才踏进了校门。又是他精心培育了我这农村长大的孩子，考入县师范学校；是他为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贡献了毕生精力，是他奠定了杨门教育世家的坚实根基；是他培养的革命后代，转战南北，为人民建功立业；是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带动了代代新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增砖添瓦。伯父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今就所知写此短文，追记伯父的点滴往事，以慰藉其在天之灵，愿他老人家的不朽业绩永世长存。

〔附记〕杨门教育世家，始人杨清晓，其子（侄）孙的学历、任教情况如下：

长子杨少庚，曾在聊城三师、北京体专、东北大学等校任教30年，著有《体育学》一书。

次子杨少庭，山东聊城三师毕业，曾在县文庙学校任教，与赵宗泉、李思远、房士亭、朱学温等五人，首创高唐第一高级小学。

三子杨少廉，聊城三师肄业，曾在本县张唐庄小学任教，抗战初参加革命，离休前为安徽省正厅级领导干部。

四子杨少相，济南师范肄业，1937年参加革命，曾在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做领导工作。

女儿杨少青，毕业于锦州工业专科学校，曾在锦州师范学院、辽阳化纤学院工作。

侄杨和轩，山东财经学校毕业，曾在颜辛庄小学、谢里长屯完小、十五里铺、曲庄等小学任教。

侄杨晋先，高唐师范毕业，1948年参加教育工作，曾任北五里完小、赵庄联校教师。

孙杨英谱，聊城二中毕业，先后在杨庄、太和庄、南关

等小学任教，兼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高唐县委办公室、平原省人事厅、山东省人事厅任职，后任巨野县副县长、聊城师院政治部主任、荷泽地委行政学院领导职务。

孙杨瑞谱，1949年参加教育工作，曾在七里庄、韩屯等村任小学教师。

孙杨琴谱，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在齐河、茌平等地任教，69年至85年任高唐一中教务主任，现任高唐北关中学党支部书记，获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孙杨琰谱，山东财经学院毕业，现任西安市纺织局审计处长。

孙杨璠谱，安徽省工学院毕业，任四川省荣昌县益民机器厂高级工程师。

孙杨珍谱，山东医学院毕业，现任刘寺医院院长。

孙杨玺谱，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现任兖州拖拉机厂技工学校校长。

孙杨新元，南京工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研究生，曾赴美留学，现任安徽省合肥大学讲师。

孙杨新潮，安徽大学文学系毕业，现任安徽省经委科长。

孙杨宪临，毕业于安徽省医学院，任职合肥铁路医院办公室主任，主治医师。

孙杨滨，清华大学毕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孙女杨玉芳，山东大学外语系毕业，任职于甘肃省某市某军工单位。

孙女杨玉环，任县工商银行。

孙女杨路明，清华大学毕业……。

孙女杨建明，任职于北京市公安局。

孙女杨立新，西北大学研究生。

孙女杨永红，任职安徽省烟草公司。

计杨清晓以下子女侄孙等 87 人（包括未成年后生），其中有大中专文凭者 54 人，从事教育工作的有 33 人，占成年人人数的一半以上。

乡人赞曰：如尊如贵，不如您（杨）家父子祖孙有大专（大专学历），世世代代有良师，德高望重世罕有，五辈夫妻达古稀，可谓鸣山望族，教育世家。

针灸医生崔三邪轶事

朱 学 温

崔三邪，本名崔凤鸣，武城县大营镇人，生于1882年，兄弟间排行第三，没有文化。十几岁时，一担子挑着全部家当来到高唐从事银楼行业（即制作金银首饰，叫这种行业为开银楼），寄居高唐镇中街。因有祖传针灸医术，兼行医施诊。此人性情粗犷豪爽，重义气，不拘小节，不畏权势，爱憎分明。穷人求医不计报酬，称其“三哥”、“三叔”或“三爷”一请即到，总是先看病后吃饭；而对财大气粗依仗权势者，则不然，他有句粗话就是“不捣鼓”（即不予理睬）。所以有些人就讥讽崔凤鸣不通人情，不谙时务。所谓“三邪”之称即缘此而起，并非指其邪恶，天长日久渐失其真名。今日问及崔凤鸣已鲜为人知，而“崔三邪”之名仍有所闻。

一次，皇店村林洪奎忽患急症卧床不起，全家惊慌失措。有人提议快请崔先生，及至，于脑后轻轻一针，病人立即复生。某日，一贫苦农民徒步来请崔先生，崔正吃早饭，嘱其稍候，饭罢随他同去，正巧富人家长工驶骡马轿车也来请医生，声称“老太太有病，东家已备好酒饭，请先生到那里去用早餐。”崔曰：“他家（指农民）也有病人，他来的早，我得先去他家。”长工一再恳求说“回去不好交差”，崔不好再推辞，即答应说：“坐你的车先去他家（指农民），

看完病然后去你东家，不然你就在此等我。”长工无奈，只好从命，先把先生送到了农民家。

1932年，高唐县政府（国民党政府）县长姚公槃母亲患病吃药无效，听说有个崔先生善针灸，便差人去请，崔推说，“不敢见官，怕进衙门”，执意不去，县长无奈，只好转托当地同族兄弟姚公南去请（据云：当地姚家和县长祖籍江西，为同宗）。崔去施诊，姚县长亲自相陪，崔和姚都好饮酒，从此和县长成了酒友，后姚县长调走，还从家乡寄来孔府名酒，以绘故交。

北关中学书记杨琴谱十七岁时患瘟疫（即伤寒），久治无效，危在旦夕，一家人在绝望之中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崔先生请了去，一次针灸病情好转，两次即痊愈，由此琴谱对崔先生针灸医术极为佩服。他回忆说：“当时家人真是拿我当死孩子治了，是崔先生起死回生的高明医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城内老菜市街北端路西李家饭店老掌柜李兆龙（西街东大队人）年老多病，儿子志修、志国多方求医无效，病情愈重。后兄弟二人想起已不行医施诊的崔先生，便把他请了去，崔初见病人便说：“你父亲不行了，你们赶快准备吧！我给他下上针暂时维持生命（按本地旧俗病人在咽气之前必须穿戴上寿衣寿帽，否则为不祥）。”待准备穿戴完毕，崔先生起了针病人断了气。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城内历遭兵祸匪劫，多数居民都到城外农村去避难，崔先生也到城南皇店村去住，村内一逃难乞丐偶得重病，乡人告知崔先生，崔立即到碾棚施诊，乞丐痊愈，感激涕零，把要饭积攒的几个钱买了鸡蛋去

谢先生，崔不但拒绝、不受，反而又拿出米和面馈送难民，要他好好养病，由是群众交口称赞。

一九三八年后，崔回城定居，保持民族气节，为躲避汉奸伪杂找麻烦，借口年老眼花行动不便，不再行医。但遇有穷人或故交来请，还是暗中出诊，有时也冒险出城。伪县长李九子（李采题）有病差两个跟班（即警卫员）去请，崔推说“腿有毛病不能走路”来人要去牵马，崔又说“眩晕不敢骑马”，来人生气说：“我背着你！”崔果然叫他背着，因其身长大，腿拖于地，另一跟班从后面架着他的双腿，出门后崔自觉不好看，便下来勉强跟着两个跟班的去应付了之。

一伪杂头日差人扮作农民进城将崔请至家中为其治病，病愈后仍匿名，送先生一头小毛驴让先生自己骑着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崔先生照常施诊行医，参加了医联会组织，由于没文化，不愿学习，不习惯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人民政府也不强人之难，由他自便，其针灸医术传于南街华某，因学而不精，亦未成用。1961年八十岁的崔先生与世长辞。崔潦倒一生，身后无子嗣，抛下老妻一人，后由高唐镇中街大队以“五保户”赡养，留土屋三间，别无长物，唯崔三邪轶事在街头巷尾还时常传颂。

一九九〇年七月九日

李苦禅联语

盛 星 辉

已故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生于山东省高唐县三十里铺乡李奇庄一户贫苦人家。他一生酷爱艺术，幼年曾跟父兄、乡邻习武，年长后，考入聊城二中，在武术上又得到体育老师屠××的精心传授。他先后学习了六合拳、少林拳、梅花桩、双刀、齐眉棍和七节鞭等。李苦禅长大成人后，画技、武功双成，行侠仗义，深获人民好评。有一次他与拳师王芬斋对句撰联：

王芬斋：形无形、意无意，发拳之中是真意；

李苦禅：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间见真法。

这副对联说明了武术与绘画之间艺理相通。

“四人帮”横行时，老画家李苦禅画竹之后自题对联，抒发自己的情怀：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老作家管桦，被“四人帮”定为“黑线”人物后，不能写作了便钻研绘画。一有闲暇，管桦就独步紫竹园，凝神千杆竹，画出了风靡一时的“风雨竹”，并把李苦禅的对联，由七字扩展到十五字：

根扎大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

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

这表明了广大知识分子，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忠贞不

渝，刚直不阿的高尚情操。

1980年，在为邓拓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上，李苦禅与傅克撰联共挽之：

燕山磊落，夜话千秋。

联中所嵌“燕山”、“夜话”四字，是邓拓著名散文集的书名——《燕山夜话》。副挽联，八个大字，落地有声，对其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1982年，李苦禅为连云港胜地书联云：

留连山海，乘云河汉。

联中嵌入“连云”地名，妥贴自然，使胜地增辉。

1983年6月9日，苦禅老人在逝世的前一天，强支病体，为日本长崎市修复的孔子庙，写下了一副六尺抱柱楹联：

至圣无域泽天下，盛德有范垂千秋。

“至圣”为孔子的谥号“至圣先师”的省称，语出《史记·孔子世家》。“无域”指没有边界。“泽”即雨露，引申为恩泽，德泽。“盛德”指大的德行。“范”即楷模和标准。“垂”即留传。

〔附记〕

本文参考《中国体育报》1988年12月18日3版；《古今对联故事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24页；《现代名人对联选注》（重庆出版社）149至150页。

〔作者简介〕

盛星辉，湖南益阳县人，1930年出生，1949年9月考入湖南军政大学，1950年至1956年在湖北师

大历史系学习，1960年至今在益阳谢林巷中学任文史教师。曾给政协高唐县文史委员会整理《艺术大师李苦禅传略》一文。

高唐部分画家作品选

文 史 科

第一、四辑《高唐文史资料》，已介绍过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已故）、国画家孙瑛、谢家道和版画家程辛木的艺术成就概况。今选他们的数幅作品，印入此辑文史资料，供广大读者参阅。照片资料由贾建华、张祖信二同志提供。

高唐机械厂的由来

李 开 峰

一、从“恒顺成”到“人和成”

与山东省接壤的河北省故县城有个长林村，旧社会这个村在附近千里之内小有名气，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会翻砂技术的手艺人。相传该村的铸造技术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们在技术上又很保守，一般不传给外人。所以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长林人生产的铸造产品（主要是一些犁铧、犁镜子、铁篦子等部分生产、生活用具），一直控制着冀南和鲁西北一大片地区的市场。

二十年代初，长林村就有十几家规模不等的铸造作坊了。其中有一个王姓人家经营的作坊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在高唐、禹城、齐河、东阿、茌平等地。王家作坊里有一个名叫王景洲的在高唐、齐河联系业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齐河县境内孙家庙的两位僧人（一名是高唐华家务人，一名是齐河县人，他们后来都还了俗）。通过协商，两位僧人愿意拿出一定的资本让王景洲在高唐县尹集经营作坊，这样由王景洲任经理的一个铸造作坊，就在尹集开业了。但作坊规模很小，只有七、八个工人，年产铸铁件大约三十至四十吨，从业人员也都是长林村人，除经理王景洲外，会计李杰三、业务员耿连三（王的亲戚）都没有股份。在尹集的几

年，经营管理很好，效益可观，积累了一些资金。1926年，王景洲又在高唐县城东门里路北（县邮电局处）买了一处相当不错的院落，其房屋和门面在当时的城内数一数二，作坊迁到城里以后，定名为“恒顺成犁铧店”。

“恒顺成”犁铧店实际上是翻砂厂。由于有了较好的地理条件，厂子规模有所扩大。生产品种逐渐增多，从业人员达二十多人（全都是从河北故城聘来）。房屋资产情况是：十六间房，九间草棚，一座铁炉，四人拉大风箱一个（后改为畜拉鼓风机），铸造模具三十多套，资金约五至六千大洋，年收碎铁十余万斤。场地南北约五十米，东西七十至八十米，呈三角形。产品以自销为主，也搞批发。但由于受当时工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工七至八个月，工人也都是些季节工。经理王景洲体弱多病，他儿又无管理经验，便托会计李杰三代管店里全面工作。李杰三是“恒顺成”的创业人之一，虽无资金股份，却享有人股，不久李杰三就让其侄李汉宸在柜上做杂务。

李汉宸，1906年出生在长林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本村读过几年书，十六岁开始在本村“复兴公”铁厂学徒干翻砂，三年期满后又在枣强县一个翻砂厂当了一年多季节工人，1926年他来到高唐，在“恒顺成”犁铧店当工人，后来经理看他能做事情，就让他担任“外水”（即现在的供销工作）。“恒顺成”在李杰三、李汉宸的经营管理下得到发展，生产成倍提高，又兼营了瓷器（用瓷器换废铁）和大五金，到1937年，“恒顺成”犁铧店达到了鼎盛时期。

1937年10月15日，日寇侵占高唐，“恒顺成”犁铧店遭到日寇洗劫，库存的铸造产品及五金商品几乎被抢

劫一空。据说那次“恒顺成”资财损失达十分之八、九。1938年，经理王景洲去世，其子王寿昌继任经理。但王寿昌在经营管理和用人方面都远不如其父，加上日伪杂经常骚扰，为此，王寿昌回长林了。为了维持“恒顺成”的局面，李汉宸和伯父李杰三带领工人把“恒顺成”犁铧店残留下来的一点家底搬到了城南郭庄，在郭庄维持生产了一年多。高唐县城局势稍稍平定之后，“恒顺成”犁铧店又迁了回来，此时经理王寿昌也回到了高唐。1939年年底店里进行劳资结算时，发生了矛盾。这时李汉宸和李杰三开始认识到替人做事非常不易，更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决定自己集资建一个厂。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40年，李汉宸在禹城东联合了当地刘福亭、刘福盛弟兄二人，把他们原来开设的杂货店改为“福兴东”犁铧店，“福兴东”犁铧店除铸造农具外还兼营杂货、五金。开业不久，李汉宸就将伯父李杰三接到了禹城，至此，他们正式脱离了“恒顺成”犁铧店。李杰三到禹城后，李汉宸和刘氏弟兄二人请他当了“福兴东”犁铧店经理，刘福亭任副经理，李汉宸仍搞供销跑外交，干了一年，“福兴东”犁铧店收益可观，这样，李汉宸和李杰三在禹城算扎下了根。

再说“恒顺成”犁铧店，自王寿昌上任后，劳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李汉宸与李杰三退出后，“恒顺成”即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又发生了全体职员集体辞职事件，王寿昌几年后也死去，“恒顺成”由两个儿子王春森、王春田支撑着。但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远远不如其祖父王景洲，所以，维持“恒顺成”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还是年年开工生产，却一直没有出现原先那种兴旺景象。

在高唐“恒顺成”经营不景气时，“恒顺成”的老同事耿连三、王春林、张炳周请求李汉宸和李杰三给他们找出路，并说他们在高唐“恒顺成”已无法再呆下去了。在当时禹城“福兴东”犁铧店是容不下他们三人的。于是李汉宸和他们三人决定多方筹措资金在高唐开设厂子。李汉宸着手解决资金问题，拿出了他和伯父李杰三在禹城“福兴东”的上年分红，并又去济南找“谦益兴”货栈的田雪村和王敬斋联系，田、王二人了解李汉宸和李杰三的经营能力，愿意出一部分资金入股以解李汉宸、李杰三燃眉之急。城南郭庄郭泽远对李汉宸和李杰三比较熟悉，也投资予以帮助。当时出资人以及他们占有股份的情况大体是这样：李汉宸占25%，李杰三占15%，田雪村占20%，王敬斋占20%，耿连三占12%，郭泽远占8%。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情况是：名誉经理李杰三，经理李汉宸，副经理耿连三，会计王春林，生产由张炳周负责，供销及外交仍由李汉宸兼任。资金及人员落实之后，李汉宸回到高唐筹备开业事宜，得到民主人士姚伯芳先生的帮助，在高唐南门里解决了厂址，很快成立了“人和成”铁厂。之所以取“人和成”作为厂名，是因为当时厂里的管理人员及部分工人都是从“恒顺成”出来的，他们一块共事多年，又相互了解和信任，就取了“人和”二字。

二、“人和成”的发展与改革

1941年秋，“人和成”铁厂正式开始生产。这时，李杰三李汉宸仍兼营着禹城“福兴东”犁铧店的业务，李杰三常住禹城，李汉宸则两头兼顾。1948年“福兴东”停

产，李杰三和李汉宸把在“福兴东”分得的一些资产运回高唐，入了“人和成”铁厂。

人和成铁厂开业后，由于李汉宸同管理人员及工人齐心合力的工作，几年来工厂很有起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挑起内战，高唐县城虽然解放了，但县境内的敌伪顽杂仍很猖狂，有的杂团暗地进城勒索，强夺铁厂的化铁炉及其它生产原料，有的杂团威逼工人为他们铸手榴弹和地雷，李汉宸坚决予以拒绝，工厂始终没有为任何一个杂团生产枪弹。在杂团势力干扰下，铁厂无法正常进行生产，于1946年下半年被迫停工。在停工期间，副经理耿连三和会计王春林离厂回家另谋生路，股东田雪村、王敬斋、郭泽远也都先后抽回股金离开了“人和成”铁厂。这样，“人和成”所剩资金已难以开工恢复生产。在铁厂面临着严重危机的时候，是高唐县人民政府给予了扶持帮助。1948年下半年，“人和成”铁厂恢复生产，铁厂的真正发展，也是从这以后开始的。

李汉宸出身工人，又有多年的管理经验，解放后，他的特长和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严把质量关，每逢开炉时他都亲自操作，出了废品认真查找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在他和伯父李杰三的经营管理下，厂子的设备不断更新，规模逐渐扩大，为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如1950年改用马拉鼓风机，取代了四人拉大风箱化铁的原始做法；由原来单一的干模铸造逐步采用湿模铸造等等。李汉宸在党的教育下，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自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各项工作中表现都很积极。得到工商界广大职工的

赞扬。1951年他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带头捐款一十万元（旧币，等于一千元人民币），为全县捐款数额最多的一户。1952年他被选为高唐工商联主任委员、县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山东省工商联委员。同年李杰三去世，“人和成”铁厂就由李汉宸自己主持经营。由于李杰三没有子女，他在“人和成”的股金都归了李汉宸。

三、公私合营之后

1953年，中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李汉宸积极响应。1955年初，“人和成”铁厂实现了公私合营。在合营过程中，李汉宸没留一点资财和房屋；他儿子李开峰当时具备条件做行政工作，可他坚持让儿子到车间当工人；合营前不偷留资金，合营后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李汉宸接受改造的勇气和决心，表现了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

当时高唐还有“恒顺成”犁铧店（王春田任经理）和“增盛祥”铁器铺（葛桂平任经理）等店铺。“人和成”实行公私合营后，对他们产生了极大影响，纷纷要求进行改造，与公方合营。1956年2月经政府批准，“恒顺成”犁铧店、“增盛祥”铁器铺并入“人和成”铁厂。

“人和成”铁厂合营后，公方派韩玉明任厂长（几个月后换李玉文），田身修负责财务，私方厂长是李汉宸。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干部工人积极性非常高涨，当年就将鼓风化铁改用机械操纵，又一次取代了畜力。铁厂规模也不断扩大，产品种类不断增多，从只生产小农具及生活用具迅速扩大到生产锅炉、水车铸件、步铧、双铧和一般机器

零件，铸造吨位从年产三十多吨发展到年产二百多吨，经济效益成倍提高。地区及县委、政府对这家工厂的发展十分关心，有计划地分期投资，扩大再生产，调配人员，解决技术力量不足问题。1956年底，在县城东关买定新厂址，国家投资于1957年上半年建了新厂房、办公室、仓库和宿舍，当年夏天铁厂就从南门里全部迁出，使高唐第一家工厂初具规模。

1958年大办工业时，修配社、铁业社、白铁社与公私合营后的人和成铁厂合并，命名“高唐县机械厂”。从此高唐才算真正有了一家工种较全的机械工厂。

〔作者简介〕

李开峰，老工人出身，曾任高唐机械厂技术科科长，退休后留厂作技术指导工作，县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

高唐国营林场的建立与发展

孙 金 祥

高唐县西南部的旧城、三十里铺、赵庄、赵寨子等乡（镇），地处黄河故道，原有沙荒地十多万亩。这里沙丘起伏连绵，沙蓬、黄蒿、地丁、马杓等杂草丛生，荒芜的土地一望无际。每年春季沙随风走，遮天蔽日，淹没了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给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解放前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摇头兴叹，无能为力。解放后党和政府决心治理沙荒造福人民。于是领导人民进行造林固沙的伟大斗争。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大片沙荒已变成林海绿洲，美好的前景正展现在人民的眼前。

林场的建立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把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作为绿化祖国的重要任务。高唐县于1952年在当时的三十里铺乡王笠庄，培育树苗。建立了林业苗圃。清平县也于1953年在旧城镇（今属高唐）城北建立了树苗培育基地。两县相互配合进行植树造林工作。1956年3月，清平县撤销，旧城区划归高唐县，两处苗圃合并，以原清平县苗圃为主（即现在林场的南场），建立了旧城苗圃，由姚尚达同志担任苗圃的领导工作。当时只有房舍16间，职工4人，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1958年高（唐）、禹（城）合县时，李宽

文同志任苗圃主任。为治理沙荒，县成立了治沙委员会，旧城、三十里铺两个区也分别成立了区治沙委员会，并组织了500多人的专业队伍进行造林治沙工作，因无房舍，大家住在朱小吴、沈庄、袁庄等农户家里，这支队伍分南北两队，南队由王金弟同志负责，北队由邢光荣同志负责。1958年秋，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从南方视察后乘坐专机回京，途经鲁西北，从飞机上查看到鲁西北有大片荒地。他老人家回京后立即和山东省领导联系，指示：“要尽快把沙荒利用起来。”县委书记邢金岭接到省委的电话指示后，及时召开县委委会，作了认真研究，决定以旧城苗圃为基础，筹建高唐国营林场。1959年春，高唐国营林场正式建立，魏子芳同志为首任场长。林场面积为37,623亩，职工309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林场职工陆续下放，最后仅保留18名干部职工。当时，尽管国家十分困难，但仍不忘发展林业。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依靠公社造林，积极发展国营造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决定新建、扩建一批国营林场。高唐县国营林场被纳入全省计划。按照省的要求，县人委对我县的治沙造林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拟定林场面积为32,300亩，职工274人，省人委研究后，下发了（63）626号文件，同意高唐林场面积为22,600亩。然后林场与有关大队签定了土地划归合同。1966年根据地区“四清”工作团和县委意见，林场进行了土地调整，调整后实有土地为16,000亩。

林场的发展

自1959年林场建立后，立即投入了治沙造林工作。当时采取挖掘野生杜棵、杨柳为树苗，进行植树造林，虽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发展缓慢。1963年至1966年秋，芦洪年任场长期间，采取“冬栽杨，春插柳，随高就低，刺槐上岗，杨柳下洼”的措施，全场土地基本都植了树。1963年春还建果园60亩。这期间山东省林业厅拖拉机站也给予很大帮助，对林地进行了耕翻，加之管理较好，林场的效益有了提高，对防风固沙、改造自然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造林密度大、树种单纯、树苗生产不佳，大部分长成了“小老树”，成林不成材。

1966年秋，“四清”运动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林场遭到了空前洗劫。干部被批斗，林业管理被迫放弃，土地被侵占，林木遭破坏。仅1967年和1968年，被破坏的林木面积就达6000余亩，林地又变成了荒地，风沙又起。1971年至1972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场长宋希耀搞了“加杨”嫁接毛白杨近千亩。1975年林场支部书记王成龙在南场试造丰产林40亩，同年在林场东北角建苗圃一处，平整土地800亩。1976年育太青杨、毛白杨600亩，建房40间，打机井25眼。但由于土质瘠薄，管理较差，苗木生长不良，此后苗圃改为林地。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夏季，省林业厅派来勘察设计院，对林场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当时林地面积9,000亩，林木蓄积量仅有2,665立方米，且多为小材小料及薪炭材。是年冬季，县委、县政府根据省林业勘察队的设计方案，付诸实施。组织琉璃寺、张大屯、张庄、姜店、赵寨子、三十里铺六个公社的1,500名民工，到林场大干25天，修路挖沟14条，长73华里，搬动土方22万立方，完成了林场扎框划区工作。

1977年冬季，在扎框划方的基础上，开始平整土地、根治茅草，栽种太青杨，开展大面积造林。但仍是小穴（40~60cm²）、小苗（高2~3米），结果长势一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林业部确定山东省为合资营造速生丰产林试点，第一期工程全省5万亩。其中高唐国营林场13000亩（包括续建3千亩），部、省签订了经济合同，林业部对每亩林地投资100元，并明确了省、地、县应负的责任。1980年组织人员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1981年春，根据总体规划开始了造林施工，并年年编写合资丰产林作业设计书，提出科学造林的方法，严格质量要求，加强了生产管理措施。计有：（一）深翻改土、细致整地，改善造林的立地条件。造林前平整土地，削高填低，开沟大穴造林，十年共翻动土方一百一十余万方；（二）良种壮苗营造丰产林。采用了生长快抗性强的沙兰杨、69、214、455等欧美杂交杨优良品种，经二年培育的四米多高的大苗壮苗；（三）合理密植，精心栽种。改变了过去造林密度过大，林木营养不足，生长不良现象。每亩株数由过去的110~220棵，减少到22~33棵，深栽1.5米，以满足林木对水分的需要，提高了造林成活率，达90%以上；（四）营造杨树、刺槐混交林，充分利用土壤和空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加强抚育管理，实行林农间作。在营造丰产林的十年间，落实了幼林抚育措施，共耕翻林地8万亩次，施用化肥148吨，饼肥、鸡粪2370吨，林农间作25,000亩次；（六）加强护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林场于1982年建立了公安派出所，组织了20余人的护林队伍，认真管护林木，巩固了造林成果。1989年

被评为山东省护林防火先进单位。1982年还建立了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站，加强了林木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以上管理措施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十年来，国家投资144.4万元，已造丰产林12034亩，占合资造林任务的92.75%。如今林像整齐，林木生长旺盛，大片林木已经成材，至1990年底，林木蓄积量已达14,000余立方，其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植树造林还对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改善环境起到了明显作用。造林前沙丘遍地，茅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造林后风沙被封住了，只闻风声，不见沙起，林木郁郁葱葱，许多鸟类栖居于此，林场周围乡村农业生产连年丰收。

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林场基本建设逐步加强。建场初期仅有16间平房，现已有砖瓦房220多间，场区道路纵横交错，场容场貌焕然一新。在设备的添置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现有机井80眼，拖拉机两台，汽车三部。

在经营管理上，过去采取吃大锅饭的办法，生产不计成本，年年亏损。自1984年起，实行了以“包”为主的经营管理体制，砸烂了铁饭碗，取消了大锅饭，实行了多劳多得，极大地调动了林业职工的积极性。大家以营林为主，开展了多种经营，既营造了丰产林，又充分利用林间空地，广种棉花、西瓜等，收入大大增加，使林场扭亏为盈，脱贫致富，受到省、地、县的表彰和奖励。

做出贡献的人们

高唐国营林场自1959年建场至今，已有31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先后有13人任过林场党支部书记和

场长，16人任过林场副书记和副场长，2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来厂工作过，还有十几名干部在林场担任过各种管理人员，他们都为林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首任场长魏子芳，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和职工同吃苦共战斗，开创了林场的新局面。林场还于1960年开办了林业学校，魏子芳同志亲任校长，培养林业技术人才200多名，后来他们大都成为我县发展林业的骨干。分配到林场工作的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工作踏实，扎根基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进行规划设计，组织施工，抗严寒战酷暑，为振兴林场付出了血汗，献出了青春。大学生王耀堂、尹观文、段作成等，都是外地人，在林场坚持工作15年。王成龙一心为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劳成疾，为林场的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林场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先后被省、地、县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林场工人干部有：曹居仁、孙金祥、谭金友、于子秋、肖克俊、高洪山、袁长岩、傅仁泉等，还有五名职工转为国家干部。

高唐国营林场30多年的建场史，是一部艰苦创业史，是一部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实行科学管理的发展史。林场职工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造就出一批优秀林业建设人才。林场的光辉历程，将激励着人们向着新的目标奋进。（燕玉庆整理）

（附国营高唐林场历任正副书记正副厂长一览表）

国营高唐林场历任正副书记、正副场长一览表

姓名	任职时间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职务
魏子芳	59.9~62.1	场长兼林校校长	王佃印	63.2~63.12	副场长
王玉珩	61.3~62.1	党支部书记	韩玉德	64.9~65.7	副场长
芦洪年	63.6~66.7	场长	程登岩	64.8~72.4	副场长
赵怀风	66.8~70.12	党支部书记、革 委会主任兼林业 局副局长	曹占岭	67.11~80.12	副书记
周鹏	69.3	(工人代表) 革委主任	肖东玉	70.1~78.3	副主任(革委)
宋希耀	71.2~76.2	革委主任	刘钧堂	74.2~76.3	副主任(革委)

王连元	71.5~73.2	党支部书记	于庆三	76.6~84.8	副主任(革委)
董传浩	73.4~74.10	党支部书记	赵玉梅	78.3~79.3	副书记、副主任、副局长
王成龙	74.10~78	党支部书记	刘长兴	79.10~80.12	副书记
庞景浩	78.3~83.3	党支部书记、革委主任兼林业局副局长	孙金祥	79.10~84.8	副场长
纪恒	79.3~83.9	场长	许文浩	84.9~86.12	副场长(股级)
穆长厚	79.10~84.8	党支部书记兼林业局副局长	孙立成	84.9~87.6	副场长(股级)
孙金祥	1984.9	党支部书记副局长(89.5任)	高洪山	87.6~今	副场长(股级)
吴长兴	61.2~63.2	副场长	于子秋	88.6~今	副场长(股级)

小城春秋

——忆母校联立清师

许冠生

一九五〇年初春，平原省联立清平师范创办，开始招收新生。上级通知我们全班（原高唐短师师二）转学。四十五名同学，由董之楨老师带队，由高唐出发，身背行李，步行三十余里，一路风尘一路歌，中午时分，到达了清平这座为沙丘包围着的古城。在东门城楼前稍事休息，顺便打听了一下校址，便整好队伍，高唱革命歌曲，喜气洋洋地穿过门洞，进入城内。“小城”不大，倒也朴实幽静。清师的校址选建在北街的文庙故址，地近郊野，僻静空旷，充满乡土气息。学校的北头便是古城墙遗址，再外是连片的庄稼地。这样一个幽静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求学的青年来说，感到格外新鲜，心情舒畅。

学校乍办是初级师范，校舍全是新盖的厦子房。在五十年代初，校舍是第一流的。我们进校后编为一级一班，教室就在前排的最东头。进校不久，又由康庄（今隶属临清）转来了两个班，编为二级一、二级二班，学生八十余人。同年暑假又招三级三个班，学制定为三年。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分别招进了四级、五级，至此九个教学班的规模臻于初具。只可惜我们在清师的日子太短暂了，一九五一年暑假，

就结业回县分配工作了。

短暂的学校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校一年半，我们接触了两任领导，首任校长郎镜如，是位富有经验、治学严谨的老校长。教师也来自四面八方，均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中年教师，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有的是老中师毕业。也有一部分是在各种训练班受过政治训练，忠于教育事业的老教书先生。师资水平虽然不一，但大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旨于钻研业务，勤于学习，互相帮助，教学认真。对于我们的作业全批全改，辅导学生耐心，授课之余，还要到班内查看学习情况，让学生质疑问难，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校长和教导主任，经常深入课堂，听堂、查课，定期举行观摩教学。考试除随堂提问记分，另有单元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学期结束还按名次张榜，鼓励学生奋发上进。清师秩序井然，教风学风扎扎实实。师生关系和上下级关系都很融洽。

领导除重视教学外，还注重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抗美援朝、肃反等政治运动中团结、教育教师，同时也向教师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是清师教育学生的优良传统。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尚未走向社会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天真活泼，泼辣大胆，进取心强。学校抓住这一特点，上课之余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并且形成制度。每天下午有两节文体活动，各班按规定轮流活动。人人参加，不得缺勤。除集体活动外还有兴趣小组，适应每个人的爱好，不强求一律。教导处配合学生会，

每天检查评比，及时表扬。整个校院，上课书声朗朗，课下歌声四溢，丝竹齐鸣，交汇成一支喧闹的奏鸣曲，使沉睡的小城也沸腾了。歌咏比赛、文娱晚会、体育比赛定期举行。我们班的同学曾演出过古装戏《打渔杀家》、现代戏《小女婿》、活报剧《杜鲁门大失败》等剧目。打腰鼓、跳舞等娱乐也时有开展。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而且也学会了组织青少年儿童开展各项活动的本领。记得我们一级一班在许多活动中经常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不愧为清师的一级一班。

班会每周一节，晨会每天十五分钟。这是班主任配合班委会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时机，也是清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有效措施。班主任抓住这一法定时间，充分发挥班委会、团小组的作用，总结班级工作，严明纪律，引导学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自我教育。班会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有时采取主题班会，拟定专题加以讨论。学校采取这些措施，目的是向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因此学生的思想觉悟、组织纪律性及自治能力都很强，专业思想比较牢固。我们后来走向社会，为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是与学校教育分不开的。

在紧张的课业之余，除了参加学校安排的课外活动，各班还轮流参加平整校院的劳动。我们进校时，连个操场也没有，校院高洼不平，孔庙前后全是些碎砖烂瓦，横着几个土丘。庙西是一米多深的洼地，直达北城墙。于是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师生齐上阵，打一场平整校院的“人民战争”。采取三个班既轮流，又集中会战的方式，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义

务劳动。师生挥着膀子干，两人抬一个大筐，你争我抢，汗流浃背不觉累，边干、边喊，歌声四起，号子震天，整个工地沸腾了，平静的古城也沸腾了。同学们也形成了习惯，一到下午课余，便不约而同，拿起家伙，直奔劳动工地。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半年，蚂蚁啃骨头，硬是在一九五〇年暑假前，将高地铲平，把一个深一米、长五十米的洼地填平，开辟了一个新操场，三级进校只剩下扫尾了。同学们都感到这样的劳动有意义、有价值。一、二级的同学认为，能为清师的学友们创造一个美好环境，留下一个艰苦创业的好作风，而感到自豪。清师的领导和老师们也把我们的创业精神，作为传家宝一级级地传下去。所以，每个在清师学习生活过的同学，都知道老大哥的艰苦创业精神。听说以后的几级同学，接过老传统，在学校尽北头开辟了农场，种上了瓜、菜、豆，收获自给有余。

在清师学习生活的日日夜夜，各项活动颇有节奏，并且有劳有逸。星期天是属于自己的，学生自由支配，校方从不借故占用。除回家请假外，在校活动，任其自便。为适应青年人嗜睡的特点，星期天的早饭顺延一小时。星期天各按性趣自由活动，有学习的、练乐器的、打兰、排球的，也有三三两两逛大街和到城外郊游的，尽情玩乐，直到天夕。

伙食也调剂得很好，一日三餐，米粥、稀饭，早晚吃小菜，中午吃炒菜。半月一次小改善，一月一次大改善，不是油条，就是蒸包，逢到节日还炖猪肉一饱口福。放寒暑假总要安排大会餐，吃团圆饭。五十年代能有这样的生活也算相当不错的了。

清师！我的母校，只可惜为时不长，一九六〇年因三年

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学校放长假，中师二级、三级未及毕业就停办了。原校址划归高唐县旧城二中。学校虽然不复存在了，可它的名声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流传。她自建校到停办十多个春秋，为鲁西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培育了近千名教师。他们分布在高、临、茌、博一带，其中大部分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现在有的是局、中小学校的领导干部，也有的进修后到中等专业学校供职。四十多年来，清师的学生在教育战线上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

当回忆在清师的学习生活时，不少老同学都无限深情地说：“清师，我们的摇篮！”

（一九九〇年十月）

龙卷风袭击纸房头

丁 来 庭

纸房头刮龙卷风，已是近二十年的事了。这是高唐县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风灾，也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抗灾能力的检验；既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大自然劫难，又是一曲共产党领导的集体抢险救灾的胜利凯歌。我把当年掌握的情况，并据记载的资料，成文以记之。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六时左右（阴历后五月初五），高唐县南镇公社前纸房头村遭到龙卷风的袭击。

这天，天晴高温，前纸房头村群众，有的在田间辛勤劳作，有的在麦场上忙于打麦。全县统一调集的数千名河工，正在该村附近的七里河紧张施工。午后，西南方向刮来大风，人们意识到天气将会突变，半时许又发现倒西北风，继之一小时后又转为东北风。这时，有人远见东北方向空中云团集聚翻飞，上下滚动，在阳光照射下黑中透红。云团下方形成一尾状旋流，向纸房头村迅速逼来。临近之时，墨云顶天立地，风行响震之声如数台东方红拖拉机一齐发动，风速猛烈平旋，刮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气温骤然下降；天色黑得不见五指。

这股龙卷风从积雨云下形成，在高唐县城上空向东南方向移动，到达七里河与徒骇河交会处接触地面，主风道顺七里河南下，扫西屯村（在前纸房头东北六里许）西北角而

过。它首先袭击了西屯村以西的七里河施工工段，然后向西南方向旋去。途经倪堂村（在前纸房头偏东北四里），又冲向前纸房头村。这场前所未闻的龙卷风，残酷袭击了前纸房头村东南角一带，造成历史罕见之惨状。灾后，据现场考察推断：主风道北起于七里河与徒骇河交会处，南止于高、汪两县分界处，持续一时许，移动十多里。主风道宽度不一，大约在100—200米之间。风后猛降暴雨并夹有冰雹，暴雨倾泻时在纸房头形成一个水柱，地面积水一米深。建筑物倒塌一片，有的房倒只剩墙根。村东头两棵合抱粗的大树，身被扭断头刮走。许多树木横七竖八躺倒地上。旋转的气流夹带着各种器具、物品及杂物飞向远方，造成严重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因为此处离七里河工地最近，许多河工跑到这里躲避，当时，屋子、厨房、大门洞都挤满了人，所以死伤众多。该村社员死亡23人（女10人，内有茌平县韩屯公社尹庄村一探亲女孩），河工死亡15人，加他处死亡人数共计46人。重伤30人，轻伤169人。该村有139户464人，其中三户全家迁难，一户父母双亡，遗一孤儿。倒塌房屋142间。折断树木500多棵，家俱、衣物、畜禽损失殆尽，刮走小麦2.79万斤。

龙卷风袭击的惨象目不忍睹。前纸房头第一生产队场屋内挤满了避风的河工，都蹲在地上，风至时，场屋顷刻间被风扫倒，人全部砸在屋内，皆伤。看场人张德平裹着被子坐在炕上，风将其刮出200多米远，摔死，头上还挂着一个拉车轮子（车辐条大部拔出）。第五生产队场屋里，张兆同等四人蹲在墙角处避风，听见呼地一声，强风把北墙洞塞的麦秸刮开，他们被风刮得疼痛难忍，冻得发抖，张兆同便出

屋回家，刚跑出几步，狂风把大麦秸垛刮倒，压在他身上。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百米外的泥水里，身上衣服全无，只剩下腰带。他见天色比先前亮了些，仍刮着东北风，风势已小得多了，但大雨哗哗地下。他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走回家，顾不得房屋多处漏雨，查看自己，遍体鳞伤，麦粒射进肉里深约一厘米。心想到，自己幸亏被裹在麦秸垛中，随风旋转时与麦秸相撞击，没受大伤，虽疼痛难忍，但也幸免一死。张德友被风刮出200多米远，肚子上被硬物撞破一个大洞而死。张德茂、商光生被风刮出二里多远，张德茂落在碾楼（前纸房头西半里）正南七里河内，第二天找到他时，其尸已泡涨。商光生落在张德茂东北方的河坡上身亡。在西屯村西的七里河桥下，有三名河工和倪堂村一名卖杏儿童（13岁）避风，皆遇难。儿童的头在旋风中被硬物削去一半，四人死后皆赤身裸体，腿折头裂，面目全非。这场风，当地人前所未闻，风力之大实属罕见。前纸房头第三生产队场屋内，梁上放有一根打井下泉用的铁锥，屋西放有一台3.5马力汽油机，屋前有一石碾，场边停放一辆大胶皮车。风把场屋刮走，只剩一周墙根。其他东西皆飞出原地。铁锥飞出60多米，汽油机移位30多米，石碾滚出40多米。大胶皮车被卷至天空，车排无下落，车轮飞出三里外，车轴弯曲。河坝上，施工抽水用的“1140”型柴油机，重700余斤，滚落河内。十几辆小推车攒在一处，用油丝绳拴牢，皆被风刮得七零八落，车排全都散架，车轮无影无踪，有的车把插在水中，有的铁铤板卷曲变形。

那些遇上大风的幸存者，也是险而又险。倪堂村第六生产队长陈瑞青，被刮出一里半地远，身上衣服全被剥光，全

身皮开肉绽，至今伤疤累累。第一生产队长倪桂庭，带领30余名社员挤在菜园屋内避风，并将一驴一牛拴在门口。他担心牲口遭雨淋，出门要把牲口往里赶，刚拍牛腿之时，人畜皆被卷走。他落到纸房头以东的七里河幸福桥附近，有二里地远，一条腿折断。两头牲口摔伤。数处菜园屋全部倒塌，因屋顶简陋，屋内人多势众，挣扎着一齐从中拱出来，众人免于死难。倪堂以南，纸房头以东，是高、住两县的分界处，史称“倪堂大洼”。这里村庄稀少，地势低洼，方圆六、七里空旷平坦，又因上行风道没经村落，气流中裹带杂物较少，故陈瑞青、倪桂庭，虽刮得较远，却幸免一死。还有，现在高唐县中医院任职的医生刘瑞平，那年15岁。当时在一大门洞中避风，猛地被风卷出门洞，连翻两个筋斗后失去知觉，醒来见自己躺在沟中，恰被一棵倒折的树干压住一条腿，腿虽断了命却保住了。

主风道两侧风力较小。据当年在七里河施工的河工回忆：风初至时，他们从工段跑到西屯村，未到驻地风雨即来，躲进该村西北角一大门洞中。天色黑的怕人，开始南面下雨，他们关上大门挡住雨。尔后，北面也下雨，风裹着雨往门洞里钻，地面积满水，只好抓着大门穿条站在高处。听见庭院乒乒乓乓乱响，见空中树枝、农具、杂物往来翻滚。风雨小后他们走回驻地，又见附近碗口粗的树木全部刮倒。可见这一带离主风道较近，该村并未遭到意外灾害。

但是，这场风灾实属该地区历史上罕见，破坏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因此，风后数人因惊吓神经失常，群众心有余悸，数日不安，谣言四起。省、地、县气象部门考察了现场，确认是龙卷风。这是一种猛烈的旋风，破坏力极大。当

它形成时，上呈漏斗形，下端象鼻状。风速可至每秒百米，每小时移动数十公里。遇上物体，随之旋走，卷至天空，又摔在地上，经过水面，常吸水上升如柱，故名龙卷风。气象专家向群众作了科学宣传，使人心稍安。

风过后，在带河干部的率领下，河工首先抢险救人。纸房头大队党支部也紧急组织村民救人。民兵连长张兆阳，冒雨跑到王楼（小公社驻地），向县委电话告急。县委副书记杨祚荣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救灾领导小组，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并率领数十名干部和医务人员，乘车赶赴现场。车到赵寨子南，因路旁树木横倒在公路上，无法行驶，他们肩扛倒树，让车钻过去，终于赶到纸房头附近。但下道到处是水，车走不动。他们便徒步涉水绕道赶到前纸房头时已经天黑了。村东头小拉车上放着四名河工的尸体，身上衣服全无，满身是泥，头颅破裂，难以辨认是谁。他们走到，立即投入抢险的战斗。当时在高唐县迈官屯驻防的人民解放军也闻讯赶来。在同一时间内，南镇公社派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王清玉率五名干部赶奔现场。紧接着，公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邵庆臣火速组织南镇大队全体民兵和高中学生150余人（因这天星期天，大部分学生没返校），冒雨连夜赶赴现场。

时间就是生命。冒着雨，大家从倒塌的房屋、大门、场屋废墟中，抬梁架檩、搬砖掀瓦扒人。虽心急如焚，还得小心谨慎，有时只能用手一下一下地慢慢扒。多少人磨破了手指不觉疼，多少人带着轻伤拼命地干，在倒塌的物体下，多少人因抢救及时而幸免一死。受伤的需立即包扎，多少人不顾寒冷脱下衣服给伤员包扎上。入夜，在抢险领导小组的组

织下，水利局送来照明设备，扒人救命的战斗仍在继续。河工身强力壮，人多势众，加上指挥得当，忙而不乱，赢得了时间，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纸房头村离县城三十五里，距聊禹公路也三里多。雨大水深，汽车无法进村，给运送伤员尽快入院抢救造成困难。又是解放军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人抬、车推，为人民立了大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能让车等伤员，不能让伤员等车！”地区和县组织的九部急救车在公路上往来如穿梭，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医院。县医院住满了，县委决定又在赵寨子医院、棉花第三加工厂设立了临时病房。那是多么惊人的高速度啊！它充分显示了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黎明时，雨停了，有人啼哭。抢险领导小组又转入处理死者的善后工作。已死的河工，由其所在公社干部负责，先运送到火葬场（刚建好房院，没火化设备）净身整容后，民政局备办衣帽，穿好，送至其家。民政局发放了抚恤金，各单位开了追悼会。当地的死者，由各村负责，尽快送葬。

大雨过后，烈日当头，闷热异常。干部、群众、学生、部队官兵，一天没吃上饭，没喝上水，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四处找人，奔波不停。这场风带来的虽是灾难，但显示的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

抢险结束后，在县委的直接关怀下，南镇党组织，以主要领导同志为首，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救灾领导小组。他们分工合作，又投入了紧张的救灾工作。在迈官屯驻防的解放军，进驻纸房头支援救灾达两月之久。

救灾工作主要做好三件事：首先做好政治思想宣传工

作。鼓励群众，依靠党和群众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重新建好家园。县气象站印发了《龙卷风是怎样形成的》等宣传材料，批判谣言，稳定人心。聊城市河西王大队党支部送来五十本《泰山压顶不弯腰》读物，这是更宝贵的精神食粮。阶级友爱，情深似海。纸房头有难，牵动了高唐县，牵动了千万人的心。难民们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同情。每天来纸房头慰问、捐资、献物的，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地委领导来了，军分区领导来了，邻县的领导来了，县直各单位，各公社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代表也来了。地区医院、临清医院派来了医疗队。纸房头人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其次是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要让受灾群众“中午吃上饭，晚上住上房”的要求。在县直各单位的支援下，很快建立了大伙房，搭好临时帐棚，县委招待所送来230床被褥解决了燃眉之急。当地群众也主动克服困难，安排住宿，使无家可归的人有了着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个人有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孔堂村三名十二、三岁的小学生，拿着四元二角钱捐资救灾。其中一人脱下自己的褂子说：“我自己没钱，家里眼下也没钱，这件褂子留给受灾的小朋友穿！”茌平县韩屯公社书记张萍亲自送来一万块砖。多少单位反复表示：要人有人，用物有物。县委派来了最好的建筑施工队，在废墟上统一规划，施工30天，建砖房72间。因风灾毁房的群众，全部搬进新居。党的关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众人的无私奉献，使纸房头人热泪盈眶。他们不能忘记：爹亲娘亲就是没有共产党

亲！

重建家园与田间管理双管齐下。城关公社某大队的一位社员，用拖拉机拉着耕牛和绳索犁耙前来支援三夏生产，县直机关、纱厂、拖拉机站等单位的同志，轮流前来参加义务劳动，及时抢种了秋作物，抓紧了田间作物管理，众人拧成一股绳，帮助纸房头人度过了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自然劫难。

一场与大自然搏斗的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是党的光荣，人民的自豪，社会主义制度的骄傲。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历史性的话题。

从铺屯之多说开去

郑宽庭^序 侯立中 韩子敬

我县有铺村16个，屯村66个，铺村屯村数目之多，超过了平原、茌平、夏津、禹城、东阿、阳谷等县，为七县之首。这是有一番来历的。

古代，高唐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但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而且是县署、州署所在地。官方为了传递公文和给过往官员提供食宿方便，在各交通要道上，每隔一定距离便设“铺”一处，以应需要。据1535年明嘉靖《高唐州志·铺》记述，每铺“为屋四楹，旁为两廊，中建邮亭，其外为门，缭以周垣。具旗铃以严号令，置包匣以护封缄，设铺司兵以递文移，附于历以稽程限，统於长以司巡察。”那时，高唐在5条路上共设了9个铺村，各个铺村都以州衙前的“总铺”为起点，每隔10里设一铺。嘉靖《高唐州志·疆域》曰：“胥经于此，以达两京……车鳞鳞，马萧萧，还杂于周，行者终日不绝，所以自昔号为要冲之地、繁居之邦也。”可见当年高唐的交通地位何等重要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时至今日的铺村，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铺村了，而且有的铺村（张铺、姜铺、东铺、西铺）原来就不存在铺村的交通意义。但是，总的来说，追根求源，仍可看出古代交通的一些蛛丝马迹。

现在我县的各个铺村，其位置大都座落在县境内的几条古“官道”上，它们以高唐城内的钟鼓楼（位于今北湖路南

端)为起点,分别向西、向南、向北排列开来,铺与铺的距离或5里或10里,以距离钟鼓楼的里数和铺字相连,称“某某里铺”。从县城内向西去的古官道,是经十里铺、十五里铺、二十里铺,张铺(距县城25里)、三十里铺等5个铺村,通往古运河岸边的古城——临清的交通要道。在纵贯高唐县境南北的“大官道”上,即今日之“国道105线”(北京至珠海)公路两侧,总共设有9个铺村。即高唐城北的五里铺、十里铺(今称东铺和西铺)、十五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6个铺村和高唐城南的南五里铺、十里铺、五里铺(以古灵城为起点北指)等3个铺村。位于县城内的“总铺”(早已不存在),是县境内的核心铺,它和今旧城(曾是清平县城址)镇东南的十里铺,也应计入我县铺数之列。一个县境内的不同乡(镇)有同名村,是国家地名法规许可的,所以我县的同名铺村、屯村的名称,得以保留至今。

古往今来路漫漫。在这铺村依次排列的古官道上,曾演出过一幕幕多彩的历史活剧。当我们漫步古官道时,仿佛历史场景又浮现在眼前。1264年,蒙古迁燕(今北京)定都,此后屡屡发兵南下,经高唐对南宋用兵。1279年,宋丞相文天祥琼崖落难被执,由南而北,被押解去大都,在高唐写下了《宿高唐州》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愁思,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唐一带还曾是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靖难之役》的主战场。及至清初盛世,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东巡”,高唐亦必经之地。城南皇殿村,是乾隆皇帝来高驻蹕之地。

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将我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此前一年——183

9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相传他们一行是沿通过高唐的“官道”南下的，只因他清正廉明，同随行人员约法三章，沿途不准打扰地方官员和百姓，神不知鬼不觉地匆匆而过，既没留下令人唾骂的话柄，也没留下千古传颂的佳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将林则徐贬官戍边，并被迫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禁烟彻底失败，此后受到中外反动势力双重压迫与剥削的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854年，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率铁骑数百，踏官道由北驰骋南下攻陷高唐久驻，翌年又踏官道过古城南镇奔至茌平冯官屯，被尾追而来的清军僧格林沁部围困而失败。李开芳被押解至京，同当年文天祥一样，在京英勇就义，丹心永照汗青。史有巧凑，恰在十年后的1865年，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僧王又被号称“小阎王”的捻军首领张宗禹斩杀于荷泽蓆密寨。可是，刚过3年——1868年8月，力战南镇的张宗禹又被清军战败，在南镇投徒骇河而死。在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前的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这是古官道上的史迹所证实了的，实在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民国初年以后，津浦铁路通车，古官道的显要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在这条古道上兵匪逐鹿，时而有之。高唐不断出现了“兵燹匪祸本县独多”的混乱局面。

时至1926年，在这官道近侧的谷官屯出现了以金谷兰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他们在这里反军阀、杀盐巡、镇压地主恶霸，闹得反动统治阶级惶惶不安，惊呼“异常！”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由恩县沿官道寇高唐，金谷兰还率部在原北十里铺村斩断官道，伏击日寇。后来日军

陷高唐，由南镇南下从左翼迂回包剿济南，在中国广大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本新闻宣传机构不得不供认，侵华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猛烈地反击。

屯村的设立和兴起同样事出有因。

元代的高唐人口与宋朝相比，同全国总情况一样，处于递减状态，大约只有两万上下。又元明之交，高唐成了主要战场，加之连年旱、蝗灾害，土地大片荒芜，人烟极为稀少，“土著旧口，大半荡然无存”（《高唐县志稿》第七册131页“户口变迁”）。朱元璋建立明朝，能耕能种的生产劳动者十分缺乏，徭役无人服，赋税无处征收。据《明史》“食货志”载，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皋“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的建议，决定由山西移民，荒凉的高唐则是重点安民地之一。

移民有的来自兖、登、莱、青各州府，主要还是来自山西省平阳府洪洞等县。时间约分别在洪武20年（1387）、24年和25年（1392年）。

地处山西省汾河流域的洪洞等县，为元将领察罕帖木儿及其儿子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统治地区。因山河险要易守难攻，战乱较少，社会相对稳定，较长一段时间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形成人口稠密之区。因此，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向高唐等地移民。

为此，山西省洪洞数县也建立了移民专职机构，确定专职官员办理此事。临行前，移民们齐集洪洞县广济寺，倾诉乡情，祭奠祖先。待移民们离开广济寺的时候，“穷家难舍”，离乡之情猛袭心头，忍不住热泪翻滚，路上，一个劲地回头看看那广济寺，看看那广济寺的大槐树。所以，当他们来高

唐定居之后，为了寄托思念故乡之情，常在新居的房前屋后植槐，只要有人问起谁的祖籍在哪里，他便说老家原在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样，槐树的种植便多了起来，几乎家家都有，或叫国槐，或叫家槐。至今高唐境内百年古槐仍不罕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洋槐”（刺槐）的引进，国槐的种植才渐渐少了。新的居民点纷纷建立，命名是至关重要的。“土著为村，迁民为屯”，凡有组织的移民，往往用带领、组织他们建新居民点的领头人的姓氏，作为新居民村的村名。如什么“张官屯”、“李官屯”、“徐官屯”等，及姓名全称的“张达屯”等等。象“李官屯”、“徐官屯”、“王官屯”这样的村名，在今高唐境内至少有两个，还有什么“王屯”、“于屯”等。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命军人也搞生产，这便产生了“军屯”，明嘉靖年间曾达327户之多，系从德州左卫转来的。军屯有以军人小头目姓氏命名者，也有以地命名者。移民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搞得颇有生机，生活也得到改善，加之明初风调雨顺，也算得上国泰民安。

然而好景不长，高唐大地烽烟又起，居民又遭大难，那便是“靖难之役”的发生。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之后，分封诸子到各地为王，拥有重兵，尤其是在北方同蒙古鞑靼人接近的各王，兵权尤重，一般在万人以上。1398年（洪武31年），太祖朱元璋病死，翌年（1399年），其嫡长孙朱允炆在南京即位（即为惠帝，年号建文），因尾大不掉，任用齐泰、黄子澄参与国事，遂即废削数王。是年燕王朱棣（朱元璋之子）举兵北平（今北京），以讨伐齐、黄为名（实为争夺帝位），号称“靖难”。1402年（建文4

年)，燕兵破京师（今江苏省南京），惠帝死（一说逃亡），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这“靖难之役”，在高唐也称“燕王扫北”。燕王举兵，南北横扫，居南北交通要冲的高唐自然在劫难逃。“鲁西鲁北尽成战场，燕军所过，村舍为墟，于是土著无噍类矣”。（引文同上）此后又不断从省内外移民，“填高唐以旷地与之”。不仅明朝有移民，清朝仍有此举。因此，高唐以屯命名的村落特别多，1553年的明嘉靖《高唐州志》记载有30个；1836年的清道光《高唐州志》记载已有46个，与1936年《高唐县志稿》所载的屯村数目相等。临徒骇河的南北交通要冲南镇一带，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重灾区，移民点自然就多一些。今南镇乡共有48个自然村，就有8个带屯字的村庄。它的紧邻赵寨子乡，共有39个自然村，有7个带屯字的村庄。这些村庄绝大多数系明代移民村落。由此可知当年战事之激烈，燕王屠戮之残酷，高唐之荒凉。旧志记载：当孩子淘气大哭大闹时，母亲恫吓孩子说，别哭了，别哭了，阎王（燕王）来了！连淘气的孩子也闻听燕王而止哭。

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一定时期的相对安定，高唐人口逐年增多。据明清以来的史志记载，元朝（1277—1368年）时人口大约两万上下，明洪武24年（1391年）有8,230人，至永乐10年（1412年），已增至28,198人。到清乾隆60年（1795年），高唐人口已达166,541人。这一时期，人均土地面积不到洪武年间的1/3，“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到清朝中期的道光15年（1836年），高唐人口多达194,793人，人均土地占

有面积更少了。“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原见清学者洪亮吉（1746—1809）《洪北江遗集》。此转引自1990年第10期《新华文摘》冯天谕教授著《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在人口越来越多、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占有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连年不断的灾荒，以及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官僚地主兼并，不得温饱的人民，不是聚众谋反，便是扶老携幼“闯”关东而去，在关外黑龙江等地屯垦种地，建立新的屯村，那则是另一回事了。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文中所列各县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致谢，不足处请校正）。

（1990年12月9日）

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高唐县古迹简介（续）

賈 进

高唐县历史悠久，自古劳动人民就耕耘这块广阔沃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的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古迹文物。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尽管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破坏和自然风化等原因，损失较多，但至今地上地下仍然保留了不少的文物古迹，这些凝聚了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珍宝，是历史文化昌盛的结晶，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今续举若干，作以介绍。

一、灵城遗址

灵城遗址即汉灵县城址。遗址在今南镇村，距高唐县城约35华里。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481年，此城名曰“灵丘”。到公元前306年名曰“灵县”，后汉建武三年（公元前25年）废县划入博平。魏文帝时（220年）复灵县属清河郡。东晋时期，北方郡县属“五胡”，灵县不为县。北魏时灵县属南清河郡。隋朝大业二年（605年）废县，省入博平。唐朝武德三年（620年）复置灵县。武德四年（621年）又省入博平。宋朝置“灵城镇”，金、元亦为“灵城

镇”。到明、清时称“南刘镇”，民国至今称作“南镇”。今细辨南镇村地貌仍有灵城古城墙遗迹。

二、涸河汉墓群

汉墓群位于涸河乡涸河村西南部，分布在长0.7公里，宽0.5公里的耕地上。据说，原有7座封土高大的墓葬，其中六座墓葬的封土已被铲平（现仅存盼子墓还有封土），但位置皆能确认。汉墓群的部分墓室保存较好，有的墓宅遭到破坏。挖掘后，出土的文物有陶俑、汉画像石、陶灯、陶案、陶灶、陶猪、陶狗、陶鸡等。中国故宫博物院于1958年收藏了我县出土的陶俑，为国家之瑰宝，曾多次在国外展出。汉画像石现被砌在涸河村西部一池塘的流水口上（应保护——编者），在墓中为墓室门框，上面雕有虎头衔环拉手，并有花草、鸟兽等精细的浮雕。据调查，除七座墓葬外，在村北也有一些汉墓存在，也曾出土过大批文物。这就证明了汉墓群的面积还要大，其数量还要多。

三、华歆墓

华歆墓在高唐县涸河乡大华庄村北200米处，现存封土高3米，直径7米，墓葬保存完整，墓室顶部塌陷一米见方。从顶部缺口看墓室，此墓为砖结构，上为圆形，底部呈八角形。据当地群众介绍此墓为大华庄华姓祖坟。据《高唐州志》记载为三国魏时期的墓葬。《中国名人大辞典》载华歆其人：华歆三国魏，高唐人。字子鱼。少与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号为一龙，歆龙头，宁龙腹，原龙尾。汉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官。后拜豫章太守。为政清静不

烦。吏民畏威。孙策略地江东，歆幅巾奉迎。策待以上宾之礼。后曹操表徵之，拜议郎迁尚书令。承曹旨，副郗虑勒兵入宫，收伏皇后。歆率后出，幽杀之，文帝受禅，累拜相国，改司徒。明帝朝进封博陵侯，转太尉；太和中卒。华歆墓现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

四、房公墓

房公墓在高唐镇祁寨村，1972年春天，由省博物馆会同高唐县有关部门进行发掘。

该墓清理前夯筑封土高出地表2.5米，因早年被盗，墓室大部坍塌。墓室为单室，平面近方形，南北4.2米，东西4.35米，绳纹小砖砌成。墓底距地表4.2米，铺地砖排成“人”字形。墓室地面和墓壁之间，有排水沟。墓门正南，宽1.1米，有斜坡墓道2.15米。葬具和人骨皆无。随葬器物有瓷器、陶器、陶俑等38件。瓷器有：瓷壶、瓷虎子、龙首三足器架，瓷樵斗、瓷盒、瓷碗、瓷壶、瓷灯。陶器有：陶壶、陶罐、陶碗、镇墓兽、陶狗、牛车模型、陶井栏。陶俑有：武士俑、鲜卑使吏俑、仪仗俑、侍仆俑、女俑等。房公墓中出土的陶俑，对研究东魏时期服饰和泥塑艺术有很高价值。墓内还有墓志铭，顶阳刻篆文为：“魏洛州判史房公之铭。”志文共二十六行，满行二十六字，魏体书。房公名悦，为房法延第三子，曾历任“国侍常”、“青州镇东府中兵参军”、“司徒胡公刑狱参军”、“高阳太守”、“广川太守”、“平南将军太中大夫。”房悦死后孝静帝又封他为“使持节”、“宣成公”。由此可见，房悦是北魏、东魏统治者重用的汉士族。

高唐县及山东北部，曾是东魏统治的地区。房悦墓中发现的墓志和文物，对研究汉民族与鲜卑族融合的史况具有一定的价值。

五、谷官屯金墓

金墓，即虞寅墓，位于高唐县韩寨乡谷官屯村东部一洼坑内。一九七九年五月由山东省博物馆、聊城地区博物馆会同高唐县文物主管部门清理、发掘。

金代虞寅墓为仿木结构建筑的砖砌的单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5米；墓顶早已塌毁；残存的墓壁高1.29米；墓室建造有门、窗、柱，完全模拟地面建筑。墓壁上画满了画，绘画面积约21平方米。清理墓葬时，有残存的棺木和骨架。墓内出土主要遗物有瓷器五件，碑形志石一盒，壁画十六幅。瓷器有：瓷碗、瓷盘。墓志铭上面，一面刻有十六个女真文篆字“金故信武将军骑都尉致仕虞公墓志铭”。下面一块写有一千七百六十七个字，主要记录了虞寅的生平事迹及生卒年月。虞寅，字伯钦，山东高唐西房村人，生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年少时练骑射，先在齐刘豫部从军，齐废后，金皇统元年改授进义校尉并任上蔡县尉。后任沂州临沂西县县尉、懿州灵山县主簿等职。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告官还家。他为官颇有政绩，官累迁至五品，积勋至骑都尉，特封陈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金承安二年（1197年）六月卒，享年八十三岁。壁画随墓环绕成圆形，较完整的有十二幅，其中八幅描绘墓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内容，另四幅是出行活动的内容。壁画绘有乐伎、车马、床帐、奴仆等。画面结构严谨，构图自然，用笔讲求

笔断气连，形断意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金代虞寅墓的发掘，特别是壁画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服饰，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出土文物和壁画现分别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和聊城地区博物馆）。

六、郝庄元代遗址

遗址位于梁村镇郝庄村北100米处，为元代村落遗址。1988年文物调查时发现。面积约3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1米，地表面有大量砖瓦、瓷碗底、盘底、碗口沿、狮纹瓦当等遗物暴露。据当地村民讲，遗址原来地势较高，因后来平整土地渐变平缓。

七、杨通墓

杨通墓位于高唐县洺河乡石羊村南部，现还有封土，高约1.5米，直径3米。墓前石刻造像等附属文物早年散落。幸存一通石碑，两个石人（头残缺）。石碑高1.7米，宽0.88米，厚0.2米。碑额上阴刻篆字“杨公赞善之碑”，碑文为楷书阴刻，残损严重。据当地群众介绍：该墓主人姓杨名通字伯达，明成化年间曾任元帅，后来一次围剿贼寇时，中毒箭身亡，安葬于此。墓前原有石车、石马、石桌子等，早已被破坏。杨通只有一女，死后也葬于此，故该墓又俗称“孤女坟”。

八、石雕塔

石雕塔在高唐县洺河乡姚堂村东南100米处，通高3.6米，分为九级。每一级由一块青石雕刻而成，有鼓状

方块状、八角状，塔顶为葫芦状。上有花草、人物、动物等图案。建造石雕塔是为纪念一佛门祖师。塔第六级上有明确记载“庄严示寂曾师祖坛瑞位翁翁塔”、“清乾隆四年岁次于己未十月十五日立”。石雕塔非原状，刹顶置于地上，可能是后人摆放有误所致。

九、馆藏文物

自一九八〇年以来，我县通过文物普查、收集、发掘等方式，共收藏文物200余件，有出土文物、传世文物、现代文物。其中以汉、宋、元、明、清文物为多，中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玉器类别之分。为今后研究古代文化和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县文化馆收藏的文物有：

（一）陶器，以汉代为主。有涸河出土的陶罐、陶盆、陶鸡、陶狗、陶灶、陶案、陶壶；三十里铺孙庄出土的陶人、陶觥、陶勺、陶钵等；祁寨房公墓中出土的陶碗、陶镇墓兽、陶俑、陶井栏等。

（二）瓷器，有涸河、城关郭五里出土的唐三彩炉，张庄乡华家务出土的宋代大酒坛，赵寨子王辛庄出土的辽代凤首白瓷瓶，宋代钧窑产的瓷盘、瓷碗等。另外还有搜集到的瓷钵、瓷灯、瓷盘、瓷碗、瓷罐、瓷瓶。传世文物有：唐代黄釉瓷缸、清代荷花镂空瓷鼓、瓷人天官、瓷人道士、瓷人寿星、掸瓶、九子盘等。

（三）铜器、铁器：有梁村镇皮户李出土的汉代铜镜，城关镇胡庄出土的元代铜权，赵寨子乡大许庄收集的“大明宣德年制”铜香炉；铁器有一九八二年在姜店乡唐楼搜集的宋代六耳铁釜。

(四) 玉器，有收集的玉杯、玉人、玉板指等。

(五) 一九八五年，在尹集镇崔庄收集货币 90 余斤。其年号上迄汉代，下至清朝，包括五个朝代，50 多个年号，也在县馆收藏。

(六) 现代文物，有金谷兰烈士使用的铁蒺藜锤，城关镇双海子地下党支部用过的螺号，杨厚基烈士的文件箱，李恩庆烈士用过的匕首、砚台等。

